

工人起來了

工人自治聯合會運動1989

香港工會教育中心出版

香港·1990



假如一面共和國的新旗
要有血染才見風采
就讓人民慷慨赴義的鮮血
永遠永遠
浸滿這面旗幟
不再悲哀

——吳董人

〈摘星年代宣言〉

一個行將死亡的腐敗政府，
對所有新興力量和組織
都要極力鎮壓、排斥。
工自聯的一套行動綱領
是能夠代表工人利益的，
符合大多數工人願望的，
中共這樣的獨裁政治
更不會容異己力量的存在。

——編者

編者序

本書是作為對八九民運中冒然而起的「工人自治聯合會」的歷史見證。

八九民運在血腥鎮壓下被迫轉到地下及海外，有人指出民運失敗的原因之一，是工人、農民還未能全體動員起來。一年來，海內外不少有識之士都在回顧和檢討是次民運的來由經過。可是，絕大多數人都總把八九民運定性為學生與知識份子的運動，工人往往被看為輔助支援的角色；「工自聯」的重要意義却被忽視。中國學生、知識份子對工人在民主運動中，是否擔綱主要角色這一問題上，一般都抱著懷疑和保留的態度。在這方面，中國八九民運與波蘭八〇民運有明顯分別。

除了在眾多的訪問裏與參加八九民運的工人討論這問題外，我們還特地邀請一位學生領袖作出她對此問題的了解與分析。中國民運未來的路程上，還有待多些研究討論工人在運動中所擔綱的角色。

「八九民運為何工人未能成功發動？」一文，帶出多個有關工人的社會經濟地位，和思想狀況的分析，希望能於日後帶來更深入的探討。

一年來，數以千計人仕因參與民運被拘捕。但因中國當局素來採取隻手遮天的手段，實際上多少人和什麼人被捕仍然是

個謎。我們只可從中國報刊電台報導中，輯錄百多名已公開被捕民運工人名單（這些被捕工人現況如何，我們也不得而知）。希望讀者能在這方面提供資料予我們。此外，我們亦特地編寫對一些「工自聯」領袖如韓東方等人物的剪影。

「工自聯」成員被當局監禁、通緝和迫害，同時又未受到國際廣泛關注。幸而多得國際工會運動，特別是「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向「國際勞工組織」提出議案，投訴中國政府打擊「工自聯」的工人結社組織權利。是次投訴最後於90年2月在「國際勞工組織」的大會委員會通過。申訴和大會結論的報告亦被輯入本書，以作參考。

本書輯錄以訪問「工自聯」組織者為主，有北京的，也有其他省份的；目的是希望讓這些工運先鋒，有機會以第一者身份現身說法，對這次運動作出見證。也僅希望能讓讀者有機會接觸一些被中國當局形容為「社會渣滓」、「流氓」、「暴徒」的「工自聯」成員的真正面貌。訪問嘗試探索一下他們在走向成立「工自聯」這一里程碑之前的經歷和思想的路程；也有探討他們對今後中國民主改革之思路。這些被訪的人仕，他們年紀不同，文化背景、工作經驗和生長環境都不同，但都有着同樣的結論：就是認為現時的「中華全國總工會」，是政府和共產黨控制下的宣傳工具，不能真正維護和爭取工人的利益。中國工人有需要建立一個獨立的，能真正代表工人的工會運動。

現時在中共全面出擊，趕盡殺絕「工自聯」成員之形勢下，我們未能多方接觸和公開地聯絡有關人仕，作出較全面的調查研究。所以現在所整理的訪問只能看作是片面的記錄，必定有錯漏之處。有朝一日當被拘捕的民運工人和「工自聯」成員得以平反後，希望能夠全面報導事件始末。

本書轉載了不少在去年4至6月期間，「工自聯」及其他工人曾發表過的文章和聲明，其中包括「北京工自聯」的章程

和宣言，好讓讀者引證當時「工自聯」及其他民運工人思想和言論。另外，更特地轉載一篇任曉町在4月中發表的講辭；當時，任曉町已強調工人應起來組織獨立工會運動，甚有遠見。現時任曉町已因參加八九民運再次作階下囚。

我們並不願見到本書被放在歷史類書架上，只希望藉此能為工人民運播放訊息，以鼓勵正被壓抑和剝削的中國工人，給他們帶來爭取民主自由的新希望。

國內的工人同胞們，本書裏可能有您的心聲，有您的影子；亦可能未盡訴您們心中感受與思潮。

我們深信書中所記錄的只是開始，而不是終結！

目 錄

北京工自聯成立始末	梁洪	1
工自聯運動簡介	陸萍	12
工自聯人物剪影訪問(一)——從售貨員到後勤部長		20
工自聯人物剪影訪問(二)——從服裝店經銷到女廣播員		41
工自聯人物剪影訪問(三)——從地方幹部到籌委委員		67
工自聯人物剪影訪問(四)——從製餅工人到宣傳隊長		84
訪問中華全國總工會幹事——死水微瀾		99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訪問記(一)		111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訪問記(二)		125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訪問記(三)		131
記北京工自聯義士	呂京花	139
革命工人韓東方	麥燕庭、黎佩兒	146
天安門衛士劉強		152
默默耕耘的劉煥文	張倫	155
悼念胡耀邦為何爆發民主運動		
——4月21日晚在天安門廣場的演講辭	任曉町	158

八九民運中國工人為何未能成功發動？	建元	166
工運與學運、民運	程真	174
		85
國際勞工組織對中國政府打擊工自聯的聆訊		185
首都工人宣言	北京工自聯	211
工人宣言	北京工自聯	212
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建綱領		213
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臨時章程		215
告全市人民書	北京工自聯	218
十問書	北京工自聯	220
告全國同胞書	北京工自聯	221
告全國工人書	北京工自聯	224
告海外同胞書	北京工自聯	226
告海內外同胞書	北京工自聯	228
首都全體工人和學生的聯合聲明	高自聯、北京工自聯	229
北京市工人自治會的公告		231
緊急呼籲(一)	北京工自聯	232
緊急呼籲(二)	北京工自聯	234
急件	北京工自聯	236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緊急通告(一)		237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緊急通告(二)		238
廣州工人自治會宣言		239
城建工人自發聯合會的宗旨		240
緊急動員起來，攻克八十年代的巴士底獄		
	北京工自聯	241
工人兄弟，動員起來	北京工自聯	243
人民的號令	公鳴	245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備處公告(第一號)		248

首都工人自治會籌委會新聞發佈會		249
流行歌曲新篇	北京工自聯	251
中國現狀十大怪	北京工自聯	252
北京人讚美詩	中國工人詞	254
新編共和國歌	中國工人詞	256
北京工人致學生公開信	北京一僱工	257
一個工人致學生的信	北師大	259
致工人糾察隊	北師大學生自治會	261
和兩個工人的交談	北大外語系一革命者	263
勇敢地站起來，工人老大哥		265
致工人階級：成立組織共同戰鬥	北師大民主宣傳隊	268
工人階級決不會袖手旁觀		
	首都工會工作者及253名職工	270
時事評論		272
民心不可辱		274
李鵬騙人	工人評論員	276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日誌		281
六四以來被捕工人民運人士名單		283

北京工自聯成立始末

梁 洪

自4月中旬以來，北京爆發了以學生為先鋒的民主愛國運動。學生從胡耀邦逝世，提出了為耀邦恢復名譽和評論耀邦的功過是非的要求。「北大」學生於4月17日自發地前往天安門廣場送花圈進行悼念活動，並提出打倒官倒、鏟除腐敗等口號，就目前國家的興亡和全民族的利益，表達了具體的意見。

在北京進行的學運初期，我們工人認識到學生說出了我們廣大人民的心裏話，我們工人不能袖手旁觀，應該站出來保護學生，支持這場偉大的民主愛運動。

在1989年4月17日，我們工人在天安門廣場的西觀禮台，聽學生演講。這時我們就說工人也應該起來。於是，我們十幾個工人約好了，18日晚5點在原地方見面，並且說好回各單位爭取更多工人的意見。18日見面後，大家一致反映各單位工人都支持。19日晚，我們聽到了警察打學生，並且打傷了多人。因為是在晚上，當時學生在新華門靜坐的共二百至三百人左右，警察打學生的理由是：有人搗亂。其實學生根本就沒有過激行為。

在4月20號，我們工人見到被打的學生以後，非常的氣憤。我們覺得應該立即成立起工人組織保護學生，並在當天進

行了公開演講，號召工人組織起來。也就學生被打一事進行了公開演說，題目是《就軍民魚水情談工人對四二〇事件看法》。並在當天晚上，在天安門廣場西北角貼出了《告北京市民書》和《告全國同胞書》，公開向北京工人提出意見。

在貼出佈告以後，各單位來報名參加「工人自治會」的工人很多。我們「工自聯」4月21號看到有這麼多的工人參加，當時通過常委和籌委會，決定表示歡迎，但必須得是工人，並查驗身份証和工作証，發給我們自治會的証件以保證自治會的純潔性；並在當天提出了我們的口號：「打倒官倒、鏟除腐敗、穩定物價、提高工人工資、公佈鄧樸方及國家領導人子女的財產」等要求。在這以後，「工自聯」逐漸的完善，並且多次有組織地上街遊行示威，並有組織的給學生送吃、送水。

在4月26日，新聞和報紙說學生攪動亂，公安機關也說「工自聯」是非法組織，進行恐嚇。但是，我們工人不怕，堅信學生提出的問題是正確的，我們提出的問題是正確的，是實是非應該讓廣大的人民羣衆去評論。並就政府說學生動亂和「工自聯」非法一事，組織工人上街遊行，要求否定四二六社論。

在4月26號以後，政府越來越不像話，不但不承認學運是愛國的，而且於26日調來了大批的軍隊，同時由公安機關通告，說悼念胡耀邦活動結束，不許上街遊行，再進行遊行是違法的，再集會或遊行須申請。我們「工自聯」就這個通告提出了抗議，並發表了《告全國同胞書》，指出學生愛國違什麼法，工人給政府提建議有什麼錯。「工自聯」就這個通告再次有組織地進行遊行示威，得到全北京工人和市民的支持。

在27日學生配合「工自聯」，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軍警也採取了克制態度，跟我們「工自聯」、市民、學生握手談話。可以說是沖破了警方的十幾道防綫，學生向軍警致意，並喊出了「人民警察愛人民」、「向警察致敬」等口號。「工自聯」的口號是：「軍警來自人民」、「工人熱愛軍警」等。



軍隊之所以有力量，
是因為所有參加這軍隊的人，
都具有自覺的紀律；
他們不是為少數人的或狹隘團體的私利，
而是為着廣大人民羣衆的利益，
為着全民族的利益，
而戰鬥的。

——毛澤東

可是，在4月30日，新華門外發生了警察打學生一事，並且說要抓學生領袖吾爾開希等。我們「工自聯」聽聞後，立即組織工人、市民舉行了更大的遊行示威；並且由「工自聯」和「北高聯」聯繫，說如果有人被抓請通知我們「工自聯」，我們會予以營救和保護。

在5月1日，「工自聯」就這個問題進行了討論，應當怎樣保護學生和維護工人的利益，並訂出新的《工自聯網領》，《工自聯宣言》、《北京工人宣言》，同時也吸收更多會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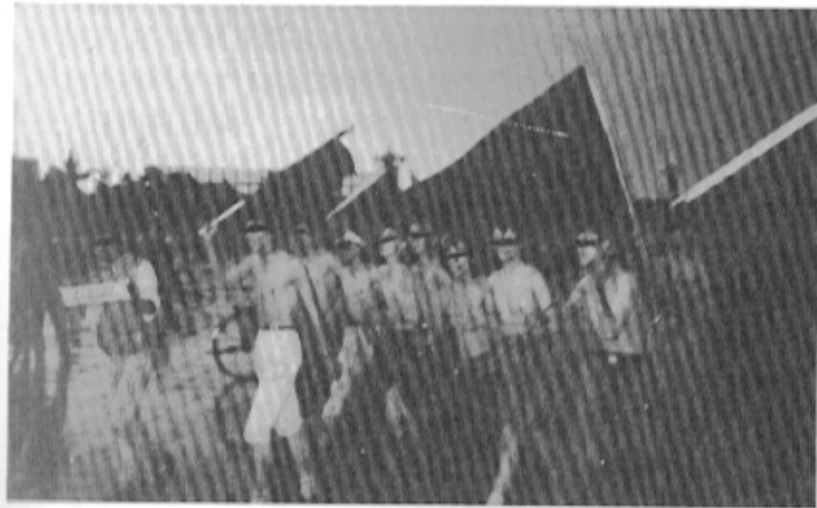
5月1日以後，「工自聯」就會員參加的問題也進行了新的討論，並通過民主選舉，一致同意由沈銀漢、劉強、韓東方、老蕭還有我為主要負責人，還有其他幾位我不知道姓名。我們就這個問題單獨地進行了討論，認識到要使廣大的工人信任我們，我們應該更好地領導工人進行這場運動。並且擬定了「工自聯」提出的五條要求，在第二天通過發表。

在通過了上述決定後，「工自聯」主要工作是進行宣傳，吸收更多自願加入的工人和北京各個工廠、商業、事業單位派來的代表參加「工自聯」，和採取配合行動。另外，也就國家生產力、出口創匯、工人福利、人權、民主、自由等問題進行了公開演講，得到更廣泛工人、市民、學生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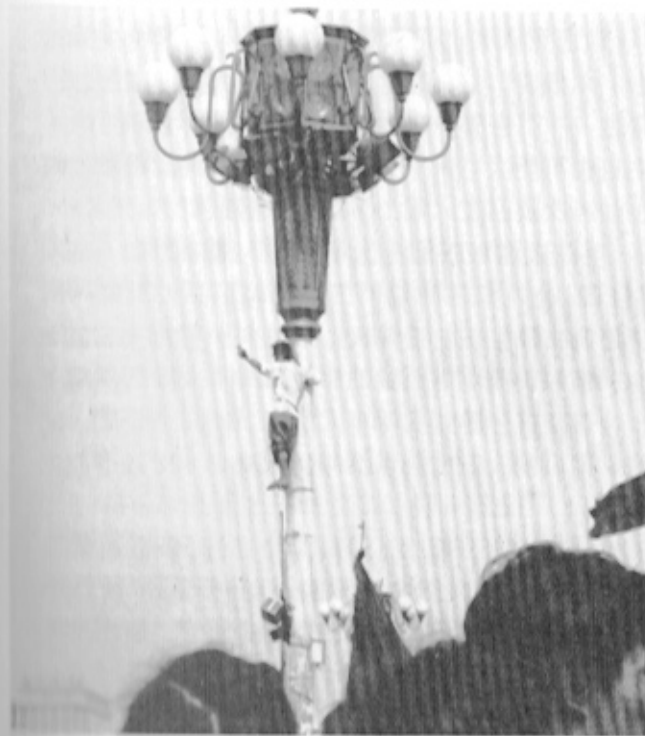
5月13日，學生開始絕食，抗議政府。可是學生絕食七天，而政府置學生生命而不顧，反說學生在搞大的動亂。

我們「工自聯」，就政府的一派胡言和看到學生的生命受到嚴重威脅，身體受到摧殘，立即行動起來了。對政府進行抗議，組織工人遊行，並且買了大量藥品、食品、衣服等物品送給「北高聯」，喊出「打倒李鵬」、「打倒小平」、「我們的學生在挨餓，你們和你們的子女在吃什麼？幹什麼？」等口號。

5月20日，政府下達了戒嚴命令，同時派解放軍進駐北京，實行戒嚴，情況相當緊急。「工自聯」聽後，立即召開了緊急會議，並且成立了「北京工人敢死隊」、「北京工人自



▲在5月底成立的「工人糾察隊」。



◀剪斷官方廣播的「工自聯」成員。

治聯合會敢死隊」。由我任××××，並管×××。我們立即號召全體「工自聯」的會員，分佈四個方向前去堵截軍車，對解放軍進行宣傳。同時廣大的市民也自發的組織起來堵軍車。有上至七十歲的老人，下至幾歲的孩子，真正的成了全民截兵。軍人只說：我們接到的是演習訓練，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並且有一個多星期沒看報，沒收聽廣播。我們「工人自治會」同時發起號召，號召全市罷工、罷水、罷電，同時提出反對軍管。

可是，5月21日情況危急，不時地有市民和學民向我們「工自聯」報告說，有市民被打學生被打的消息，軍隊、坦克開始向廣場進發，我們「工自聯」的會員立即前往沖突地點去聲援，並進行了更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地鐵的會員主動地把地鐵用電總開關了，因為部隊要從地鐵進來。我們也提出了口號：「打不還手，和平請願，愛國無罪」。

5月22日，政府置人民的正義行動而不顧，繼續派兵強行進駐。在豐台、六里橋，「工自聯」跟軍隊發生大的沖突，起因是，軍警打學生。「工自聯」會員提出的口號是：「頭可斷，血可流，民主自由不能丟」。「工自聯」號召會員設路障，阻止軍隊進城，並再次號召工人罷工，以迫政府讓步。

5月23日，毛澤東像被三個身份不名的人灑上污物，當即被學生和「工自聯」會員抓住，他們三個說北京話，不會湖南話。這一天下午傳來學生被打受傷，不知去向。另外「工自聯」會員和學生糾察隊員發現有大批的穿便服的軍人滲入廣場，被「工自聯」會員識破，經過宣傳軍人都走了。在這期間，北京沒有發生打、砸、搶、偷，刑事案件明顯減少，交通事故也沒有發生。

5月24日，「工自聯」發表公開言論，指出學生運動沒錯，我們工人也沒有錯，我們有權打倒一切獨裁的統治階級。我們進行的是民主愛國運動，我們要的是清官，而不是那

些騎在人民頭上，喝人民血，吃人民肉的官老爺；不是那些說人話，不幹人事的統治者；不是那些穿着漂亮的外衣，住着漂亮的別墅，坐着豪華車的腐敗政府領導人。「工自聯」喊出了針對性的口號：「賣掉皇冠，人民有穿；賣掉別墅，人民有住；賣掉奔馳，人民有吃。」

5月25日，有很多外省市的工人來要求加入「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被我們友好地拒絕了。我們回答說：謝謝你們，你們在外省一樣可以支持我們。可見「工自聯」的影響之大，且是很順民意的。我們於當天領導全市工人、學生、市民組織了更大規模的示威遊行；並且召開了會議，研究討論這些日子有哪些不足和以後該怎樣更好地進行鬥爭，廣泛地聽取學生、工人、市民、農民的意見；並派人做大量的宣傳工作，聲援學生堵軍車，瓦解部隊，跟他們講北京發生的運動。

5月26日，「工自聯」通過民主選舉投票方式，徵求廣大工人、市民、農民、學生的建議，制定出了更好的鬥爭方案，並提出了以下要求：

- 1.肯定我們這次運動是正確的；
- 2.解除戒嚴令；
- 3.把被抓的學生放出來。

並由「工自聯」帶頭喊出了下列口號：

「北京工人真敢幹，不怕瓦斯摧淚彈，北京工人真敢幹，不怕槍炮手榴彈。」

「北京工人真神氣，不怕坦克和飛機，李二餅，大傻帽（北京俗語，傻瓜之意）我們工人把你叫。」

「叫你一聲老大哥，你要鎮壓學生，我們工人跟你鬥。」

5月30日，上午我們工人領袖沈銀漢、錢玉民和白東平等三人被秘密地逮捕，我們「工自聯」得到市民的報告後，立即前去市公安局抗議，同時學生也來聲援還有市民。我和韓東方等三人進去找公安局的負責人洽談，得到的答覆是戒嚴期間，

執法部門有權拘捕、傳訊任何人。我們問：「你們抓人，進行了法律程序沒有，他們犯了什麼罪？什麼法？」對方回答不上來。「工自聯」還帶會員去新華門進行示威，抗議政府。在經過「工自聯」的示威下，工人領袖於5月31日下午6時被無罪釋放。我們同時得到消息：大批軍隊接近北京城裏，有一部份正進入天安門附近，「工自聯」立即作出決定，派大批的會員前去堵軍車，並號召全體市民、農民行動起來，不讓部隊進入北京城。同時繳獲大量的菜刀鐵棒，是部隊、警察準備嫁禍工人和學生的，我們把這些武器放在「工自聯」指揮部，進行展覽，讓廣大的工人、市民看看政府是多麼的陰險。

6月1日早晨，有不明身份的人險些把柴玲、封從德抓走，幸虧「工人糾察隊」發現及時，綁架者惶惶逃走。當天也傳來部隊又跟學生發生衝突，「工自聯」會員被打傷的消息。

6月2日，部隊強行進京，並多次發生衝突，並且我們「工自聯」的會員發現有反常現象，就是部隊跟工人、市民、學生一發生衝突就把武器扔掉，然後撤走。我們「工自聯」發現以後立即號召工人、市民、學生把檢到的武器送到公安部門和戒嚴部隊，可是他們不收。

6月3日凌晨，一輛沒有牌的警車，也就是帶路車，在經過木樨地因當時車速太快，撞死了三個無辜市民，一個受傷。當時有「工自聯」的會員在現場，問司機：「你為什麼開這麼快，置人的生死而不顧？」司機瘋狂地說：「不關你的事，我在執行軍令。」後司機逃走。我們的會員回來報告情況後，我們立即組織了大規模的示威活動。

6月3日下午，軍警以學生、工人搶奪武器為借口，於2點5分派出大批的軍警，把在新華門展覽的武器搶了回去。我們「工自聯」的會員跟他們講理，說：「給你們送回去，你們不要。作為一個軍人，槍意味什麼？是那麼容易丟掉的嗎？我們工人買國庫券，難道就是讓你們來打我們嗎？你們還有沒有中

國人的良心？」可見是政府又在施新的陰謀。3點左右，人民大會堂西側出現了大批軍隊，我們「工自聯」接到學生的告急報告後，立即打着旗幟前去聲援。當時見了部隊官員，他自稱是團長，由北大的三個學生，一個新聞工作者，還有我和他進行交談，他說保證他這個團四十八小時內不出來，有字條為證。可是到下午的情況越來越緊急，軍警們見人就打，並在前門火車站售票處等開槍放催淚瓦斯，傷了多人，其中有個老頭的左腿跟臉被打傷至血流。憤怒的工人、市民、學生把他們的軍車搗毀，各種大小衝突不斷發生。下午3、4點人民大會堂西側，在大會堂裏面，有軍警從裏向外扔磚頭，打傷學生市民多人。憤怒的市民沖去大會堂北門，被「工自聯」會員阻止，向市民說明真相；這是政府在搞陰謀，找借口。下午六點半官方廣播說，這個偉大的民主愛國運動是個革命暴亂，我們「工自聯」聽後，當即有會員，爬上電綫杆，把廣播綫扯斷。在晚上10點左右，情況越來越壞，被打傷的人回報到廣場也越來越多。晚12時，紀念堂正南方向的地鐵突然上來了很多（約四、五百個）的解放軍，排了兩個方隊，可是他們在原地沒動。這時，「工自聯」馬上發出了動員，號召拿起桌、椅、板櫈、磚頭、瓦塊做武器，保護廣場，保護學生，保護共和國。4日凌晨0點30分左右，突然有一輛坦克自廣場西南角沿人民大會堂旁的南北馬路直進廣場。同時四周響起了槍聲，我當時感覺到大屠殺開始了。在紀念堂正南方向地鐵原地待命的部隊向四周天空放紅色信號彈，可他們沒動。這時那輛坦克（我一直追着坦克車跑），沖到西北角，當時壓死一名約卅歲的婦女。當時市民都急了，一些人拿起自製的燃燒瓶向坦克投去，坦克立即起火從原路逃走，第二輛坦克也遭到同樣的下場。2點左右，大批的（滿滿的，從前面看不到盡頭）軍隊從西南角接近廣場，他們一邊瘋狂地放槍射擊，一邊前進。在「肯德基店」附近，他們走過的路兩旁躺滿了死屍，「工自聯」立即組

織工人、市民反擊。到西南角以後，我們立即開出了三輛公共汽車橫在廣場西側的南北馬路上。可是，這些車怎能擋得住全副武裝的正規軍呢！我們「工自聯」從廣場西南角邊打邊往廣場撤，一路上情況慘不忍睹，在人民大會堂前南北馬路上，死屍遍地都是。尤其是我們「工自聯」跟軍隊搏鬥的第一地點「肯德基雞店」門口，也就是地鐵以南。在我們回到「工自聯」帳篷，看見從西長安街，廣場西南角人民大會堂沖過來的瘋狂的解放軍進行了更凶狠的屠殺，他們用機槍、沖鋒槍（有些佩配刺刀），槍殺我愛國工人、學生、市民。在對着人民大會堂廣場西邊向着人民紀念碑，他們用機槍、沖鋒槍掃射達30分鐘。在這期間，「工自聯」的人也被打散了。我從「工自聯」帳幕往紀念碑撤，在廣場西側，親眼看見多人被打死、打傷。但是，我們「工自聯」的工人會員說得好：為民主，為自由，我們願意流盡最後一滴血，戰鬥到最後一個人。他們連醫護人員都打，當時打死二個醫生。我們還要衝，但是一個醫生說：「你們退後，由我來講。」於是，他大聲喊「自由，自由」，可是法西斯的士兵不聽，繼續開槍鎮壓。「工自聯」的會員被打散，我在醫生的幫助下，坐救護車躲進了友誼醫院。醫院裏的死屍很多，有上了年紀的老大爺、老大媽，更多的是學生，還有「工自聯」的人。沒有一個北京市民不掉淚的，早上我聽說「工自聯」死亡、傷的很多，活的已經很少。難道我們工人買國債券就是讓他們打我們的嗎？

同胞們！我是「工自聯」的會員，也是負責人之一，我親眼目睹了6月4日解放軍是怎樣屠殺人民的。在這裏我紀錄了「工自聯」的情況，就是讓更多的同胞對這個組織有更多的了解。我所寫的只是「工人自治會」的一部份，現在中國警方正在追殺「工自聯」的會員和廣大的民運鬥士，他們想趕盡殺絕。這是辦不到的！只要我們團結起來，跟他們鬥，就不怕他不倒。通過六四慘案血的事實，暴露出了以鄧小平、李鵬為首的偽

政府法西斯的嘴臉，血債要用血來還，我們活着的「工自聯」的人一定要跟他們鬥爭到底！

在這裏，我向在這次民主運動中犧牲的，「工自聯」會員、無辜的市民、學生表示深切的悼念。

我們「工自聯」活着的會員宣誓：

一定要把民主鬥爭堅持到底，不打倒以鄧小平、李鵬為首的偽政府，我們誓不罷休！

偉大的民主運動萬歲！

偉大的工人階級萬歲！

偉大的工人自治聯合會萬歲！

偉大的學生萬歲！

偉大的北京市民萬歲！

別了，在這次偉大的民主愛國運動中犧牲的「工自聯」會員。安息吧！我們活着的人一定把你們未完成的事業進行到底。

一九八九年十月

工自聯運動簡史

陸 萍

1989年4月開始，中國學生舉行示威要求民主，清除貪污，要求有一個開明及向人民負責的政府。學生更組織自治組織。與此同時，「工人自治聯合會」也應運而生，打起中國自49年來，第一面獨立工會運動的旗幟。

5月中旬，約百多名工人，在「工人自治聯合會」的紅旗下，和「要求民主」、「結社自由」、「反貪污」、「支援學生」的激昂口號下，在天安門廣場學生篷帳的邊陲樹立了他們的篷帳。

「工自聯」的成員主要由產業工人、服務業工人、建築工人和工人知識份子組成；它的核心有鋼鐵、鐵路、航空工人、售貨員、雜工、學生和教師等。

打起歷史性的旗幟

「北京工自聯」的大本營除了北京市的工人外，也有來自東北、天津、山西、江蘇、湖北、湖南和多個北方城市的工人；年齡從二十到四十多歲不等。這些工人，首次嘗試在官方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以外，自發地建立自治組織。

「工自聯」的組織者透過散發小冊子和傳單，批評當前的

勞工政策、工會結構；號召工人建立真正的、民主的工人運動。他們並在天安門廣場設立宣傳「工自聯」及其他工人的民主要求的公開廣播站。「工自聯」廣播站因剛好設在長安大街上，加上他們的廣播稿言詞鋒厲，生動有趣，有詩、有順口溜、有流行曲寄調新詞，迅即成為市民大眾歡迎的廣播。在他們的廣播喇叭下，在不同的時間裏，總得站上好幾百人。從天安門廣場出來的民運人仕，對這廣播站都津津樂道，印象尤深。

「工自聯」組織者的工作條件艱苦，他們在廣場上簡陋的篷帳下，在烈日、雨水、寒風中，又缺乏食物、睡眠，日以繼夜二十四小時輪班糾察；每時每刻受著來自兩方競相宣傳的廣播轟炸。一方面是學生、工人廣播要求口號、國際歌和其他革命歌曲；另一方則是官方廣播強硬宣傳戒嚴措施和多方恐嚇。

日間，不論任何時候，上百甚至上千的工人、市民，圍繞在「工自聯」的擴音器周圍聆聽演講；每當「工自聯」散發傳單時（由於印刷物資匱乏，傳單是零零星星的），羣衆一湧而上搶閱，而傳單的數量往往遠低於要求。

「工自聯」設營招攬成員，前後有近萬名工人參加；更有數百工人成為他們的通訊員。

5月底，北京局勢漸趨緊張，「工自聯」三名核心成員被公安局秘密扣留，立即引起工人、學生及市民羣起示威抗議，要求當局放人。「工自聯」成員在韓東方等領導下，嘗試與公安部談判（這起事件其後被中國政府定為「攻擊公安局」罪行；現為韓東方主要被指控罪名之一）。三人稍後雖然獲得釋放，但受到嚴密監視（其中一人白東平更在六四後再次被拘捕）。當時，「工自聯」其他領袖及核心成員，也不斷被公安人員跟蹤。

但在如此緊張恐怖的環境下，「工自聯」核心成員還是堅持下去。雖然已有軍隊進城襲擊的跡象，但他們還相信政府和一支人民軍隊，不會殘暴殺害市民學生。在6月初，他們還在

草擬「工自聯」章程綱領的修訂稿，爭取多方面意見；他們當時的構思的首要工作為：在基層工人間建立聯絡網、鞏固內部組織、擴大宣傳、發展會員、並與新生組織拓展資源、培養領袖、發展會員技能和組織基本架構。

「工自聯」當時討論的問題有官僚腐化、特權精英專政下工人所受的困苦；工廠工人和經理之間日益加深的工資差距；工作單位內缺乏民主，決策過程沒有真正的工人代表；工作環境及保障每況愈下，近年來生活條件嚴重下降。

6月3日，「工自聯」領袖還在討論探討組織合法化的方法，例如跟「全國總工會」內較同情他們的單位建立聯繫，及在民主黨派中爭取支持。他們堅持在憲法下透過合法手段組織自治聯會，並且聲明他們不反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

工人組織在學生爭取民主自由運動裏，經過差不多一個月的籌組，體會到爭民主自由鬥爭和他們的切身利益攸關，有助於工人真正和獨立的代表參與政策制定，得以改善工人的經濟地位。

工人與學生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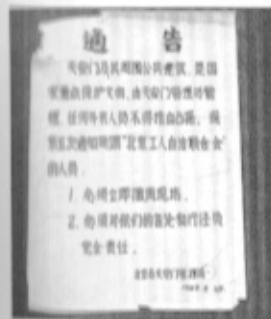
雖然「工自聯」自始創時，就鮮明打出「支援學生」的口號，但學生對工人直接主動地介入民主運動有抵觸情緒；部份學生明顯地想把運動規範為學生和知識份子的運動，堅持保存學生運動的「純潔性」，對工人組織具有戒心。因此，直至5月下旬期間，廣場學生的指揮部一直拒絕讓「工自聯」在廣場內設立大本營。「工自聯」有見及此，只好在長安大街廣場的對面設營。只是在5月底形勢漸趨緊張，工人領袖被抓，學生指揮部才讓「工自聯」遷進廣場內，以保安全。

「全國總工會」的矛盾

「全總」在學生開展民主運動的初期曾經表示過支持，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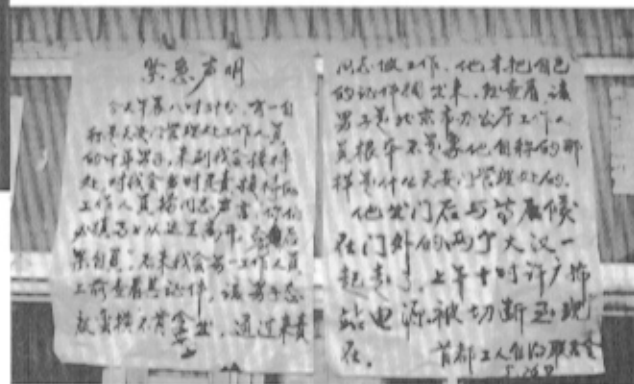


▲「工自聯」張貼的急需電油的傳單。



▲北京市天安門管理處張貼的通告。

▼「工自聯」針對天安門管理處的緊急聲明。



於學生絕食期間捐贈十萬元人民幣予學生。在5月中北京百萬
人示威行列中，亦出現過「全總」的旗幟。不過「全總」畢竟
在架構上只能在共產黨駕馭之下生存，當中共對八九民運鮮明
表態後，「全總」也只能跟緊其後。在屠殺前一天，6月
2日，「全總」在《北京日報》發表聲明，譴責「北京工自聯」
是非法組織，呼籲政府鎮壓「工自聯」及其活動，又呼籲工
人「團結支持」這些鎮壓和取締措施。六四之後，「全總」各
系統單位均受命全力攻擊「工自聯」。6月至8月期間，《工
人日報》（「全總」的喉舌）不斷刊登惡毒攻擊「工自聯」的
文章；說它是「反革命暴亂的急先鋒」，是一個「流氓政治團
伙」，更屢用「社會渣滓」、「暴徒流氓」、「敗類」、「四
人幫的殘渣餘孽」等名稱形容「工自聯」成員。

不過，從另一角度看，也可說這些盲目攻擊為自我保護手
法。如在6月28日《工人日報》刊登全版攻擊「工自聯」的
文章裏，其中主要來自「首都鋼鐵公司工會」、「北京市公共交
通總公司工會」、「北京鐵路局工會」、「北京人民機器製造
廠工會」等，當然還有「北京市總工會」，如細心一看，這些
工會單位，正正是「工自聯」的核心成員和活躍份子所屬單位
！若這些工會不站在最前頭攻擊「工自聯」以示清白，當官的
烏紗帽也隨時被除。去年底，「全總」的總書記朱厚澤終於被
撤職，相信原因也在那十萬元捐款的責任問題上。

實際上，中國工人受了「全總」幾十年的「官氣」，已視
它為紙老虎都不如，成為人們的笑柄。工人們在這龐大的官方
工會駕馭下，總是有滿肚冤屈和牢騷，也只能藏在肚裏，覺得
有冤無路訴！所以當「工自聯」的旗幟一打出來，號召工人組
織一個獨立的，能真正為工人說話的工會運動，其對工人及官
方工會的震撼力可想而知。故此，在「北京工自聯」打出旗號
後，迅即在各個城市也有「工人自治聯合會」之成立；包括上
海、廣州、杭州、南京、西安、蘇州、長沙、福州、濟南、呼

和浩特等市。當時，在這些不同地區「工自聯」間，也有談論
到互相串連的工作；而各地「工自聯」都視「首都工自聯」為
「大阿哥」。

回顧過去，有足夠跡象顯示中共決定在6月初進行暴力鎮
壓北京民運，很大程度是受着風起雲湧的「工自聯」成立所引
發的。學生運動從4月中旬開始，整整一個月內，中共還不動
武；而5月下旬情況就急轉直下。學生搞運動只是局限於校園
範圍內，學生始終是學生，不可能對社會和政權產生重大和實
質的影響。一旦工人、農民、及一般市民都加入反叛行列，尤
其是當他們的行動進展為組織時，對政府獨裁統治之挑戰就不
可小窺。中共一直靠著「工農兵」（工字帶頭）的旗號起家
，四十年來，一直向海內外大肆宣傳，說全國無產階級都「團
結」在它之下；「工人自治聯合會」之組織，可說是往中共臉上
攔了一巴掌。再加上波蘭「團結工會」之組成，最終取得政權
之前車可鑒，中共更不寒而慄，實行趕盡殺絕之血腥鎮壓。中
國政府在6月3日宣佈「高校自治聯合會」，及「工人自治聯合
會」為反革命組織；可看到當權者看待「工自聯」的重要性，甚
凌駕於「知識份子自治聯合會」、「市民自治聯合會」等其他自治
組織之上。

六四後之赤色恐怖

6月3日當天，北京多處出現大批軍隊進城，引起多宗流
血事件，軍隊向嘗試阻攔他們進城的市民開槍屠殺，其中大部
份受害者乃是工人羣眾。「工自聯」的成員往往是示威羣眾中
最勇敢的一羣；他們高舉工會旗幟，列隊走在羣眾的最前面，
面對軍隊。在六四屠殺的凌晨，「工自聯」的篷帳駐紮在天安
門廣場東北面，大批軍隊圍集在廣場的這一端，最後「工自聯」
的廣播站也被迫撤走，大批文件被燒掉。

屠城之後，中國政府宣佈重點通緝和拘捕「工自聯」和「

高自聯」的領袖和活躍份子；更設立了舉報熱線，以配合其追捕行動。

當時，在極權暴力鎮壓下，各地城市還是有學生、工人、市民上街遊行，抗議當局的血腥鎮壓暴行。在上海、廣州、長沙、湘潭、福州、南京、成都、武漢、太原、西安、昆明、鄭州、長春、哈爾濱、杭州、烏魯木齊、天津、蘭州、合肥、青島、濟南等多個城市在6月6日至10日都有示威行動，其中不少有「工自聯」的旗幟，多處更有呼籲工廠罷工以示抗議，當時就有好些工廠停工了一段時間。可惜，在當權者的殘暴鎮壓下，人民還是被迫暫時隱退下去。

隨著六四屠殺，中國政府對民運人仕進行「赤色恐怖」政策，大肆殺害、槍決、追捕、監禁及施刑，其中首當其衝的往往是工人階級。

在當局拘捕各地示威人士中，在6月首先公佈處決十二名工人，名單包括祖建軍（北京）、張文奎（北京）、王漢武（北京）、陳堅（北京）、羅紅軍（北京）、林昭榮（北京）、班會杰（北京）、卞漢武（上海）、徐國明（上海）、嚴雪榮（上海）、王貴原（成都）、周向盛（成都）等。這些被殺害人仕都來自工人階級，被控罪名是暴力反革命破壞，包括：焚燒軍車、焚燒一列在上海撞死臥軌示威羣衆的火車、偷軍服、毆打軍人等。

另外，有四名工人亦被控同樣罪名而被判死刑。他們是：何江（成都）、何強（成都）、王連禧（北京）、李偉紅（長沙）等。還有被判終身監禁的，已知姓名的有：倪二福（成都）和芮朝陽（西安）二人。

6月12日，「中央電視台」播出一名「上海工自聯」領袖被公安局拘禁的影片，從影片所見，這名領袖被打得遍體鱗傷。9月下旬，上海《文匯報》報導，「上海工自聯」九十多名核心成員裏，已抓去了七十二名；其中公佈姓名的有：王妙

根（工人）、王虹（工人）、張仁孚（工人）、周勇（工人）、李志波（工人）、恭辰成（工人）、陳盛福（工人）、蔡超軍（待業工人）、張期望（個體戶）、鄭良（工人）等。可見中國政府對「工自聯」是採取趕盡殺絕之政策。

有公開宣佈的被捕「北京工自聯」成員包括：韓東方（工人）、劉強（工人）、賀利利（教師）、劉煥文（工人）、李江（工人）、田伯民（工人）、嚴富乾（工人）、郭亞雄、尤鈿祺等人。

當然，還有無數未知名的被捕或被殺害人仕，只希望在很快的將來，他們能夠沉冤昭雪。

八九工人自治運動，是一項歷史性的英勇行動，標誌了自1949年以來工人第一次公開嘗試爭取獨立組織的權利。「工人自治聯合會」目標激進，意願真切，行動英勇，手段和平，大得人心。換來中國官方以殘酷殺戮，拷打折磨，無期拘禁的對待，這棵中國獨立工會運動之新苗現正處於黑暗時期，希望曙光即將來臨！

工自聯人物剪影訪問(一)

——從售貨員到後勤部長

問：你今年多大年齡？在六四前你在什麼單位工作？出身於什麼家庭？

答：我82年畢業在家待業兩年，84年參加工作，最早在公共汽車當售票員，因為我對這個工作不喜歡，所以要求調動，86年調到北京一商場當售貨員，一直到離開北京。我今年26歲。父母可以說是一般幹部。

問：你唸過幾年書？

答：高中畢業，在北京某中學唸書。

問：在北京你的家庭稱中等還是比較好的？

答：算比較好的，家裏人都工作有收入。

問：你對你的工作環境滿意嗎？

答：不滿意。工作條件差，我特別看不過眼我們單位裏幹部貪污的情景。

問：中層幹部還是上層幹部貪污？

答：真正貪污是從經理到各商品部各部長。我們商場有些處於沒人管狀態，經理不管理，商品部長願意怎麼辦就怎麼辦。真正調查的是下層的工人，貪污的都是領導。××商場服務公司一個經理，每次為商場進貨都要吃很多回扣，我

們每月就只有一百二十元錢，獎金還沒有，看到這種現象我有看法，我就不願意幹了。

問：你在商場工作時每星期工作幾天，每天工作幾小時？

答：商場工作沒有休息日，名義上有實際沒有。每星期五、六、日商場最忙，我們就得加班加點，加三小時班給一塊錢，這一塊錢能做甚麼？每天說是八小時工作實際每天都工作十幾小時。商場規定早上八時三十分上班，職工七時三十分就得到單位，不到者算遲到要扣工資。這一個小時要往貨架上上貨，晚上八時三十分關門，我們下不了班，要點貨、盤貨，每天都得九時十分才能下班。

問：一個星期中有休息日嗎？

答：如果我們不休息算加班，單位給加班費，一天是五元錢。

問：是不是你們應該星期日休息？

答：對，實際休息不了。

問：每天從早七點多至晚上9點多？

答：是，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

問：你每天這麼長的工作時間，一個月能賺多少錢？

答：每月全部收入有一百四五十元左右。

問：你在一年中有多少天休息？

答：我一年中的休息，只有在生病時才休息，有時生病（單位）都不讓你休息。

問：每年春節休息嗎？

答：春節時可以休息三天，有時也不能休息，商業單位遇過節越忙。工人平時有病條要求休息，常常不被批准，除非有急病才能休息。

問：你的醫藥費是單位給的是不是？

答：看病須到本單位的合同醫院。小醫院像個門診部，看病還得買他們的東西，醫院裏鍋、暖壺，還得自己掏錢。有些單位醫藥費是包幹性的，一年或一個月醫藥費超過單位規

定的錢數自己付。

問：你的單位有否工會？你是否加入工會？你們工會做些什麼工作？你們對工會的印象如何？

答：我們單位有工會，但如同虛設，工會根本不為我們做事。工會應當為工人辦事，可是現在許多工會幹部打着為工人服務的旗號謀個人的私利。

問：你是工會會員嗎？

答：不是，我對工會很反感。

問：你單位有多少人參加工會？

答：我們三千多人的單位僅有少部份人加入工會。

問：你剛才講，你的父母是幹部，他們對共產黨的看法如何？是否認為是一個很好的黨，他們有沒有要求你參加共產黨？

答：我父母是普通的幹部，都是共產黨員，我的姥爺也是共產黨員，他在文革期間受到迫害。我的父母、姥爺對我進行各種教育，他們講共產黨是很好的黨，必須時時為黨工作，否則共產黨就要整你。

問：就是說你從小就對共產黨印象不好？

答：我小時對共產黨認識模糊，當時受的教育就是共產黨好，國民黨不好。上高中後，我逐漸懂事了，有分析能力了，我就這想，國民黨我沒看到，他們沒給我帶來什麼壞處，共產黨也沒有給我帶來什麼好處，上學沒有一個好的環境，工作後微薄工資僅夠糊口。

問：再問一個抽象問題，你對社會主義理解是怎樣的？在過去幾年中你們對資本主義有些接觸，你的理解是怎樣的？對這個問題你思考過沒有？

答：我考慮過。社會主義告訴我們人人要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現在可以說我吃不上飯。從我了解的情況看，資本主義社會的人民生活總比我們好。我認為共產主義太渺茫了，是在欺騙我們，是一種愚民政策。對社會主義我到現在認

識都很模糊，共產黨搞的一套很難以讓人信服。我羨慕資本主義的發達，同樣是人，別人就搞得那麼好，我們就那麼差，這是為什麼？根源在政府。

問：你有這種想法是參加工作以後嗎？

答：工作以後，我看過一些書上面對資本主義國家有介紹，人家每星期工作五天，而我們每星期工作七天甚至八天，因為每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沒有休息，老是崩緊弦的幹，還是難以維持生活。一月工資吃了就不能穿，穿了就吃不上飯。

問：八九民運你為什麼參加？你的出發點是什麼？你參加民運的目標是甚麼？

答：以學生為先導的民主運動，喚醒我們。這些年國內經濟蕭條，失業人數很多，我高中畢業在家待業兩年才找到工作，一些女孩子找工作更困難，沒工作生活就沒保障，而有工作也是為生活，自己沒有權力選擇自己喜愛的工作。公民選舉權實際被政府剝奪，選舉領導人只是拿着他們事先印好的選票走一下過場，領導人不是大家信賴的人，他們不為人民辦事，所以我們贊成民主運動，學生們反貪官講出了我們工人的心裏話。4月19日警察打學生，我認為我們工人應該站出來，學生提出的合理要求，軍人警察不應打學生。最初我們並沒有想要成立什麼組織也沒有想要打倒共產黨，只覺得有責任。5月20日後政府、軍人越來越不像話，他們說學生是搞動亂，這時不光是我自己凡是北京人都很氣憤，這時我們覺得要成立自己的組織自己的工會，「全國總工會」這個組織不能代表我們工人，它是騎在工人頭上的貴族。我們就自發的組織起來了。

問：這個組織的過程很重要，你剛才講要成立自己的組織，你們是自己認識到的還是學生講的？是發自內心的嗎？

答：4月17日後學生游行提意見，我們當時只是看聽，我們認

為學生講的有理，說出了我們工人的心裏話。我們就像從夢中醒來一樣，忽然間認為我們要有自己的組織，工人要站出來。我們接受了學生的意見，又深入工廠。

問：你們當時每天去廣場，在單位叫「開小差」，你單位有甚麼反應？其他人有什麼反應？

答：我在單位一講，學生現在反貪污，大家都明白，都表示要一起幹，一些單位領導也支持我，經濟上也支持我。

問：後來組織開會是在什麼地方？廣場？學校？還是什麼人的家裏？

答：開始沒開會，後來一些較重要的會是在「北大」開的，也有一些會是在別人家裏開的，研究今後應當怎樣幹。通過討論交流，我們有了較明確目標，不像開始那樣盲目了。

問：你們怎麼會想到「工人自治聯合會」的名字？

答：我們認為這個組織是自發的，很多工廠工人參加，是我們工人的組織，所以叫「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最初叫「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

問：你認為「工自聯」目標是作為一個工會、是一個工人組織還是一個政黨？

答：我認為「工自聯」是工人羣衆組織，不想成為政黨，就是想成立工會。我們要有自己的工會，工人要有參政意識，要有自己的獨立思想。

問：你認為「工自聯」應該為工人做些什麼的工作，它的作用是什麼？

答：「工自聯」應該給工人很好的勞動保護，女工不應受到歧視。而且「工自聯」應當成為獨立的組織，不應受其他黨派控制，應該有監督共產黨政府功能，不能讓「工自聯」像「全總」一樣成為黨的馴服工具，不為工人做事。

問：你們當時想到是要為工人爭取權利，監督共產黨政府，有沒有想到要走什麼路，是走資本主義的路還是繼續社會

主義的路？

答：我當時想法是，再走社會主義的路是行不通的。如果想把國家治理好，無論是從政治角度還是經濟角度，就得走資本主義的路，要有自由經濟（按價值規律辦事），不要壓抑工人的才幹，要讓他們有選擇工作的權利。社會主義壓制人才，學電子的大學生讓他去燒鍋爐，學非所用在大陸很嚴重，人的積極性調動不起來。

問：我跟「工自聯」其他的人談過一些，他們認為還是要走社會主義的路，資本主義還是剝削工人的。你覺得你們之間有什麼不同的想法？

答：我的看法和別人有分歧，我認為社會主義對國家作用太小（一些政策抑制生產力發展），我認為資本主義路對。為什麼這麼說，比如我到一家工廠做工，只要賣力氣就能掙飯吃，沒人會評論你工作以外的事情。大陸做工不是看本職工作好壞，而是憑關係憑印象，幹與不幹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養懶漢讓人不服氣，這樣單位好不了，國家也就好不了。資本主義「物盡其用」有能力的人不愁沒有用武之地。

問：你和韓東方討論過這些問題嗎？他如何看這些問題？

答：當時各執己見，大體上是一致的。我們主要是針對政府一些不好的現象提一些意見，規勸政府，反過來他們說我們是違法的。我就想共產黨當初成立時也被視為非法組織，但當時代表一些人利益，「工自聯」被共產黨視為非法組織，可它代表我們工人的利益，這個道理過去現在都相同。

問：可以從你們怎樣開始組織「工自聯」作個介紹嗎？

答：好。4月中旬開始，學生悼念胡耀邦，發展成為要求民主的運動。我們看到好一些現象，比如學生要求對話，到絕食，政府不理也不睬，把學生運動說成是動亂，我們很氣憤。我們同時感到學生確實說出了我們工人的心裏

話。我們感到這次學生運動已經和我們工人緊密的組合一起。

4月20日，我們聽到學生被打的消息很氣憤。我們認為，這種時候我們工人應該站出來，保護我們的學生。4月21日在紀念碑下，有我、韓東方舉行了一次演講，演講的題目是《軍民魚水情的問題》。因為當時在人民大會堂正東方向有五排警察，紀念堂南邊也有很多警察，紀念堂北邊也不允許走，只許走南邊，都爲了給軍車讓道。我們爲什麼要講「軍民魚水情」呢？我記得上學時聽老師講軍愛民，民擁軍；當我們看到學生被打，有一個學生左眼被打，我們扶着他站在中間爲了讓更多人看到。一邊是裏六層外三層警察，一邊是學生，這能談什麼軍民魚水情？他們拿皮帶、木棍、警棍打學生，用皮鞋踢學生。我們認為我們工人有權也應該站出來保護學生。

我們成立「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是在4月17日開始組建，開始就幾個人。我們覺得應該到更多工人的支持，籌備工作大約進行了一個月。

問：我想問一下，你們在4月17日組織時，你們互相認識嗎？

答：開始時不認識。我們在（天安門）西觀禮台聚在一起。

問：爲什麼要在西觀禮台那裏聚？

答：學生有糾察隊，不允許其他人和學生一起。我們很自覺，就集中到西觀禮台。我們開始在一起議論，我們認爲學生說的對，我們工人也應該組織起來，所以我們約好第二天下午五點（見面）。

門：就是18號？

答：對就是18號，還在那裏見面。見面時，有人提出，光是我們幾個人不行，讓我們回單位聯繫，我們定20日下午再見。韓東方還提出說成立這樣的組織，要取得一定的合法



▲ 4月20日凌晨4時30分，新華門外約一公里處，公安人員驅散及毆打學生。

鎮壓學生運動的人

絕沒有好下場

——毛澤東

性。

問：之後呢？

答：20號見面，我們聽說學生被打了。

問：有沒有多一點人來？

答：來的人比較多了，我們單位去了十幾人，還有其他人。

問：有沒有新的領袖出來？

答：有。來了一個姓×的，「××」的職工，他說工人應該團結起來，組織起來，有綱領有宣言，要讓廣大的工人、市民、全國各地的人都知道有這樣一個組織。

問：20號主要是較多人聚在一起，有什麼決定沒有？

答：有。我們認為，我們工人知識不如學生多，我們去了「北大」。

問：你們去「北大」做什麼？

答：我們去了「北大」鐘樓，好像是學生的聯絡處，我們把想法跟學生說了，學生們表示：「行！如果有什麼需要幫助的儘管提出來。」我們表示需要印刷設備。有一位學生說：你們最好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成立這個組織。他們還說如果你們要搞印刷品，可以拿到我們這裏印刷或複印。之後，我們天天去廣場，但沒有大的行動。只是在西觀禮台貼出一張廣告，大意是：北京學生這次運動說出了市民、工人的心裏話，我們市民、工人應不應該站出來保護學生？我們想成立這麼一個組織，希望廣大市民、工人幫我們出主意，怎樣成立這個組織，以怎樣形式出現。

4月26日有人出來說這個組織是非法的，說便衣警察要來抓我們，我們說抓就抓，正要找他們評這次運動到底誰對誰不對。這時老蕭說，咱們向政府申請一下，看政府批不批。27日他們就去申請，下午回來說政府不批，說是非法組織不能成立。我們聽了非常氣憤。

問：去哪裏申請？

答：公安部，還有市政廳。我們認為這個組織是正確的。你說非法的，我們還是要成立這個組織。4月17至27號，我們四處去宣傳，比如：「××」、「北京××廠」去宣傳。他們搞團的工作人要我們多注意，他們擔心我們安全。

問：你去他們那裏宣傳是和工人談，還是和團幹部談？

答：先和工人談。

問：你們可以進到裏面？

答：可以。

問：你們去找誰？

答：我們就進到車間，趁工人吃午飯的時候進行宣傳，我們談到想成立這樣一個組織，希望得你們的支持。他們百分之百的說：只要你們成立這個組織，我們就擁護參加。我們的信心很大。這時有人要求把工人的利益說一說。我又說你們看到學生就看見我們，學生在挨餓，咱們工人不出來誰出來？

問：請你把廠裏的講多一點。

答：這裏也有搞工會的。「××」有人說，你們搞這個組織，要以工人階級的利益為主體，不要光以聲援學生為題。

問：這是「××工會」講話？他們不像「全國總工會」那樣？

答：「全國總工會」根本不幹正經事，我們找他們，他們根本不理睬我們。

問：「××工會」和你們談，有反應？

答：是，他們和我們談的挺融洽，給我們提了很多可行性建議。

問：他們有什麼建議？

答：你們成立工人組織有什麼綱領，要達到什麼目的？從哪方面講，以後怎樣發展等等。我們說：一人想不如大家想，所以我們到你們這裏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問：是你一人去還是有其他人？

答：有好幾個。

問：你們去「首鋼」和「北京鍋爐廠」，還去了哪個廠？

答：這兩個單位都較大。我們除了去這兩個單位外，還動員本單位職工參加，每次去都挺多人。正式打出「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的旗幟是4月20日。

問：你剛談是27號去申請，去過「××」、「北京××廠」宣傳，還有什麼其他事發生？

答：這時學生的情況較困難，我們常提供一些水和食物。

問：後來有什麼新的發展？

答：新的發展是4月底，我們商量要把旗子打出來。

問：在什麼地方？

答：西觀禮台。原本打算4月底旗子可以打出來；可很多東西，全市商店都不賣。後來通過些聯繫，找到農村大隊，才搞來所需的東西。

問：然後在西觀禮台打出旗子？

答：我們用白布，因為沒有紅布，在上面寫「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在牆上貼白紙，也寫上「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

問：在4月底有常委會產生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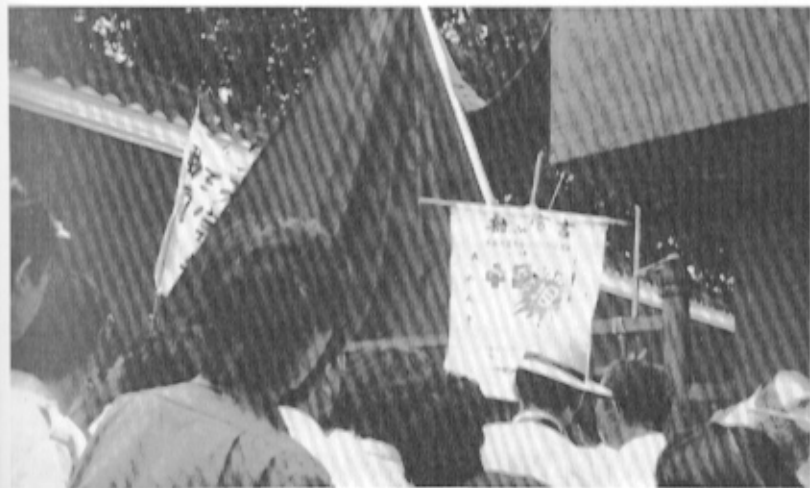
答：還沒有。當時籌備組織的宣傳稿文。我們拿底稿到「北高聯」、「北大」請學生幫忙寫的。先有這樣的宣傳，讓大家知道有這樣一個組織。

問：4月底有沒有廣播？我是指有沒有喇叭？

答：4月底還沒有喇叭。

問：那主要是油印、複印宣傳稿件？

答：對。這時工人很多知道這個組織，都來打聽如何加入這組織。當時我負責登記，參加這個組織必須拿工作証或身份証，我們還要做到保持組織的純潔性。



▲〈龍的宣言〉。



▲在天安門廣場西觀禮台的「工自聯」總部。

問：一天大概有多少人登記？

答：5月2日已有兩千多人。

問：除了會員証之外還有什麼東西給申請的人？

答：通行証。是自製的通行証，一天一換。

問：5月20日正式成立的？

答：是。正式成立時我不在，我正在廣場給絕食學生發放食品。學生那時開始募捐，我們把自己的存款拿出來，買了喇叭、紙、油墨。

問：那就是說當時你負責廣場上的事情，另一部份人籌建「工自聯」。籌建的人有誰？

答：有沈銀漢，還有叫白東平、韓東方、劉強、老蕭，他們去「北大」，最早「工自聯」籌委建在那裏。5月20日，「工自聯」大體完善了，準備工作就緒，我們用紅布寫上「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掛在一輛130路公共汽車上繞北京三環路一圈。

問：北京那天有遊行嗎？

答：沒有大遊行。我們敲鑼打鼓，用喇叭廣播北京工人已經組織起來了，「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成立了。

問：有沒有見記者？

答：見了台灣記者。但當時我不在，學生成立了廣播站，我拿一些稿件讓學生幫助印。

問：給學生印？還是請學生幫助？

答：是「工自聯」印稿件，請學生幫忙。

問：有沒有成立典禮？

答：我們找「高自聯」郭海峯，還有一個女同學商量，我們「工人自治會」能不能進入廣場裏面，他們表示歡迎。我們於5月20日下午搬進廣場，白天人不多，晚上下班後人才多起來，宣佈「工自聯」成立是沈銀漢和韓東方。

問：在哪裏宣佈「工自聯」成立？

答：就在廣場。同時宣讀「工自聯」綱領。20號成立的過程就是這樣。以後的日子裏經常聽到警察打人，部隊要進城。我主要負責那裏緊就去哪。堵軍隊，帶工人上街宣傳、演講。5月26日學生報告，公安局抓了學生，學生人數少。我們去了六輛卡車，拉着「工人自治會」的人，救人工作是晚上。我們打着「青年軍」的旗子，還有「工人自治會」的旗子。心想聽說我們要去救學生，「市民敢死隊」青年一定要跟我們去，他們有多輛摩托車，被官方稱作「飛虎隊」，實際上我們稱呼他們為「鐵騎軍」，他們消息來源較快。

有一名很有正義感的民警，他是××縣交通大隊的，他出來就告訴我，他們抓的學生就關在他們交通大隊裏。我們聽見後很氣憤。從他們××公安局轉回頭來，跟着這民警到了他們交通大隊，他說：「你們不要把我說出來」，我們就跟他的交通隊要人，要學生。交通隊說：「我們沒有抓人，我們只是看着他們（學生），你們還得去公安局。」我們又去公安局，他們不承認抓人了。工人、青年學生急了就往公安局裏扔石頭、磚頭，我們並沒砸玻璃，只是往門上扔，屋裏東西沒有毀壞。我們只是讓他們出來解釋。縣公安局的一個負責的官出來說，你們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是去交通隊讓他們把人放了。

問：叫你們不要搞公安局？

答：是，他們還是讓我們找交通隊。於是，我們分成兩部份，一部往留在公安局，一部往去交通隊。後來交通隊就把學生放了。

問：當時有多少人在裏面？

答：有八個學生在裏面。學生讓警察打的不成樣子。據學生講，他們截軍車，軍車看見他們走了，有一個連長模樣的人，還有一個指導員，對學生進行解釋，並沒有打他們。



◀「北京工自聯」會員報名登記處



▲ 5月30日，「北京工自聯」成員到公安局抗議秘密警察無理拘捕了三名「工自聯」成員。

打他們的是警察，先來的部隊沒打人。我們趕到的時候，事情已經過去了，不然肯定會發生衝突（跟警察）。

問：放了人之後怎樣？就沒事了？

答：放人之後那天就沒事了。學生認為，警察打人不好，但我們也不要過激的行為。

幾天後沈銀漢被抓起來了。沈銀漢是在「北京飯店」門前被抓，當時沈銀漢騎單車在長安街上，幾個人從一輛212吉普車上跳下車把他架到車上了。當時沈銀漢比較鎮靜，把他的日記本扔到馬路上，沒有讓抓他的人看到。是市民檢到後送到我們那兒的。這個市民還用相機照了抓了沈銀漢那輛車的車牌。我們一看車牌，又有沈銀漢的筆記本，有物証、人証，我們就去公安部（要人），公安部說，他們不知道，他們說，抓人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事，與他們無關。我們又去公安局。於是我和韓東方，還有「敢死隊」的一些人下午就去了市公安局。我們在門口沒打也沒罵那些人。只是向他們要人。我們當時進去三個人，有我、有韓東方。進去後我們跟市公安局長談，他問我們是幹什麼的？我們說是「工人自治會」的，我們的領袖被抓了，就在你們這裏。他否認，說人沒在他的局裏。我們堅持說：人就在你們這裏。因為我們看見那部車子，就和照片上的車牌號一樣。

問：你們找到那部車子了？車在哪裏？

答：就在市局的後門。這是市民告訴我們的。因為事情發生後，我們對市民講，誰發現這部車子就到「工人自治會」告訴我們，我們公佈了車牌號。

當時我們恐怕我們從前門進了，他們把人從後門帶走，我們就有一部份「敢死隊」的隊員去了後門，他們看見車想開出來，又開回去。工人很氣憤，說：「車明明在市局，可是他們說瞎話；說車不在裏面，人也沒抓」。工人、學

生、市民很氣憤，就把那輛車砸了，但是並沒有燒，把玻璃砸碎了。當時市局領導給我們一個答覆：「在戒嚴期間，屬於非常時期，國家執法機構有權拘捕、傳喚任何一個人。」當時我們提出：「你們抓人有什麼法律程序？根據什麼抓人，他違反了哪一條法律？」他們說：「你們別在這胡攪蠻纏。」說我們正當要求是胡攪蠻纏。我仍堅決要求他們放人。後來，他們把人偷偷摸摸放了。

問：他們抓的不是一個人，是三個人？

答：抓了三個。有一個是在上班的時候被抓的，他穿着單位的制服，有兩個人去找他，他叫錢什麼的？

問：這這個姓錢的你認識他嗎？

答：之前我也不認識他，他被抓後才知道。

問：還有另外一個呢？

答：另外一個也差不多情況。

問：也是上班時被抓的？

答：是，秘密逮捕。到月底時就有人告訴我，派出所老有人到我家找我。

答：到你家裏？還是就在外面？

答：就在外面。6月3日下午2點多鐘，解放軍在六部口一帶放了催淚瓦斯，打傷了一個老人，是催淚瓦斯傷的。這時在人民大會堂西側南北路來了有一個團的解放軍，後面還有部隊，還有一個團。別人跑來告訴我們，說已經發生衝突，兵已經進城了，你們「自治會」趕快去，於是我們就打着「工人自治會」的旗子趕去。我們到了後和那個團長交涉，那個團長表示，他的部隊四十八小時內不出來；當時我，北大三個學生還有一個搞新聞的一起簽的字，按的手印，那張字條在北大學生手裏。

問：誰簽字？軍隊簽？

答：是軍隊、「北高聯」、和我們「工人自治會」一起簽。

問：你代表工人簽字？

答：是我代表「工自聯」簽的字。我隨後問那個團長的姓名、部隊番號。他說：「我不能告訴你太多，我們其實也很難辦，我們到這來的目的我不清楚，只是說演習、拉練，具體是什麼我也不知道。我們已有兩個星期沒看報紙了，對外界一點不清楚。進城後好像百姓不歡迎我們。」我們對他解釋，說百姓是不歡迎你們。那隊團長再次重申他的部隊四十八小時不會出來。

當日晚上（3日），從各方面傳來消息都是壞消息。安定門正北，木樨園正南，正西是萬壽路，各路都在進兵，建國門正東也在進部隊。我們聽到消息後，就打着「工人自治會」的旗子帶一小分隊趕去建國門。那裏解放軍帶隊的也表示，他的部隊不出來，然後就帶隊往回走，走了一會就跑起來，市民就給他們讓開一條路，以為他們後撤。可是他們沒有後撤，跑到東華門裏去了。

問：你說的是部隊跑到那裏了？

答：是。多數跑進去了，少數被關在外面。當時他們還留下一整車的武器。這時我們進行分析，軍人不會輕易丟掉武器，槍是戰士的生命嘛！那裏還有菜刀、角鐵都放在自治會。我們比較敏感，因為成車的武器放在那裏，你們一截，解放軍就跑了，不是好現象。如果我們手裏有了武器，就不是人民內部矛盾了，可以扣更大帽子，他們可以進行鎮壓，政府是挺狠的。

問：你們怎麼辦呢？

答：當日學生向部隊、公安局交待過，說六部口有一車武器，要給他們送回去，派出所說不要不收也不管；天安門城樓下的兵也說不管這件事，我們手裏的槍去交他們都說不要。

6月3日晚上，部隊最早一批兵是從地鐵上來的，他們停在

原地沒動，是在等訊號。1 點多鐘廣場西南邊有一輛坦克開過來，速度很快，當時我們指揮部還有一部份人在，坦克準備從我們這裏奔西北角去。在場的羣衆、市民、學生就要把這輛坦克截住；它（坦克）雖然減了速，還是把截坦克的一個卅多歲的女同志壓了，壓了人坦克也沒停下來，還繼續開。這時人們急了眼，就往坦克上扔自製的燃燒瓶，這輛坦克着火了，就從西北角往西南角方向開，然後往西去了。這時我們聽見槍聲。我們「工人自治會」加入的人已很多了，咱們認爲要和兵進行搏鬥，要有組織。既然當兵的對我們進行慘無人道的屠殺，咱們應該拿起武器。我們的武器不過是桌椅、板櫬、磚頭、瓦礫；跟政府武裝正規軍無法相比，所以傷亡較大，「自治會」傷亡很大。這時從西南角開過來部隊，地鐵附近的兵開始打訊號，往正東、正西、正南、正北，他們打完訊號，木樨地進來的兵就開始開槍，一路開槍一路過來了。這時我聽說情況緊急，我帶着部份人去西南角，迎面碰見當兵的，他們就開槍。我們邊抵抗邊撤，撤到「肯德基家鄉雞」那個飯店右邊，有個出租車站，裏面有位老工人，他講：「你們這樣和他們拚是白流血……」，他剛講到這就被槍擊中胸口，當時就死了。在我身旁還死了一個大學生。

問：你那時已經離開「工自聯」的帳篷？「工自聯」不知道這時發生什麼事了？

答：我們原來已商量好，把誰加入的組織的名單燒掉，還有其它一些東西。

問：燒名單的時候你在嗎？

答：在。

問：打散後怎麼樣？

答：打散後我就回北大了。

問：什麼時候回到北大的？

答：4日下午。當時回去的「自治會」的有好幾個到處。

還有別的隊的人，和一些學生。商量後我們又去了東直門處，但都是兵沒辦法走出去。當時遇見了一輛垃圾車，司機問我們是否學生，我們說是「工人自治會」的；司機講：

「管誰都是中國人，不嫌棄就坐到後面。」當時我們卅二個人，其中八個是「工人自治會」其餘是學生。

問：去哪裏了？

答：最後轉接地到了內蒙。

問：在內蒙你們呆了有多久？

答：差不多一個月吧。

問：住在哪？旅店？

答：有山洞，住在山洞，是沒有人去的地方。

問：吃的東西怎麼辦？住了多久？

答：當地人還會說普通話，但有的人聽的懂。住了二十多天。後來陸續那個地方也來兵。我們就走回來。

問：回北京？

答：沒去北京，去了淮北，然後從淮北到廣州。

問：你來廣州時沒有三十二個人來？什麼時走散的？

答：我去淮北時已剩下十幾個人。我於7月底來過廣州，後又返回內蒙，曾在石家莊停留過。

問：你認爲「工自聯」中最重要的是哪幾個人？

答：最重要的是劉強、韓東方。其他幾個被通緝的被抓了。家被抄了好幾回了。

問：你怎樣總結八九民運的教訓？

答：八九民運失敗，給了我們中國人民一個深刻的教訓，使我們對中國現代的政府，現代的社會，現代的共產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政府的軍隊力量和一些反對民運的力量，大大超過了當時已經組織起來工人、學生和民衆的力量。我們要想取得民

主的勝利，我們必須團結佔全國人口80%以上的農民，包括鄉鎮企業的、集體企業工人，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也包括共產黨高層的騎牆派，以對付現在腐敗的中國政府，而且我們要改變策略，明確自己組織的目標。我認為工會是工人隊伍的組織，所以我們要組織。但是現在中國的工會是官辦的工會，是騎在我們工人頭上的工人貴族。雖然我們「工人自治會」，在現在不能得到法律保障和社會的承認；但是，只要我們工人團結一致，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下進行鬥爭；作一些對我們工人，和全民族有益的事；我想以後要成立我們自己的組織和得到法律、社會的承認和保障是有希望的。對於取得合法的、和社會承認的自己的工會，我們必須公開的做爭取工會保障條例的工作。我們工人階級要進行政治鬥爭，進一步揭露中國政府的反動性，揭露中國政府獨裁、專制、腐敗等現象，從而爭到我們「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這個組織的公開存在。

「只要我們工人團結一致，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下進行鬥爭；作一些對我們工人，和全民族有益的事；我想以後要成立我們自己的組織和得到法律、社會的承認和保障是有希望的。」

工自聯人物剪影訪問(二) ——從服裝店經銷到女廣播員

問：你今年多大？

答：29歲。我已婚，有一個小孩。

問：你原來做什麼工作？

答：我原來是工人。單位生產上不去，廠領導號召工人自謀出路，另找工作，單位支持，我就找了一個私人承包的商店，經營服裝。

問：那你在北京出生長大的嗎？

答：對。從小就在北京。

問：你唸了幾年書？

答：小學六年，中學五年。

問：上完中學就出來工作啦？有沒有待業很久？

答：沒有。我畢業出來考美術學校，（學習了）差不多一年多。然後到一個工藝美術廠工作。

問：你的爸爸是黨員嗎？

答：對，他解放前就參加革命。他已經離休了。

問：你媽媽是不是黨員？

答：我媽媽不是。不過在文化大革命時，她是我們地區的積極份子。

問：我們談一下這次民主運動，你是什麼時候參加這個民主運動的？

答：從剛一開始，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開始遊行、示威、靜坐，5月13日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開始絕食，我記得那時聽他們講一些電台裏沒有聽到的，還有報紙上看不到的東西，那時思想中有深刻的印象，覺得學生這次搞民主運動，是全民性的，對於我來說，他們講出了我的心裏話，我從哪起差不多天天都到天安門廣場。開始時我沒有參加學生們的遊行，到了絕食後我才去。

問：是晚上下了班才去？

答：有時下班去，有時白天去。因上班得經過那裏。

問：你去的時候，在聽是嗎？

答：在聽。不過我跟他們一起喊口號。

問：喊什麼口號？記得嗎？

答：比如：「反腐敗」、「鏟除官倒」一類，那時還沒有反對領導人下台的口號。我認爲民主口號都是應該講的，沒有反動的。

問：你是一個人去，還是跟家人、朋友一起去？

答：基本是我一個人，有時也和我的朋友在一起，到天安門去。

問：那時你們有沒有怕到廣場，政府會抓你？

答：不怕。那時在市中心的居民差不多都來了。郊區單位的，還有街道上的積極分子都參加送水，送食品的工作，是全民運動。那時，就是胡耀邦逝世時，送靈車的人很多。

問：4月時，大學生有遊行，你有沒有支持他們？

答：那時我沒有，是在學生絕食以後我才去的。

問：爲什麼會有這個轉變，爲什麼在開始時你沒有參加？

答：因爲當時追悼胡耀邦時，我們聽不到外面的消息，只有官方的。再者就是我們生活的環境，對於接觸新思想，新潮

流這方面腦子裏很少有這個概念。

問：後來什麼原因促使你會去天安門廣場支持學生？

答：開始時很猶疑，我出於好奇，去天安門廣場聽他們演講，而且和一些學生有接觸。有一個清華大學的學生，他們把當官的內幕講出來，周圍的人聽了都很氣憤，都是我們未曾聽說過的事。

問：比如說呢？

答：比如官倒的、搞特權的、爲兒女出國的、住房問題，北京市民住房都很緊張。我父親是解放前參加革命的，多少有一點照顧。市民通常是三口人擠在一間十平方米小屋裏，有的單位能解決也是很拖延，而大部份是沒有解決。一些人只能到農村租房住，可租房子又很貴，一個月房租一百元，兩個人工資佔去一半，還要撫養小孩是很困難的。我很注意袁木在4月29日（大約）的一次講話。我覺得學生提出的問題，政府都不給予肯定答覆，總是考慮考慮，研究研究。我覺得是變相包庇。

問：學生當時提出爭取民主要求，你們有沒有很強的感覺，同意還是有什麼意見？

答：我個人認爲，民主這個詞深入一點講，我們不太理解；只是理解工人的要求，市民的要求，想要什麼，不想要什麼，就這兩部份。物價上漲，購買國庫券這些問題都關係到我們切身利益有關，我們希望學生搞的這個運動能督促政府建立一些有效的措施制止這些不良因素繼續發展。

問：你剛才講，你們只會在思想上要一些什麼不要一些什麼，那麼你們不想要什麼呢？

答：比如物價問題，物價上漲（幅度）和工資上漲不成比例。現在菜價比四、五年前翻了許多倍，貴得怕人，而工資調整又遲遲不辦。

問：你們想要什麼？要求什麼？

答：範圍很廣，比如幹部年青化，是中央提出的，但是現在當權者多數七十歲以上。

問：還有呢？

答：太多了，一時想不起來。還有交通問題，市民很多人每天上班車擠的不行，可滿街跑的高級小汽車又那麼多，百姓能坐的又有幾多人？

問：在廣場聽到的談話是從廣播中聽的？還是直接聽的？

答：就是直接聽的，不是廣播裏聽到的。是個人的，這和從廣播裏聽來的有區別。

問：演講的人中除了學生有沒有市民？

答：除了學生外也有市民。

問：談話的大多是男的？

答：男的也有，女的也有。

問：女的是學生嗎？

答：好像是市民。

問：她們也是演講？

答：不，就是隨便聊天。演講人也有顧慮，廣場那麼多人，他們也需要注意。

問：當時你除了聽還幹什麼？

答：學生在電視中講要求平等對話，當時絕食已進入第二天了，是14日，中南海西門口圍了很多人。我也過去了，看見一個學生在講：「我們已經絕食卅六小時，政府還這樣對待我們，讓我們太失望了，他們一點誠意都沒有。」我們市民很同情他們，就幫助他們維持秩序，避免混亂現象。

問：你聽這些後，回家跟家人談過嗎？

答：家裏我父親人很固執，他很迷信共產黨，不管共產黨對與不對，他都沒有反對意見，他受共產黨教育太深了。我要是跟他談肯定就會有分歧。我聽他的，認為不客觀，他聽我的說我反動，所以我就沒有談。

問：你對你母親說過嗎？

答：沒有。我這種新思想對他們講，他們是接受不了的。

問：那你第一次參加遊行是什麼時候？

答：那時凡是有市民的遊行隊伍我就參加，我跟他們一起呼口號，為他們傳達一些其他地方聽到口號，工人們很歡迎。

問：那時是幾號？

答：5月17號。戒嚴令執行前。

問：你參加遊行是騎自行車嗎？

答：是，我騎自行車。我把自行車存在西單，然後步行去廣場，然後再繞回來。

問：跟朋友還是一個人？

答：我一個人，我朋友走掉了。

問：你記得那時喊一些什麼口號？

答：比如：「賣掉奔馳」、「小平，小平 八十高齡，治國不靈」。

問：你們當時去過工廠嗎？

答：沒去工廠，只是和他們遊行。

問：工人遊行都是跟工廠出來的嗎？

答：是跟工廠出來的，我參加的是「首鋼」的隊伍，大概有兩百多人。

問：是什麼時間？

答：下午3點多。

問：「首鋼」工人遊行有沒有拉起他們的旗子？

答：有，上面寫着是「首鋼工人老大哥」。

問：你記得還有什麼其他單位？

答：還有印刷廠。

問：你當時為什麼跟着「首鋼」的旗子走呢？

答：唔，因為工人發出工人的心聲。我怕別的單位，比如科學院，不接受我，我也不了解情況。



◆「首鋼」工人是「工自聯」重要的組成部份之一。



問：跟「首鋼」遊行喊了什麼口號？

答：沒有過激的，都是些「聲援學生」、「總理，總理為何不理？」這些口號。

問：那是你生平第一次遊行嗎？

答：不是，第一次是粉碎四人幫時遊行。那時還在上學，比較小，這次是自願的發自內心的。

問：那天遊行遊到幾點？

答：我沒有始終參加一個隊伍遊行，中途又參加了「新華社印刷廠」的遊行。

問：回去後對你單位同事講過嗎？

答：講了，他們聽後都說好。尤其對一些帶諷刺性的口號感興趣。

問：什麼口號？

答：比如「小平小平，解甲歸田」、「李鵬，李鵬平庸無能」。

問：那天回家也沒有對家裏人講嗎？

答：沒有講。

問：第二天，18號你又去了嗎？

答：18、19號都去了，但遊行隊伍不像17號那麼有秩序，交通也堵塞了。19號說戒嚴令馬上要下來。我跟「中建銀行」工廠的隊伍，他們有一個鼓，我會打鼓，就跟他們一起打鼓，帶頭喊口號，走到哪都是一片掌聲，是民心所向。

問：你以前做過在車上打鼓，喊口號嗎？

答：沒有。

問：那次你怕嗎？

答：我不怕，從中南海門口過我都不怕，我就站在車中間位置，我們的車一直開到廣場給學生們送去汽水。

問：當時已開始戒嚴了，你有沒有想到會受軍隊鎮壓？

答：沒有。我想運動剛開始，應不會那麼厲害。19號那晚我和

我朋友一起去了天安門廣場，那晚市民很多，人擠人，我和我的朋友凌晨4點還沒有回家。

問：一晚沒睡覺？爲什麼？

答：是，那晚我們聽到消息，說20日早晨之前要清場，一定要清理天安門廣場，把學生趕走，又聽說有大批監獄已騰空，準備鎮壓學生；如果我走別人也走，那就都不走互相感染，人民的勢力更大，可以鎮守在天安門廣場。我朋友也沒走。

問：你們有沒有叫其他羣衆去支持學生？

答：我們都在一起談話，有些人思想比我更明顯的接近學生。他們當中有老頭、老太太、婦女抱小孩的，還有拄拐杖的也來了。

問：當晚廣場上那麼多人，你認爲他們是好奇才去的嗎？

答：不是，市民都聽說戒嚴令要下來，都是自願來援助學生的。

問：20號呢？

答：那天我跟着「市民聲援團」，騎着單車到北京公安局和北京政府門前喊口號示威。

問：你們喊什麼口號？

答：「首都市民聯合起來保護學生，義不容辭」。當時我們都知道是李鵬和楊尚昆搞鬼。陳希同也露面，大家都恨他，要求他下台。

問：你們隊伍中女同志多不多？

答：不多，二、三百人的隊伍裏，女同志只有兩、三個。

問：這麼少？你們以前認識嗎？

答：以前誰也不認識誰。可我們都很齊心，一手扶自行車把，一手扶旁邊人的肩膀，一齊喊口號。那些日子北京的社會秩序很好，往常一個星期總有商店被偷或有搗亂，可那些日子根本沒有這種現象。

問：那時你有沒有因爲那麼少的女的在你們的遊行隊伍裏而感到特別？

答：我認爲，男的多女的少，我在隊伍中喊口號希望能呼喚一些女同胞，女同志；所以我覺得我這樣做能感染一些人，沒有考慮其他的。

問：後來呢？

答：後來我們約好第二天還去，21號我去時發現他們比我來的還早。22、23號天安門廣場人特別多，我有時去中南海門前，聽他們演講。

問：24、25號？

答：那幾天都不記得怎樣過來的，基本上天天去。

問：你參加民運，什麼時候參加「工人自治聯合會」？

答：5月26日。

問：你是怎樣參加的？

答：那時正好我在新華門口，看見有一個紅色橫額，寫著「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他們在向新華門前絕食示威的學生進行聲援，高唱「國際歌」，喊口號，都是市民喜歡聽的，有些也是借機發泄一下，但沒有過激的。都是要求政府民主等。

問：那時有多少工人在「工自聯」隊伍裏？

答：差不多有一百多人。

問：是26號？大概是什麼時候？

答：26號晚8點，天剛黑。

問：那時有一百多工人，有多少學生在那裏？

答：學生在那個隊伍不多，來的都是工人，學生在新華門前已經很多了。

問：那你還記得在新華門前「工自聯」旗下，有什麼人在那裏領導？

答：有劉強，其他人名字不太清楚。

問：韓東方當時有沒有在？

答：沒有在。

問：什麼東西吸引你參加他們的組織？

答：因為他們打出工人旗號，有可能是站在工人角度上。學生是民主運動的先導，工人是支持這場運動。既然有工人自己的隊伍出現，很可能出現工人所要求的事情，能有這個幫助工人說話的組織是好的。

問：你當時心裏希望或認為這個組織（「工自聯」）能達到什麼目標？你認為他們是支持學生運動，還是發展你們自己的運動？

答：我加入這個組織時認為，學生從總方面講是好的；工人有這種組織一方面聲援學生，另一方面是為工人提出正面要求。這組織可能為工人說話。

問：那時你怎樣參加他們的行列？

答：我一去劉強和我談，他講目前不太景氣，因為政府認為這個組織是非法的。當時我這樣想：工人既然建立這樣的隊伍組織，是不容易的；而且我從他們提出的口號和舉止中看到他們沒有超偏和犯法的行為，他們這個團體還是齊心的。我認為人在社會出現不良現象時應該挺身出來。就是這樣。

問：你怎樣和他們講你希望加入？

答：我沒講，就和他們一起喊口號，然後進到一個大門裏，大概是他們組織所在地，他們看到我，後來就和我談了談，問我是否願意參加他們的組織，我表示願意。

問：是他主動跟你談的？

答：有一個人介紹，問他們是不是可以。

問：你原來就認識他嗎？

答：不，是在喊口號的時候。我告訴他該喊些什麼口號。

問：你還記得當時喊什麼口號嗎？



劉強：

「當軍方直升機在天空盤旋時，我真有點膽顫心驚，但既擔當了指揮，便不能後退。」

答：那些口號基本和天安門喊的差不多。比如戒嚴令發了後。開始19日李鵬對學生講學生不是動亂；但隔不久又說學生運動是動亂，是極少數人挑動的。這講話隔這麼短時間，變化這麼大，顯示出這個國家政府領導這麼大個國家，說話出爾反爾，不慎重。當時喊口號基本上是圍繞這些問題的。

問：那時候要參加「工自聯」的人有多少？

答：據我看有一百多人。

問：男的多還是女的多？

答：男的多。女的搞些細緻工作，比如印刷、刻字、廣播等。糾察隊中女的很少，只有幾個人，也許是今天看見明天沒看見。

問：當時加入「工自聯」要你填什麼表後？

答：沒有。當時沒有填表。從我對他們的觀察看，他們都挺努力的，大家聚在一起談話，基本上是在談當前運動發展，及政府對學生和工人的態度。

問：那時有沒有想過，參加這個組織是危險行動？

答：想過。既然參加了，大不了政府認為這是非法組織，會給扣上閒雜人員、無業遊民的帽子。但我看這個隊伍中的人都挺有思想的，有高度見解，他們都談社會上不良現象應如何制止，如何推進政府進步。我認為假如政府真對我們採取專制政策時，來對待我們這些人，我想並不太可怕。因為廣場那麼多人和隊伍都有上好的表現，而且大勢所趨是社會新開端。

問：那後來怎樣？你回家了？

答：那晚我回家了，以後天天來，先去上班，打一下招呼，然後就去。我看到他們吃的方面比較缺乏，就用自己的錢買了黃瓜，洗淨拿給他們。

問：你在那一星期中花了自己多少錢？

答：我給他們買過一些日用品，有桶、臉盆、香皂、毛巾、洗

衣粉及印刷用的紙，還買了一些吃的東西。花了幾十塊錢。

問：當時還有沒有其他女的參加？

答：有。我知道就有好幾個呢。

問：她們每天都來嗎？

答：不一定，有時今天來，有時隔一天，因為她們都有事，都有自己的工作呀。

問：她們都做什麼工作？

答：有刻字、廣播，還有抄寫文件、印刷。

問：她們年齡多大？

答：和我差不多，30來歲。

問：她們都是做什麼工作的？什麼行業的？

答：有教師，有搞工會的、還有工廠的、其他有大學畢業後參加工作的。

問：那時你們幾個女的都是參加事務性工作，有沒有參加他們開會？

答：沒有。

問：為什麼？

答：為什麼我也不太清楚。可能因為組織剛成立時沒有女的參加，後來參加也是從事一些具體工作，沒有機會。

問：他們沒有邀請你們參加開會？

答：沒有呀，他們開會商討主要事情，我們有自己具體的工作。所以沒有參加會議。

問：你每天大概什麼時候到那兒？

答：我每天白天、晚上都在。接近6月4號那幾天我都在那裏。

問：你為什麼替他們廣播？你以前廣播過嗎？

答：沒有。廣播這方面我沒受過訓練。

問：那是他們安排你去作廣播，還是你自願去做？

答：沒安排。當時廣播員老停，機器要人工操作，廣播員人



▲「北京工自聯」的廣播站。



◀ 小型自發民主牆。

少，平常大家都上班轉換不過來，外面很多人都等候聽廣播，還要求再播，兩廣播員很累了；所以我表示願意試一試，盡量不讀錯別字，當我第一次廣播完，問同事效果如何？她說：「挺好，不錯」。從那以後我就負責廣播稿件。

問：從那一天開始？

答：從5月28日開始。大遊行時我也參加過廣播。

問：那時對你是一個新的經驗？第一次公開做廣播，你覺得很興奮，或是很自然的事？

答：我開始廣播時比較緊張，後來我播完稿子聽到下面有掌聲，鼓勵我再播下一篇稿子，所以只要有稍好的稿子我就及時的把它廣播出去。特別是工人和農民來稿，都挺受歡迎的。

問：你想過要寫自己的稿子嗎？

答：沒有。

問：你對你曾唸過的稿子是否記得？有沒有特別印象深的？

答：有，有一篇印象特別深刻的，而且當時很受歡迎。這篇是市政府三位人士來的稿，稿的大概內容是這樣：「同學們絕食，對民主獻身的精神，很感動我們，但我們也有良心。而在前一段時間，電台和電視台都發表了天安門管理聲明。這個稿子在《北京日報》連篇累贅，當時署名是北京四十四名知識份子，幾名工人還有學生代表；但實情這份聲明都出自他們三人之手」。我唸完「出自他們之手」，底下觀眾都發出嘩的聲音。覺得政府很虛偽。這篇稿拿來後，底下觀眾反應很大，他們還寫道：「我們在政府裏，看到政府這樣，我們也不忍心；但為了揭露他們，我們暫時隱姓埋名，請大家原諒。」他們還講，在李鵬上台後，執行的路線，就是控制趙紫陽的路綫，在稿中他們還講趙紫陽主張新聞、文藝要開放，新聞要真實些；還有取消價格雙軌

制。我們特別喜歡的，就是這三點。但李鵬上台後基本上阻止這些政策致使物價猛漲，各方面不利因素全都上來了。

問：當時來的稿，是不是市民誰都可以寫？

答：是的，誰都可以寫。

問：有沒有和你們觀點不同的來稿，你們不廣播？

答：沒有，來稿差不多和我們觀點都是一致的。不過也有爭議性的稿件，有一次我們一個廣播員把一份未審定過的來稿就播出去了，大致內容是：對這種廣播我們表示贊賞，但在廣播內容上（應該豐富些），例如應有一些小詩，諷刺與幽默，應該有條理。我們播音員讀到一半才發現不對頭就沒繼續往下唸……（笑）。

問：那基本上是來稿的都唸了？

答：對。記得有一個工人在廣場上寫了一篇稿，拿來問我寫得行不行，我看過之後認為挺好的。稿的大概內容是：「我是一名工人，我們單位領導今天也要我們組織遊行，是反動亂遊行，還發我們每人十元獎金，還放一天假。我作為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我在學生絕食期間，用我自己的錢給學生買食品和生活用品。在中央還沒有出現反對意向時，我們領導也主張我們帶頭去遊行。可現在上邊傳達了指示後，我們領導又支持我們進行反遊行，我們領導這樣不堅持原則！但我們堅決擁護打倒李鵬！」這篇稿子就這樣結束了。寫得很簡單。

問：你當時參加廣播每天大概多長時間？

答：我們有幾個專業的播音員，她們在時我就不唸。當然她們播音效果比我好呀。我在旁邊幫助審稿，有價值的稿件要播幾遍，一般口號似的稿件就篩出來，這種稿大家不太喜歡。

問：那你每天大概在那裏呆多長時間？



▲北京市民針對政府在5月底舉行的「反遊行」而發動諷刺李鵬政府的反「反遊行」。



答：我在最後幾天，是中午1點多鐘到夜裏12點或1、2點鐘才回家。其中那段時間都在那裏。

問：很長時間呀？

答：不過也不覺得累，感覺時間過得很快。

問：可以談他們主要的組織者的情況嗎？主要是幾個人組織的？

答：常委有五個人。各有各的分工，開會是幾個人商量，但從工作看他們是有分工的，而且是有條素的、有秩序的。

問：怎樣分工？

答：有負責宣傳的、有負責後勤、有負責聯絡、有負責組織的、有負責糾察隊。

問：他們每天都要開會？

答：基本上每天都要碰一下頭，談一談。因為在廣場開會不方便，人很多，所以見面就談一談。

問：除了常委以外，二綫的有多少人？

答：差不多有一百多人。開始有一百多後來我在填的表格中看到一張能填卅多人的表格有厚厚一疊。尤其是接近大屠殺那段時間，有許多人來報名拿着工作証、身份証，排着隊要求報名參加，大概有二、三百人，人太多了。

問：都是工人？

答：工人也有，知識份子也有，有些是科學院或學校裏面的，可能他自己認為可以作為工人的代表來報名。

問：參加「工自聯」之前你是工會會員嗎？

答：是。

問：那你對「總工會」有什麼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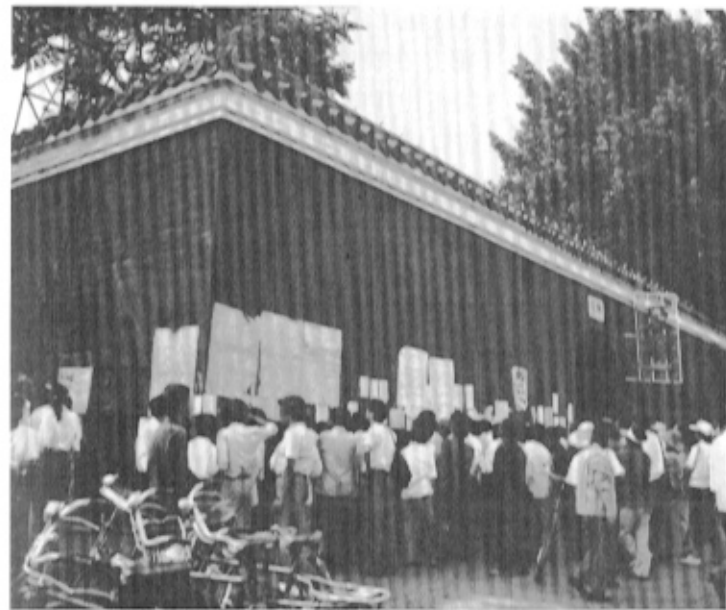
答：什麼印象都沒有，給人印象是一片空白。

問：以前有沒有想過對單位有不滿意事到工會去？

答：沒有。沒有。我們有不公平的話是找領導談，工會沒有權力，說了算的人還是廠長和書記。



◀ 天安門廣場「北京工自聯」總部的橫額。



▶ 「工自聯」張貼傳單的地方之一。

問：你記得你哪一年是工會會員的嗎？

答：從參加工作那年開始，1982年。

問：你到過工會的「職工之家」嗎？

答：沒有。各單位情況不同，我們單位經濟狀況很不好，工會組織活動無非是看看電影而已，就這些，或者發發戲票。

問：這次參加「工自聯」你是否想過，它會取代「總工會」的地位？

答：我有這種想法。

問：你們是否想過「工自聯」要取代「總工會」的地位，還是只是另外一個組織？

答：這兩種可能性都有。

問：那時是否有一天大遊行「總工會」也出來了？

答：對，出來了。「全國總工會」的職工，不是高層領導。

問：他們參加遊行，在社會上有沒有影響？

答：有的。他們這支隊伍出現，等於代表很多工人。而且市民圍觀中，很多都是在職職工。有教員，還有其他行業的人，他們這支隊伍出現時，下面用掌聲和舉手成V字對他們表示歡迎，而且很熱烈。

問：你是否見到他們的隊伍？

答：見到了。

問：大概有多少人？

答：大約有一百人左右，可能不到一百，後面還有一些市民不知是否是他們的人。

問：都是年青人嗎？

答：對。年青人多，老的少。

問：你們當時和學生的關係怎麼樣？和「高自聯」關係？

答：和學生的聯繫不多，可能有個人安排。我曾去過「高自聯」廣播室要稿件，「高自聯」學生很主動的給我拿稿件，沒有排斥的意思，而且還和他們商討如何把廣播辦的

豐富些，吸收更多的聽眾。

問：你們的廣播儀器是自己弄來的，還是學生給你們？

答：這個我不太清楚，因為我去時候那些儀器已經有了，我不太了解器材的情況。我只知道有兩個大喇叭，一個是工人捐獻的；他說我們的廣播效果不錯，不過場中間再搞一個喇叭就更好，這樣東、西、南邊都有喇叭了。當時天氣很熱，尤其下午兩點多鐘，大家都很疲乏，但聽廣播的人還很多。

問：你們在廣場吃的怎麼樣？是由誰供應的？

答：這我不太清楚，買東西歸後勤部負責。

問：你印象中參加「工自聯」工作的有一百多人，他們主要是北京的還是外地的？

答：主要是北京的。但是外地的也不少。

問：外地的大概佔多少成？

答：有湖南、長沙的，青海、黑龍江、哈爾濱、河北承德、保定，還有上海、江西的，安徽，東北的有黑龍江、哈爾濱。西邊的有西安的，遼寧的也有，有南京的，還有湖南或湖北的，口音我分不太清。我不知他們叫什麼，只知有口音。

問：外地的佔很多？

答：是，因為北京的很多人家住不遠，各方面比較方便，所以在後面。

問：堵車？

答：不，在地下（工作）。

問：那時你們有沒有嘗試大罷工？

答：有的。

問：哪一天？

答：6月3日下午，我們已經宣傳罷工宣言，唸了這個稿子。

問：準備哪天罷工？

答：準備4日罷工，不管六四出現沒有，因為當時不知道會發生慘案，就是要罷工。因為下午我們見到很多人都流血了，有一個工人激動的跑來了，他說：「你們還不了解情況，那邊已經打起來了。」我問：「怎麼打起來了？」正好他站在擴音器前，讓他把見到的講給大家聽。他自己就講：「我是一個在新華門口親眼看見當兵的在打我們的市民和學生，頭破血流」，把詳細情況告訴了大家。

下午的時候那邊堆了好多人，有一個男的就開始講，他臉色很緊張。他說：「你們看！我們的眼睛是用瓦斯熏過，嗓子也特別乾，當時眼前出現一道閃光，眼淚不由自主的往下流，人們馬上就跑，有的還未走過來，拿着警棍的照着腦袋打，正好的打在一個女的頭上，那女的『哇』的就嚷起來，抱着腦袋表情痛苦。這時有個小伙子就說：『真行』意思是警察隨便可以打一個沒有反抗能力的女子，話還沒說完，結果遭到六、七個防暴警察的毒打，混身都被打爛了，像死狗似的，躺在地上不醒人事，他們強硬的把他拉進車裏，正好有只鞋掉在路邊，有個市民很機靈，馬上檢起來，這時有個警察（軍人）很敏感地說：『那只鞋呢？那人拿走了！』於是他們馬上就追，市民馬上圍上來堵截他們，不讓他們追過去，因為這只鞋是物証，他們想搶回這只鞋是想殺人滅口！這幫人看市民上來了，就往回跑，開了車就走。那時已經放了瓦斯。後來聽說那個挨打的男的死了，流了很多血，當時大家不是不敢上前，警察像瘋了似的過去一個打一個，因為新華門前很乾淨沒有任何磚頭、瓦塊，學生、市民只是嚷『不許打人，不許打人』。他們根本不許人講話，上去就一棍子，他們拿的棍子很厲害，能致人命。」

問：那是下午幾點？

答：下午3點多鐘，曬的不得了。一會跑來一個學生，一會跑來個軍人，混身是血，那時候真可怕。急救車也是到處響。

問：你覺得那天下午大家在廣場上情緒有些變化嗎？

答：對。

問：可能是激化了？是不是？因為他們聽到很多人流血。

答：對。對。是的，我們都想像不到，假如要用武力鎮壓行動的話，別致人死命，當然不流血是不可能的，哪一方面死，我們都不願意。後來聽說解放軍也有死亡。發生這場流血事件的原因，是什麼造成的？當然我們也不願說解放軍把我們工人或市民、學生殺了，我們就應該抗暴。但對軍人這方面，我認為那方面我都不都願意他們流血，因為我們都是人。只是為專政、獨裁者們權力充當的犧牲品。

問：你們當時有沒有考慮到放棄廣場？

答：當時很難想像到。軍人用武力鎮壓，如果我們要保住天安門廣場，就要有一定的力量，靠市民抵抗，如果有這個可能，我們會盡一切力量。問題是已經出現流血了，我個人不願讓更多的人出現流血，我覺得那時不應該留在廣場，應該避免更多流血。

當天晚上時有一個人騎着車，身上都是血，氣喘喘地告訴我們：「你們不知道，民族宮那邊打死的人一片一片的，你們去看一看吧，那邊打得很激烈，倒下的人一片一片的，死的也有，傷的也有。」

問：那時你們怎麼想？

答：當時覺得太黑暗了，根本想像不到政府會這樣殘忍，聽都沒聽說過。一個政府，一個人民的政府，會用槍、坦克對付手無寸鐵，和平靜坐要求自由的人民。太可怕了！

問：當時你們附近的帳篷和你們的帳篷有多少人？

答：我們帳篷裏除了廣播員以外，其他的糾察隊員都出去了，

都不在廣場周圍了，去其他地方聲援。

問：那時你還留在帳篷裏？

答：我還留在廣播室。

問：當時你怕不怕？

答：那時我都不知什麼叫怕了。覺得死也是挺平常的事。因為死不是我一個人死，是很多人都會死，所以沒有「趕快逃吧，趕快跑吧，千萬別死」的想法，因為當時氣氛很緊張的，如果大家你怕死，我也怕死，那學生們死守廣場陣地，那等於他們要白白的喪失生命。

問：有沒有其他市民來你們那裏？

答：有，太多了，男男女女都有。天安門周圍有些軍人過來告訴我們，坦克車哪個零件打開它就行動不了。軍人有這樣的經驗。

問：軍人嗎？

答：是軍人，他告訴我們考慮怎樣能使坦克車和裝甲車的機器失靈，不能正常運轉。他告訴我們機器怎樣拆開。

問：真的？

答：啊！告訴我們得很清楚，而且還講一些基本知識。

問：是一個軍人？

答：不單是一個軍人在機械方面懂行，旁邊還有說可以弄別的零件的，這樣的人有二、三個。

問：晚上10點以後你一直在帳篷裏？

答：對，我一直在帳篷裏，向外張望看看有沒有坦克、軍車過來，到1點多鐘來了一輛坦克車。

問：你就是那個時候走的？

答：沒有，那個時候我還沒走，我還在廣場。當時我看見那輛坦克車開的速度很快，從我們面前過去；市民當時驚呆了，一看車已經過去了，馬上反應過來後，大家心很齊，把路障開始堵上路，參加圍路障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一排接一排，手裏的東西都當作武器，準備戰鬥。唉！當時那氣氛，那些人如果堅持在廣場跟他們（軍隊）武力對戰，很可能會死。

問：因為他們是準備鬥爭的？

答：是，他們不可能看見拿槍來了就跑，當時的氣氛激發了他們，當然他們的武器和軍人手裏的那些武器有天大區別。軍人他們可以在離你很遠的地方開槍，你都沒有自衛能力的情況下，你就會輕易喪失了自己的性命。人們當時還認為，他們（軍人）只會到你跟前來驅趕你走，我也是這樣想，不可能在幾米或幾十米遠以外就開槍。

問：你們什麼時候撤退的？

答：差不多兩點半，廣場殺得挺厲害，我和另外兩個人從天安門（城樓）掛毛主席像的那個洞走出去了。那時我很累，一天了很辛苦，就坐了一輛三輪板車。來到東華門時看見一羣一羣的解放軍，他們步行沒有槍，有行李、書包，齊步往前走。當地很多市民在跟他們講道理：「你們不了解情況，你們對待學生不應該這樣狠。」他們中有人喊「齊步走！」，他們就向後轉走了。

我們很多市民對他們（解放軍）講，他們愣神，眨着眼，覺得聽的和上級傳達的不一致，好像表示不能理解的。

問：再說回你們決定撤退時，你們是最後幾個人嗎？

答：對，最後幾個。

問：你們怎麼決定走的？

答：我們看到人都走了，我們也把文件都燒了，把機器轉移到紀念碑上面去了。最後廣播的時候我不在了，我到外圍去看有沒有人員傷亡，好報告廣播。後來人都陸續撤了。

問：那晚上你自己看見流血了嗎？

答：看見了，我親眼看見流血，但沒有看見死亡的。

問：在哪看見的流血？

答：在天安門樓洞哪，有一個小伙子後背很多傷。我們沒有聽見他細說受傷過程，只聽到他在罵，「他們××，可真夠狠的，瞧我身上的血」，一邊讓他愛人看，他愛人也接續說：「真夠狠的，真夠狠的。」說着哭起來。後來我坐他的板車走的。看到這些我心裏很難受。

「我們也不願說解放軍把我們工人或市民、學生殺了，我們就應該抗暴。對軍人這方面，我應為哪方面都不願意他們流血，因為我們都是人。只是為專政、獨裁者們權力充當犧牲品。」

工自聯人物剪影訪問(三)

——從地方幹部到籌委委員

問：請你講一講，你唸了多少年書，然後什麼時候開始工作的？

答：我初、高中讀完後就下鄉插隊，勞動幾年後才有機會進了大專院校，畢業後就參加了工作，是1978年參加工作的。因文革期間和後來的大專教育質量是很有限的，在工作中我也感到自己的不足，就再利用業餘時間進修了一門大專課程。

問：什麼大專？

答：原讀的中文，後又進修經濟管理。

問：78年開始工作是什麼單位？

答：福建省宣教系統。

問：那時候你的工作崗位是什麼？

答：是宣傳和教育方面的工作，同黨政部門、羣衆團體都相關聯。

問：你那時候可算是一個幹部了，是嗎？

答：對。

問：那時候你為什麼可以成為幹部，是不是有什麼關係？或者

是不是你父母有什麼關係才可以安排那種看來算是比較好的工作？

答：國內長期以來幹部的來源，一是從基層選拔，二是中專、大學畢業通過人事部門的安排，就成為當然的國家幹部。

問：也就是說，你要是唸了大專，就會安排為國家幹部了。那麼，你父母是做什麼的？

答：父親在一個服務部門工作，原屬於職工，後來可能他工作比較踏實肯幹，成為一個小負責人，轉為國家幹部。

問：那麼母親呢？

答：她文化程度不高，幹過臨時工、合同工到固定工，後來年紀大了就退休當家庭主婦。

問：你78年開始當幹部，當時你的工資怎麼樣？

答：剛工作時每月只有三十多元，那時的工資水平很低，後來國家統一工資普調，工資改革等增加了一些。

問：你從78年開始一直都在宣教系統裏做事嗎？

答：是的。

問：你當了這麼多年的幹部，可以談些對中國工會的看法嗎？你覺得工會的工作對工人有用嗎？有價值嗎？

答：我的工作較有機會接觸工會等羣眾團體的幹部和基層工人，對他們有一定的了解。從我們單位工會組織的情況來講：雖然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專制型的，包括工會在內，實際上是官方的附庸，相當於官方對職工進行思想工作的一個部門。但畢竟這個工作是面向整個社會；在城市，各行業大都屬於職工範圍，包括幹部、大學教授、科學家也都列入「工人階級」的成員，工會以職工為對象的工作是服務性的，是為他人服務、做好事，所以基本上還是為羣眾所接受的。

問：但是我跟很多工人談話時，他們都是罵工會，說工會是沒

有用的，只是發電影票的，或者是工人貴族什麼的。在你十幾年的工作中，你有沒有發現工人對工會的印象不大好？

答：對工會的印象不大好，這恐怕是一個普遍的、總的評價。但在這個總評價的前提上，工會一年當中哪怕只做一件兩件工作，即使是不大深入或做做樣子的，但畢竟還是面對職工、面對廣大工人的，就是電影票，也是給工人的。何況它是作為國內唯一的一個工會組織，從上到下都有它的各類工作部門和相應的工作內容，在其工作中，或多或少，當然還是能為工人做點事。但上面講的「前提」決定了它不可能真正從職工的根本利益上為職工做多少事，只能從文娛活動，工人跟行政方面矛盾的調和，以及少許的生活困難補助、生病、工傷的關照等生活福利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問：你是從什麼時候起開始有這個看法的？即對工會基本架構的看法？

答：我從參加工作以後，由於本身職業的關係，有機會較多地接觸工會幹部和工人，也接觸一些理論性資料，並跟國外進行比較。從工會的地位，即跟黨政的關係看，工會講的話對黨委能起多少作用，對縣長、省長和行政方面能起多大作用，以及在工人中能起多大作用，這都是眾所周知的，是很有限的。中國工會在整個政治結構中不可能具有獨立性，不可能真正站在工人利益方面起維護的作用，這個認識在社會上應該是普遍的、公認的。

問：你剛才講的對工會的看法有沒有跟工會部門裏的人討論過？在89年之前有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答：這個問題從時間看，我覺得89年之前之後這個界限是不必要的，因為從長期以來我所接觸到的不少工會幹部的反

應看來，比如「全總」這個系統有十萬工作人員，我想起碼有70至80%以上的對工會本身的社會地位和功能有自知之明，我想大部份人心裏都清楚的。

問：但我想了解一下，你們之間有沒有公開地討論這些問題？

答：有，在工作中時而涉及到評論工會的功能、作用可以說是家常便飯。

問：好像最近兩年，在工會裏面，也提到要爭取多一點的自主，你們在基層的幹部之中，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怎樣的？你對黨的自主的提法是否有希望？有沒有公開的討論過，認為工會應該從共產黨那裏獨立出來？

答：工會全國性的代表大會，作為中央，特別是中央的首腦，從外表上攬是很重視的。工會的「十大」，趙紫陽、鄧小平都親自到會。鄧小平的講話中，也把工會工作的重要性好像是提到了一定的必須。但不管怎麼看，從中國政治體制的根本來看因為「四項基本原則」都已定了性，工會只像是黨的一個附庸；或者，按他們講話的說法，是一個助手，只要圍繞着黨，聽黨指揮，為黨服務而已。工會應多一點獨立性的提法，對工會工作者來講，當然是贊成的。但是我們心裏也很清楚，在四項基本原則下的政治體制已定了，所謂獨立性最多只能獨立到更好、更有效、更符合黨的要求地為黨工作而已。所以對獨立性的程度，大多數人不敢抱有太大的希望。

問：在這種分析之下，你接觸的有沒有提到工會應獨立出來，像波蘭「團結工會」一樣（他們是自己起家的）。有沒有這樣的討論？

答：在我周圍，有一些年青的工會工作者討論過這些問題。有的即使沒有談論，當他們了解到外邊世界的一些信息，這種想法或多或少會有。但作為基層工會領導在正式提出會議這樣的見解或意見的，仍然很少很少。一般來講，因為

要求獨立工會總的政治體制的性質跟前幾年中共一貫強調反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和「精神污染」是不相容的。那時出現的政治苗頭都跟我們要求的民主是一致的，但都被壓制下去了，所以我們覺得，提倡工會的獨立性雖然是一種良好的願望，但不可以實現。

問：你覺得在工會幹部中間私下還是有工會應該獨立起家的願望和希望，是不是呢？

答：在外邊信息的影響之下，有這種藏在內心深處的願望；特別在年青人中有一些討論和談論。但都認為實現的希望很小很小。

問：想問一問，86年底和87年初，在很多城市有學生運動，那時，你們省有什麼反應沒有？

答：處於沿海的我省，這幾年，被劃為開放省份之一；跟海外的聯繫，特別是商業方面的聯繫，是比較密切的。但是也可能正是因為經濟方面的開放，一些黨政部門特別注重抓經濟，整個社會興起了向錢看的風氣。在政治運動和政治意識方面，按我所感覺的，比起北京和其他省份，顯然薄弱一些。當時其他省，在上海、北京、安徽等地的學生運動，只從報紙上得到一些消息。在我們省的一些大專院校學生中，也搞一些自由組合的興趣小組討論會；有一些小的醞釀，但沒有形成一個引起社會注意的，比較大的政治行動。

問：從今年4月開始，北京有學生運動，你們省有沒有反應？

答：今年這次運動跟以往不同。因為這幾年來全國上下傾向經濟發展，但廣大羣眾對物價的上漲和社會各種腐敗現象，普遍不滿。這次學運一開始，提的是關於胡耀邦的問題。胡耀邦當總書記這幾年，他倡導的和做的一些事情，大部份老百姓還是有印象；學生、幹部當中都有同感。運動進一步發展，提出了懲治官倒、反對腐敗政治的問題，進一

步引起共鳴。直到學生要求對話，採取絕食行動時，知道這件事的人越來越多，關心的越來越多（當時我們省的電視、廣播的新聞節目還是比較開放的，這方面的報道較多）。特別是在絕食之後，影響比較大，從大專院校的學生、青年工人到機關幹部，跟其他省會一樣，在一些政府所在地的大小城市，都有羣衆性的聲援活動。

問：從你剛才講的看，學生和知識份子的反應是很強烈的，那麼一般工人對北京學運的反應怎麼樣？

答：關於一般工人的情況，我想從兩方面來談：一方面是他們這幾年在整個經濟生活中的遭遇。因為政策開放，大部份企業實行了承包制，就是說，把原來的大鍋飯變成了小鍋飯；許多企業情況的好壞，主要看其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看它的原料來源是否有保障等等。各個企業的命運起了變化，其中就有了差距。在這種混亂的政策下，承包實行以後，大部份企業的生產狀況並不理想；除了一些外資、中外合資和一些大的、原屬中央部一級或省重點企業有保障以外，大部份中小企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壓力。這幾年的工資政策、工資調整中，因為工人不可以拿獎金，就使他們在工資、福利方面原本跟幹部差不多的保障受到了損害。就是說，幹部在生活福利、醫療等方面還是有保障的，而工人除了副食品補貼之外，其他的就跟幹部、知識份子有一定差距。他們主要靠生產是否景氣。景氣的話，獎金才有保障；如果生產狀況不太好，獎金就不可能發得多。據我得知，不少中小企業中，工人總的收入往往比不上幹部，除非能利用下班時間，用自己的特長、手藝等渠道增加額外的收入。這就造成了不少工人收入因物價上漲而在生活上入不敷出的現象；加之社會上不正之風盛行，工人的地位在城市中就變為最低層。所以，他們的不滿情緒和怨言，是普遍的。這在民運之前的幾年中，

已經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從他們的政治意識，文化理論等等來看，他們又有一定的局限；大部份人仍然停留在對自己遭遇和個人的不滿，不能從整個社會制度的根源，民主制度的高度去看這個問題。當學生運動起來的時候，學生提的口號，跟他們的一些想法，他們的不滿是一致的。所以，工人一開始就明顯地站在學生這一邊，對學生表示支持和讚賞。但他們自己怎樣行動，怎樣形成自己的組織或自覺地去參予，往往不具備或缺乏不少條件。一方面他們感覺到個人的渺小，另一方面大部份工人好像成為社會低層的成員，往往缺乏與其他社會組織的聯繫，去與他們共同採取行動。這些行動是不是有用，他們大部份也抱着懷疑態度。因為他們不是從民主制度、政治體制和其他一些理論的高度去看待這問題，所以民主意識比較薄弱。工人也缺乏他們所需要的思想上的引導。最主要的，我看還是缺乏一個合適組織，和一個組織的網絡使他們有機會發現自己的力量，使他們能夠直接參與行動。所以他們的行動只能是在學生起來，而且是在全國將到高潮時才形成。據我們那裏的情況，主要是在受了北京的影響，是在北京工人已經起來，學生進入絕食，很需要協助的狀況之下；也是首先由工人當中比較有覺悟、有知識，比較有社會聯繫的幾個人首先倡導，才聯繫了一些人（大部份還是青年工人）。這次參與的程度和規模還是有限的。但畢竟是參與了；畢竟還是四十年來，首次把自己置身於跟政府對立的政治行動當中。

問：我想問一些更具體的情況。你說在北京學生絕食之後，工人才有一些反應和參與。那時是4月底5月初的時候吧？那時工人的參加是上街遊行還是怎樣的？

答：我們那裏是5月中旬（5月13號學生開始絕食）。工人當中的一部份，特別是青年工人，才與跟學生為主體的運動相

會合。我們那個城市，是在大學生的倡導之下，工人才參加的。這些工人，不少也是工人業餘學校、業餘大學的成員，本身也有學生的性質；平常與大學生們有一定的學習和工作上的聯繫，比較容易組織。他們在4月底，當北京有了學生運動，電視上有所轉播報導的時候，已經有同感。根據我所接觸的，不少人已經有討論，幾乎每天都在收看電視節目。晚上7點鐘的新聞聯播，很多人是端着飯碗看的，可以說對政治的關心程度是破天荒的。到後來，北京開始戒嚴前後，接收「美國之音」普遍程度也是破天荒的。我想在青年和成年工人中，可達80至90%。4月底是關心；到5月中旬才開始初步的聯繫，初步組合起來。主要的行為還是出乎對學生的同情，覺得應該從道義上給學生支持和幫助；那怕是上街走一走，喊喊口號，心裏也覺得好受一些，好像自己的力量，力氣也藉以發泄一下。我們覺得很不足的是：這幾年社會政治的一元化，使這麼多有政治意識和政治責任感的青年工人，找不到適合組織形式；使他們覺得有力無處用，心有餘而力不足。運動起來之後，他們從參與到6月4日鎮壓（我們那裏對民運骨幹的追捕鎮壓比北京又遲了一些時間，差不多6月中旬之後），他們前後真正有可能參與的時間是有限的。

問：你自己是什麼時候開始參加民運的？是以什麼形式？以什麼行動去支持學運的？

答：我個人雖然一直對國家的命運，國家的政治是屬於比較關心的，但我不認為我們的參與是完全的、很主動、很自覺的。只是在我原有的政治覺悟基礎之上，由於一個偶然的原因，使我比較早一些，比較深一些地捲入。4月中，由於工作業務關係，我出差到北京，過了一個星期。那時正是悼念胡耀邦活動的開始，我的住處剛好在天安門附近，每天晚飯後都可以到天安門廣場。那幾天，在天安門廣場



◀▼遷入天安門廣場後的「工自聯」指揮部。

紀念碑附近，看到學生民主運動的行為和標語傳單，聽到他們的演講，受到吸引，而且產生越來越大的同感。以至到後來自己覺得不能跟這個政治行動相分離，覺得做為普通的中國人，有義務從道義上關心這種事情，應該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盡自己的力量。特別是他們揭露了一些中央一級的裙帶關係，他們子女的經濟政治地位及工作所為。再聯繫到自己這些年來看到的腐敗現象，覺得自己老是這麼忙忙碌碌，任勞任怨地幹下去，實在是沒意義，沒價值。應該從根本上為能夠實行民主體制出一點力。所以在學生所提供的政治觀點，資料的基礎上，我就比較主動地帶着他們的觀點，他們的傳單資料等回到我省市。

回去後，由於那時候大家，特別是學生，青年工人、青年知識份子，已經對北京的學生運動人人關心。所以對我親自看到的情況就特別感興趣。看到我，所談論的話題都是圍繞着北京的事態發展。這件事看起來好像跟大家沒有關係，但大家心裏面都有切身的感覺。在關注的同時，一直到北京學生開始絕食，而政府仍採取一種不理睬，冷漠的態度，大家心裏很惱怒。我所兼課的一所業餘學校，學員當中（這些學員大部份是青年工人），都普遍的有不滿和氣憤的情緒。也有如何給北京學生一些幫助的想法，至少是心裏有這麼一種願望，只是找不到合適的形式。

後來獲悉北京出現工人組織（「工人自治聯合會」）的消息，我們這些青年工人，也有這種傾向，但不是那麼明顯。最具體的參予活動，倒是我們那個城市幾所大學的學生，他們決定行動比我們快得多。他們當中也有我的朋友，他們在準備採取行動、聲援的時候也給我們打過招呼，希望我們能一起協調。當時，我們內心有願望，但行動上被動。大學生們主動，他們與我們聯繫之後，等於給了我們導火綫。我們想有所行動表示；怎麼表示，自己還不知道怎麼

辦。

學生準備採取示威大遊行，要我們工人方面能夠發動一些，喊喊口號，至少發泄發泄我們內心支持的願望也好。我們就分頭在自己所在的工廠，跟平時談得來的青年工人進行串聯活動。在學生上街的那一天，也就出現了工人的隊伍。這是我們首次聲援北京大遊行。在我們省城當中，雖然不提打倒政府，但還是針對政府的；這在我們那個市是四十年來第一次。

在我們參予這一行動後，北京事態還在繼續發展，一直到戒嚴；大家的情緒有一個新的刺激，隱約感到北京的政治形勢好像給大家心裏蒙上了陰影。但大家沒想到政府會這樣明目張膽地開槍，只是感到學生目前是不妙。沒想到會出現大屠殺的局面。出現這種狀況後，雖然大家心裏多了一層擔憂，但並不是想退卻。因為當時全國新聞開放了三天，特別是戒嚴之後出現的北京市民阻擋軍車進城，羣衆攔截的局面給大家很大的鼓舞，我們也很感動。剛戒嚴時大家齊擔憂，但竟然軍車被擋住進不了城。大家情緒上有一個變化，覺得全國羣衆都已站在學生這一邊了，如果我們也能加上一把勁，局面或許還能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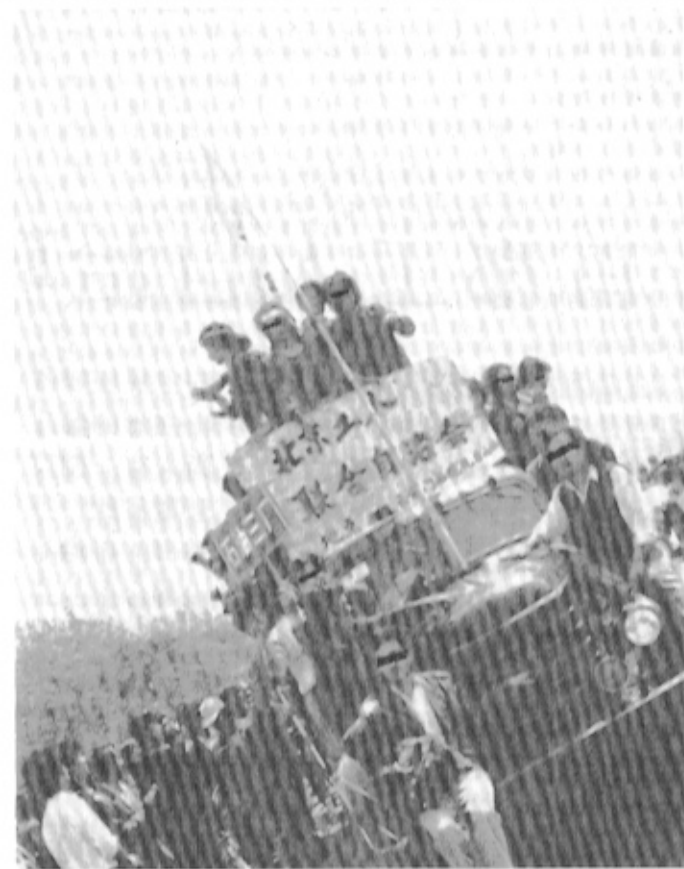
這時我們覺得應該進一步組織起來。上一次還只是參予了一些遊行示威靜坐等活動，但畢竟還是浮在表面，組織形式也是渙散的，一時衝動而已，應該要有一個緊密的組織形式，在需要的時候，更大程度地投入力量。我們就根據北京已經有的獨立性的「工人自治聯合會」的形式，我們幾個青年工人骨幹進行了醞釀，大家共同有這麼一個想法。

問：你們那時候搞了你們地區的「工人自治聯合會」，在此之前你或其他人有沒有自覺地跟北京的「工自聯」的人有聯繫或通訊？

答：據我所知，沒有很密切的聯繫。我記得我在北京時，21號晚上我拿到的傳單中，好像有「北京工自聯」宣言，和向政府提出十個問題的傳單。後來不斷從電視新聞中，看到遊行隊伍中有「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的旗號。我們印象之中，這麼一個組織是存在的；而且不斷在發展，在擋軍車過程中是主力。「飛虎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一帶的活動，這些我們是很留意的，好像心是和他們聯在一起的。當時我們沒有考慮具體怎麼聯繫，主要想我們能不能搞起來，搞到什麼程度，主要還是取決於我們自身。只要大方向一致，以他們（北京）為先導。我們也有考慮下一步的聯繫，但當時忙於應付自己區域內的活動，主要注意力放在我們自己應該怎麼搞。

問：那時候你們組織了自己的「工自聯」，有沒有你們的綱領跟目標？是不是組織一個獨立的工會，還是主要是屬於一個支持學生的組織？

答：我們當時整個參與行動的思想過程和行動過程都是比較短促的，組織形式還沒有達到完善；當時只是處於一個籌委會的形式上，在籌委會的人選確定之後，進行了分工，還包括擬定我們的章程、宗旨等等。就是說在綱領方面還不是很明確。總的說，是在形勢的迫使下，覺得應該投入，出一把力。這是總的出發點，致於達到什麼目標，當時更具體的是想能夠共同促成我們那一區域的政治形勢，成為全國政治形式的一部份；以能夠挽救北京學生最後遭受鎮壓的局面。跟阻擋軍車的行為是相聯繫的。即在我們所處的地區能夠發出聲音，造成我們的聲勢。至於具體的發展目標，只是有一些模糊的想法。北京遊行隊伍中有國務院各部委中央黨校、人民日報等新聞單位的旗號都打出來了，說明整個社會有一個全民性的，敢站到四十年一直屬於正統的官方的對立面的氣候。連國務院的機關人員都走



「工自聯」帶領羣衆上街遊行。

上街頭，打出了他們當時能夠打出的旗號。我們當時在行為和思想上也至少達到了這一點。也就是說，我們的身份和我們的嚮往的方向，造成的形象已經是在政府體制之外的。

問：那時你們有沒有想到你們搞「工自聯」是跟「全國總工會」是對抗的？或者是會被他們取消的？

答：當時好像不願意或者沒有時間去考慮這一點。當時只是考慮到全民有這麼一個機會能夠站出來說自己的話，甚至站在政府的對立面，給政府施加壓力。當時只是對我們願望的政治局面抱有希望，抱有信心。所以在此後有什麼後果，當時不願意去思考它，只是願意全力以赴地參予，使這個局面能夠真正變成北京學運開始的民運人士提出的民主政治體制之實現。如果有這種實現（我們想），我們就是合法的。所以，雖然我們這個組織已經屬於跟「全國總工會」互不相干的另一個獨立性的組織，但我們並不顧慮，而是想真正實現我們的合法性，認為我們的合法化是對社會進步的一個貢獻。

問：那時你們的成員主要是工人、幹部，還是有其他階層的，有沒有知識份子？

答：我們的籌委會當中，以青年、中年技術工人為主，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大部份都有了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其他外圍的比較直接一起參與的青年工人，文化程度參差不齊。我們選核心人員，並不是從文憑考慮，而是從接觸後的思想、看法、認識、對政治的敏感和社會活動能力方面選擇，形成我們的骨幹。這些骨幹大部份是高中畢業以上，有的是技工學校的，中專的，有的是大專的。

問：你們在這之前是認識的嗎？

答：有將近一半是認識的，因為他們都是參加業餘文化進修的。在這些基礎上再從他們的要好的朋友、同事當中逐步

擴展之後組成的骨幹。

問：你們的骨幹是商議選出來的還是投票選的？

答：我們的骨幹是在參與幾次公開活動之後形成的積極份子範圍內，我們召開了一個會議，提出建議提案產生籌委會。因為籌委會不是最後的實性，所以對人員要求並不很嚴格的，也沒有非常正規的民主程序。但也有個大體的原則，就是根據產業系統，比如交通系統、機械系統、電力、商業（已經形成的人員中，並不是每個系統都很齊全。根據某行業已參與的人數給一定的名額，比如交通系統這個行業參與的積極份子多些，就給多些名額，再由他們自己商議選出代表。）一般來講既然已經有共同的思想，又共同參與了活動這些人，彼此較了解產生出來的籌委會是能起骨幹作用的。

問：六四鎮壓以後你們的心情怎麼樣？有沒有計劃或討論以後的工作？

答：六四事件大家並不感到意外，因為前幾天已經取締了「飛虎隊」，大家已有不良預兆。但死了那麼多人，大家確實感到意外和氣憤。一方面為民運人仕感耽心；一方面也在考慮我們該怎麼辦。處於那種複雜的情緒當中，我們在當天晚上開了一個碰頭會，大家覺得這麼大規模的鎮壓，看起來全國性的高潮最後要消失，這是迫在眼前的事實。當時感到我們的運動將不可能有大的發展。但畢竟心中的憤慨情緒需要有一個抗議性的發泄，於是就和學生方面取得聯繫，認為有必要舉行對北京死難同胞的悼念。在當時的氣氛之下，規模不可能有以前那麼大，我們考慮以戴黑紗的形式進行短綫、短時間的悼念集會。

問：再講回頭，你們在整個組織運動過程中，有沒有討論理論問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以及民主運動應朝什麼方面走？

答：從這幾年來看，對企業承包責任制有兩個方面的反應。一是承包以後，有的廠承包到車間，車間又承包到班組，這種形式如果得當的話，或多或少大家覺得多幹會多得一些。但很多政治體制的問題，很多環節的競爭，流通領域等等，處於不合理的混亂狀態。大家希望充分發揮我們的力量，多創造財富來提高生活，這是共同的願望。承包制是一個嘗試，所以大家對承包制大體上還是贊同的。至於是否資本主義的作法，在理論上大家比較模糊，沒有深入探試，只是我省這幾年比較開放，從港澳、海外華僑投資辦企業中看到，資本主義的管理形式比我們先進，他們的生產力比我們高，所以生活水平高。那麼弊病呢？在這幾年接觸的現實當中，好像還沒有挑剔出來。比如，日本的一些企業，他們老板、資本家對工人的生活福利甚至工人的生日都擺放在議事日程中，並有一定專門制度的規定。我們社會主義的工廠做不到這些。所以大家傾向於外邊的生產方式。我們這幾年也接收到其他的信息。就是說，究竟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屬於真正的社會主義？也就是馬克思所講的社會主義究竟是否像瑞士、瑞典式的社會主義，還是中國和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我們還沒有明確的概念。

問：可以講你現在的心情、思想和對將來的想法嗎？

答：我們做為普通公民從良心道義的角度出發，是有義務有責任去保護學生，進行募捐，參加示威遊行。我們是合法的，是合情合理。政府方面背信棄義，進行鎮壓，使我們的情緒起伏不定。我希望我們的國家能夠好。現在我們要適應新的生活，學習外國先進的管理制度，也願意向外面的工會取得聯繫，成立我們自己的組織，那怕是一個架子，我覺得是有價值的，是有必要的。我們應該做力所能及的；根據我們的工作環境、條件，將此次的運動，進行總結；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做一些具體資料、信息的整

理，募寫工作。希望在自己的組織、旗幟下，取海外勞工界同道的支持。

「當時大家都清楚政府管轄下的工會是聽共產黨的，都不是代表一些工人的利益。他們不會替工人講話；……所以想成立一個獨立的工人自治會的組織。」

工自聯人物剪影訪問(四)

——從製餅工人到宣傳部長

問：你是做什麼工作的？

答：我是在一家酒店裏面做西餅的。

問：做了幾多年？

答：三年多點。

問：89年北京開展學運，你在廣州是什麼時候開始參加支援的活動？

答：是由5月18日開始，從組織人們集會、遊行時開始參加。自從胡耀邦逝世之後，全國都十分關心事態發展，談論政府的腐敗和一些官倒之類的事情，人民對這方面都關心，想看看政府怎樣做。由4月20號開始，北京的學生開始組織悼念胡耀邦的活動，當時本地新聞和香港的電台、美國之音都有報導，我當時是在家裏聽到這些消息。

問：你在工作的時候有沒有和同事一起談論這些事情？

答：在工作的時候就沒有談論，但在比較熟同學、朋友之間就有談論到。

問：那你們當時的感覺是怎麼樣？是否覺得這次運動主要是一次學生的運動呢？你們作為一個市民或一個工人，是怎樣看這次運動的呢？

答：開始我也認為主要是學生運動，但後來發展到不只是學生參與，還有工人、市民和社會各界人仕參與，就不完全是一個學生運動。

問：你們當初在廣州的遊行多數是學生還是其他的市民呢？

答：開始是由工人以「工人聲援團」的名義來聲援北京的學生運動和反對戒嚴。因為聽了李鵬在5月20日下的戒嚴令，當時的人們都十分氣憤。因為當初在接見學生的時候，李鵬說過：「學生運動是愛國」。而後來就說要戒嚴，又說是動亂。所以人們都很氣憤，很多人都自發地上街遊行。

問：當時大約有多少人上街遊行？

答：當時在5月21日，大約是有四、五千人左右，這是除了學生之外的工人、市民。

問：好像比北京以及其它城市遊行的人數少，也沒香港多。你們是日間或晚上上街遊行？

答：晚上，大概在9點至10點開始。

問：當時上街遊行的人數不多，你怎樣看這情況呢？

答：對於開始時的遊行，人們不是很踴躍，因為廣州是一個比較開放的城市，大部份人都着重於經濟方面，暫時對自己的利益看得不很厲害，比不上北京或其它的城市。

問：你們上街遊行時，有沒有人反對你們？

答：市民就沒有。

問：當時在街上有沒有人說你們在攪事，反對你們上街。

答：沒有，旁邊有許多人支持，在拍掌，如果我們帶頭喊口號，他們就隨聲喊口號，都很支持。

問：剛才你說你們組織了一個「工人聲援團」，是怎麼樣的一個組織？

答：當時「工人聲援團」有許多熱心參與學運的人自己組織、自己宣傳，聲援北京學生愛國運動，又找一些學生，派發支持北京學生的傳單，號召人們上街遊行。



▲ 5月23日，「省港澳大遊行」中的工人隊伍。

▼ 5月21日，走在廣州街頭的知識份子。



問：當時廣州學生大約組織了多少人參加遊行？

答：學生每次大約都有一萬到兩萬左右。剛開始時市民、工人佔了四、五千。

問：你們參加這次「工人聲援團」，以前認識嗎？

答：18號之前不認識。

問：你們是怎樣形成的？

答：當時有些學生在廣東省人民政府門前絕食、演講，有許多熱心這方面的工人到廣東省人民政府門前集會、討論，都很關心國家的政治。在談話中有了這個想法，於是就組織起來。

問：你們從第一日見面到組織起來是一、兩天的時間嗎？

答：不止一、兩天，從18號中央頒佈戒嚴令開始。

問：你們組織了「工人聲援團」，目標、組織是怎樣的？

答：目標是聲援北京學生運動，對政府施加壓力。

問：剛才談到「工人聲援團」，當時你們的組織方法怎樣？

答：組織方法是每人分別負責一些工作，我就負責一些宣傳和糾察隊，負責聯絡，還有印刷。

問：在什麼地方，怎樣印刷？

答：就是到「中山大學」去印刷，因為那裏有這些設備。

問：那麼你們當時的活躍份子大約有多少人呢？

答：我認識的有十個以下。

問：他們是不是都是比較年輕一些的？

答：都是二十幾歲的。

問：是不是都是全職工人？

答：有個別是個體戶。

問：多數是男的？有沒有女的？

答：有些是女的。

問：當時你們起名的時候，你們有沒有坐下來討論一下是否想有一工人自己的組織呢？

答：開始的時候，我們還沒有考慮得很清楚，只不過想着帶頭聲援北京的學生運動。到了後來，我們就有坐下來開了兩、三天會來研究過以什麼名稱成立一個類似工會的組織。

問：你們怎麼會想到要成立一個類似工會的組織呢？

答：因為當時大家都清楚政府管轄下的工會都是聽共產黨的，都不是代表一些工人的利益。他們不會替工人講話；工人有意見向他們提，但總沒什麼作用。所以想成立一個獨立的「工人自治會」的組織。

問：那你自己以前是不是工會的會員呢？

答：我在單位裏，是工會的會員。單位裏是像包辦似的進工會的。

問：那麼你以前都有接觸過「全國總工會」的工作嗎？

答：工會沒有什麼活動的，除了一些單位的工會主席參加，一般的工會會員都不會在決策時起到作用。只是有什麼宣佈的時候公開出來，比如有什麼活動之類。

問：你們這次想到搞一個你們自己的組織，甚至是工會；那麼你們當時想過工會的目標是怎樣？做些什麼工作？起到什麼作用呢？

答：當時成立「工人自治會」這個組織是希望有別於政府的工會，目標就是為了工人的利益和國家，提倡民主和進行宣傳之類。還因為當時社會上沒有一些政治團體能與共產黨對話或提上意見，所以就想成立這個組織，一來反對獨裁，及在各方面能發表一下社會上的不同意見。

問：你們起「工人自治會」這個名稱是有什麼原因呢？

答：因為這個「工人自治會」是區別於政府的工會，還有北京是第一個成立了「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當時我就想如果各地都成立這類的組織，到時，只要把各地的組織聯合一起，就可以成爲一股很大的政治力量，就可以打破獨

裁、專政這樣的制度。

問：當時你們第一次聽到「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是什麼時候？

答：大約是在5月十幾號，從「香港電台」和「美國之音」聽到的。

問：那麼你們聽到之後，有沒有直接地去跟他們聯絡，或是完全從傳播媒介知道的呢？

答：當時都是主要從傳播媒介知道的。因為當時還沒有和北京聯繫。

問：那麼你們是比較自發性地去做？

答：是的。我們當時都是比較自發性地去做。

問：你們有沒有制定綱領、原則之類的？

答：有的。當時我們是有一個成立的宣言，還有一些章程之類。章程就是約束一些相當於會員的行爲。章程是我起草的，當時都印了很多。

問：剛才說5月21日的遊行主要是你們組織的，你們是怎樣組織去遊行的？

答：我們用喇叭宣傳，發放傳單，號召人們上街遊行。

問：你們一共派了多少傳單？印刷了多少傳單？

答：當時不只我一個人去派傳單，還有許多人去派，故很難統計。

問：你們在街上派傳單嗎？

答：一邊遊行一邊派，大部份是在廣東省人民政府門前集會處派。

問：派傳單時，公安局有干預你們嗎？

答：干預就沒有，有很多人拍照片，他們可能是記者，或者可能是便衣公安人員。

問：你們的喇叭是學生借給你們的嗎？

答：開始有些是學生借給我們的，後來有些是募捐，和自己買的。

問：募捐的是在街上遊行時人們給你們的嗎？

答：是，我們要求人們支援我們，需要錢來做橫額；號召更多人募捐，使我們可以印更多的傳單，增加影響力。

問：我剛才聽你說全國各地成立一些「自治聯合會」，就可以成爲一個政治勢力。那麼你們心目中是想成立一個工會組織，還是想成立一個近乎政黨似的組織呢？

答：當時我們是以工人的名義，開始組織的。將來可能會成立一個政黨組織。這些我們都有考慮到，但當時的時機還沒有成熟，我們就暫時以「工人自治會」的名義組織工會。

問：在當時或以前，你們有沒有受到其它地方的工人運動或工會運動的啓發？

答：是有的，除了北京的工人運動，也有波蘭「團結工會」，他們對我們的影響是很大的。雖然波蘭的也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他們從八十年代開始成立「團結工會」，他們經過多年的奮鬥或鬥爭，能夠取得合法的地位。當時我們想是否可以借鑒波蘭「團結工會」的經驗，在中國成立一種共產黨以外的獨立政治力量。

問：你講到「團結工會」對中國來說有某種意義。那麼是今年5、6月才有呢？還是以前你就覺得有這種意義？

答：在這以前我一直很留意波蘭「團結工會」的動向，從新聞和報紙看到波蘭「團結工會」的活動。從小到長大，一直看到共產黨的獨裁，人民沒有思想和言論的自由，都非常不滿。由於當時（今年5月）的環境或者可以說是一種「氣候」吧，引發我去參加民主運動。

問：你們成立了一個「工人自治聯合會」當時你們有沒有宣告成立之類的活動？

答：有的，是在6月3日在「中山大學」開會，並印刷了一些「工自聯」成立宣言和章程，準備在6月4日正式對外界宣佈。

問：當時你們聯絡到會員有多少人，或者希望能招收多少會



▲ 5月23日省港澳大遊行中的廣州市民。



員？

答：當時我們除了幾個主要領導之外，還有其他的骨幹會員，因為我不是負責聯絡會員工作，我只知道幾十個。

問：那麼你們有沒有討論到怎樣組織，是以上街為主，還是去到工廠企業做組織工作？

答：我們在六四之後，想找一些人和學生一起到工廠宣傳去發展會員。也想到找一個固定的地點爭取「工自聯」合法化。

問：這是在六四之後才考慮到？還是之前？

答：是在六四之後才考慮到，因為六四之前的情況很複雜，沒有考慮找到一個固定地點，和深入到工廠去發展。

問：那麼六四鎮壓後，你們有沒有覺得更加困難搞下去？

答：當時廣州的形勢還是很鬆的，政府還沒有開始干預，所以形勢還是對學生、工人比較有利。人們知道政府那麼殘忍，都很憤怒，所以都有想到自己組織一些行動。

問：我想問一下你自己的發展，你現在還很年輕，才廿來歲。不是廣州市大部份年輕人對政治都不很關心嗎？

答：是的，可以這樣說。廣州人在十年改革開放以來，比較著重於經濟方面，對政治方面比較寬鬆一點，不會像北方一樣壓抑得那麼利害。不過，有一部份人能看到中央和全國的共產黨幹部都是比較腐敗的，都會覺到應該起來，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

問：你爸爸，媽媽是不是黨員呢？

答：我爸爸不是，但我有一位叔伯是個黨員。

問：那麼在平時，例如你從小到大來講，有些什麼經歷令你覺得這個黨或政府是有些令到你不滿的地方呢？

答：有一個親戚是一個黨員，他時常帶我們去認識一些其他人，例如一些公司的領導、經理之類。他過年過節的時

候，就有很多關係戶來送禮到他們家裏，而他們當時就故意做出只要給些少利是錢的樣子，錢可以很少，但要的東西則很多，哪些送禮的人為拉關係只好這樣。我看了以後，覺得共產黨很腐敗。我參加工作，看見單位裏整人很利害，只要對領導有意見，就會受到報復；有的領導根本不懂企業管理，也能當經理，弄得企業經常沒有利潤甚至虧損。有人對他們提意見，就會受到如扣獎金和不平等待遇的報復。

問：你有沒有身受其害，有沒有對領導提出批評之類？

答：公開批評就沒有。但看見單位的領導，和有幾個有多年黨齡的黨員參與賭博和貪污。就我幹這個行業來說吧，很多時購進廚具只值幾千元，但單位領導就報上萬元，剩下的錢全部進了他們的腰包。

問：這些都是你看見的吧？

答：是的，這些都是我的親身經歷和親眼所見。

問：你出生的最初的十年是文革，後來的十年是實行改革開放，對鄧小平的改革政策和毛澤東時代有什麼看法？

答：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剛開始時我很贊成，它令到南方特別是廣東的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對比之下毛澤東時代的那種副食品貧乏和經濟貧困之情況對比很大。不過覺得改革開放只是經濟上的，政治多元化和政治改革還未實現。

問：你以前有否聽說過廣州幾個著名的民運人士，直到現在還在監禁的，如王希哲、何求等？

答：我當時很小，不很清楚。

問：你是十七歲開始工作，你最初在一些國營企業工作，後來轉到一間大型的外資酒店工作，在工資方面有什麼比較？

答：我在外資企業比國營企業的工資高了很多，我在一家港資企業裏的收入是四百五十多元。

問：和以前的工資相差多少？

答：以前的工資是二百多元。

問：你能夠到港資企業工作，是否需要「走後門」拉關係才行？

答：我能到港資企業工作全靠自己，但到國營企業就要走後門。

問：你在這間港資企業的工作條件如何？

答：每天工作八小時，一個星期做六天，一天休息。

問：我聽大陸的一些朋友說，每天工作差不多十幾小時，又沒有休息日？

答：我不知道他幹哪一行的，可能有這樣的情況，大概是一些私營企業，一般就沒有十幾小時的。

問：這樣說，你對你的工作環境、條件、待遇都很滿意吧？

答：可以講比較滿意。

問：你的生活挺好，參加八九民運以後，出來加入「工自聯」，當時有沒有想到生活有很大的改變，或會受到很大的威脅？

答：當時有想到過。在中國，反對共產黨受很大的威脅。不過作為一個年輕人，有責任發表自己對國家的意見。況且，國家目前這麼腐敗，應盡力把它改變。

問：那麼當時你父母是否知道你參加？

答：當時家裏和我父母都不知道。

問：那你參加時候多數是工餘時間吧？

答：不，我不單只是工餘的，有時還會請假的。

問：你在你的工作單位，有沒有和你的同事談起這些事？

答：沒有，就像6月5日開了一天工，其它都是請假，因為不可能再返工。回到去的時候，也沒有正面跟他們講。也有一部份人，大概一些是比較大的女的，還是比較信共產黨的。他們認為北京的屠殺，會不會是那些學生先打解放軍的。但大部份人看了香港的電視，或聽了外邊電台，都會

相信政府是屠殺了學生。

問：在整個運動過程中，「廣州總工會」有發表意見嗎？或部份職工有表過態之類嗎？

答：據我所知，「廣州總工會」沒有表態，它本身也沒有參加。我是指「總工會」的領導沒有參加，不是指它的會員。

問：到現在，經過了一段時間，回頭想，你覺得大陸的「工自聯」還會搞下去嗎？

答：我相信很多人都會繼續，堅持下去。我想他們不會為政府要抓人就不堅持下去，大部份人都會堅持下去。

問：比較起來廣州的運動的規模小得多，若果這運動再發生，你覺得重點是在北方的城市嗎？

答：不一定，因為中國的民主運動剛剛開始，很多人對共產黨的腐敗、獨裁的認識不夠，可能要經一段時間的宣傳，來回發展。不一定是北方的，因為廣州人的思想比較開放，不再允許政府專制、獨裁。

問：你有沒有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比較？你覺得應走哪一條路？

答：我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看法是社會主義不是完全很壞，要看在什麼形勢下。中國經濟那麼落後，由一個國家壟斷，要人們做什麼就做什麼，根本沒有競爭。由國家控制生產，而不是以市場需要去生產，所以中國經濟發展是很慢的。如果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就可以很大幅度地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所以我認為在這個階段，就應該用資本主義的經濟方法和建設。這樣比較適合中國。

問：那你是認為中國應該走資本主義這條路去發展？

答：我是認為中國應該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樣會對中國比較好些。

問：你有沒有聽說過：在資本主義，工人很多都受剝削，受壓迫這類的話呢？

答：這些話由我一讀書開始，共產黨就不斷貫輸了。但經過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了，可以觀察外界吧！或者有些親友從海外回來，都給我介紹了各方面的情況。雖然說資本家肯定會剝削工人生產的剩餘價值；但是剝削的程度，我相信會比共產黨的輕，共產黨剝削工人的程度更加嚴重的。

問：你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答：因為，例如一個工人生產的產品的價值是一百元吧！但政府給回你的只是很少的一部份，基本上是只可以使你吃飽的；而其它的錢，就用於那些當官的買靚車，起靚樓和出國玩、旅遊，都是用於做官的花費，工人得到的是很少。但在資本主義下，老板都會照顧到工人的福利，應該會比社會主義好很多。

問：但是我們香港知道一些資料，就是說很多從香港回去投資的老板，對國內的工人剝削得厲害，比如要他們的工作時間很長。就像一些工廠中的女工是從農村調來做幾年，又趕她們回農村。又有超時工作，居住條件很差。你在廣州知不知道這些呢？

答：我都知道。因為我的單位也有些從郊區或其它縣招來的職工，他們的待遇應該是比當地的工人低的。城市戶口的工人的待遇是比較高的。他們剛開始不可能是正式工人，只可能當臨時工，那麼福利和醫療費用都是比較低的。但在合資企業的待遇是，如果大家都是本地人，那麼合資企業的待遇是比國營企業好很多的。

問：你所講的待遇是指工資？

答：是工資。還有比如過節、年終有雙糧。過節時也會請工人去旅行。

問：你是不是正式工？或長期工？

答：我在國營企業時就是正式工。

問：那你在這間合資企業呢？

答：我是個合同工。

問：那你會不會怕滿了合同或年紀大了，他們不再請你呢？有想過嗎？

答：有想過。我們做的是有技術性的工作，就算年紀大些都不會有問題。

問：請病假，有病假津貼嗎？

答：病假一般給半天的工資（三、四天之內）。長期扣工資；工傷會有賠償，工資和獎金全數都有。醫療費用企業負擔。

問：我聽說近年中央很想推行「職工代表大會」，你有聽說過嗎？

答：「職工代表大會」是有的，每個單位都有工會，工會擔任的。沒有可能由一般工人做工會代表。

問：你工作的酒店有「職工代表大會」嗎？

答：有。

問：它的形式怎樣？

答：它的形式不很複雜。比如有一個單位，你加入了工會，一般情況下由你單位的領導做工會主席，其他人無可能做，可以說由他做主。

問：之前有想過需要一個較強些的工會的力量嗎？

答：有想過，工會應該是不受政府控制，有獨立性的工會。

問：為什麼這樣想呢？

答：因為如果由政府控制，不能代表工人的利益、替工人講話，也不能維護工人的權益。如果是一個獨立的工會，不受政府的控制，它才能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

問：到六四鎮壓之後，你們最初想租地方繼續搞運動，後來發展怎樣？

答：6月4日，5、6日都有公開的遊行、集合、堵截海珠橋

，6月6日深夜、6月7日凌晨，有武警出動抓人，有消息傳出局勢很緊張，軍隊已調動到郊區。學生和工人都沒公開遊行，想轉到秘密活動，秘密印刷傳單，想找一個房子作為總部。但都來不及辦這些事情，報紙已登出「工自聯」要自首。我其後就逃離中國了。

「後來自己覺得不能跟這個政治行動相分離，覺得作為普通的中國人，有義務從道義上關心這種事情……再聯繫到自己這些年來看到的腐敗現象，覺得自己老是這麼忙忙碌碌，任勞任怨地幹下去，實在是沒意義、沒價值。」

訪問中華全國總工會幹事 ——死水微瀾

問：你在北京「全國總工會」系統的單位工作，你們單位在這次民運當中有什麼反應？

答：我單位同事們對學運初期的態度反應是同情學生。從5月中旬，就是學生開始絕食後，反應逐漸強烈。學生要求民主對話，政府置之不理，學生絕食後，政府態度依然冷漠。政府對待知識份子耿耿於懷，四十年「控制使用」政策使知識份子倍感壓抑。這次以學生為先導的民主運動，使知識份子感覺到不能再沉默下去，為爭取自由投身到這場運動中去。

問：胡耀邦逝世後，你們單位對他的看法如何？是擁護他還是認為他一般？

答：在中國現階段領導人當中，知識份子對胡耀邦的評論不低。儘管他的思想體系不能為所有知識份子接受，存在一定差距。但是，近年中國高層領導層中，胡耀邦是具開拓精神的，他倡導人們樹立民主意識，所以大家是比較擁戴他的。他的逝世使人們對黨和國家再一次感到失望。

問：你的同事當中對學生上街遊行，對「反對官倒」等口號的態度如何？他們支持學生嗎？還是反對？

答：多數是支持的，態度也比較堅決。提出的口號很尖銳，很能觸動政府。

問：那時學生在廣場遊行，你們單位的人認為應該採取什麼行動，有沒有討論？

答：那時我們幾乎每天都在討論：這次民主運動的發展趨勢怎樣？我們應當做些什麼？怎樣喚起更多的民衆投身到民主運動中？中國百姓受封建思想壓迫，習慣於逆來順受；盲目的服從，缺乏獨立的意識，更談不上民族意識和民主意識，在工人和教育程度較低的人中，這個問題尤為突出。所以我們當時採取的行動不但是遊行、示威、喊口號，還印刷一些傳單，宣傳民主思想，喚起更多人建立獨立意識、民族意識、民主意識。

問：你們當時做這些工作，單位的人都認為應該這樣做嗎？

答：一部份。我們單位的人在這次民主運動中大體分為兩派：一派是激進派，就是支持民主運動的部份；還有一派是保守派，他們對民主運動是有抵觸的。他們認為這次民主運動是學生在胡鬧，缺乏基礎，熱血青年一時沖動，以為幹什麼都行，這只會增加社會不安定因素。

問：有沒有觀望派？

答：當然有。在任何運動中都少不了觀望派。這些人最顯著的特徵就是明哲保身，你鬧你的，只要不觸及他個人利益，他對搞什麼運動都不關心，不介入。

問：你是否可以具體談一下，這三個派，就是激進派、保守派和觀望派所佔的比例，成員的背景如何？如文化程度、年齡等。

答：就我單位看，三個派別的比例激進派和保守派佔多數，這兩個派別中又以民主派居多。

問：有一半？

答：有，或者更多一點。

問：保守派呢？有三分之一嗎？

答：大致是這樣。但是保守派中有些人是很有實權的。他們一般資歷深、文化程度高、年齡較大、官職不低，有一定影響力。

問：會不會是年紀較大的偏向保守？

答：基本上是這樣，保守派是以年齡較大的為多數。

問：大概多大？

答：最大的年齡接近六十歲，較大的為多數，快要退休了。

問：可不可以這樣講，你單位五十歲以上的都是保守派？

答：這樣講太片面了。五十歲以上的人並不都保守，他們當中一些人是擁護民主運動的，並且投身到這場運動中

問：保守派中有沒有年紀很輕的人？

答：也有。大概卅歲左右。這些人受教育程度不低，但思想很舊。

問：民主派佔多大比例？受教育程度如何？家庭背景如何？是否幹部家庭？經濟收入如何？

答：民主派在我單位過半數的年齡在二十至四十間，受過高等教育的佔多數，其他人也多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總體上講都屬知識羣體，水平比較整齊。當然民主派中也有工人參加，我們那裏有服務公司，裡面的工人當中一些人也是民運成員。從大陸各行業比較來看，知識份子的收入是不高的，他們很少有「外快」，勞動福利比不上工廠工人，和那些個體戶，外資或合資企業中的工人的收入相比差距更大。但是客觀的講，知識份子收入並不是最低，（起碼我們這個行業的知識份子是一樣），因為整個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遲緩，百姓生活都不富裕。在大陸企事業單位中，裙帶關係很嚴重，子以父貴的現象很普遍。老子做官，就要千方百計把子女、老婆，甚至女婿、兒媳安插到重要部門或者外快多的部門工作；外資單位，中央各大

機關，是他們的首選地。進了這樣的部門不但有房住、賺錢多，又體面又出風頭。我們單位屬「全總」下屬機構，算中央級單位，所以不少人是通過各種關係進來的，一些人父母官位很高，塞進幾個人不是困難的事。

問：會不會有這種情況，保守派都有很有實權的，支持民主派的人權力沒有這麼大？有沒有這種現象？

答：在我們單位，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是我們單位的實權人物。他不僅是黨的代表，還是業務主管；黨委開會決定單位裏一件事情的成與否，他是有影響力的。他下邊還有幾個中層幹部，也是主張「安定」的，所以當民主運動席捲全國的時候，有些角落依然沒有民主的陽光。他們知道這種運動會使他們掉烏紗，所以他們竭力阻撓，民主就意味着辦事要科學性、透明性，這點和他們辦事的封建性格之神祕性格格格不入。但不管怎樣民主已經成爲一種趨勢，是人心所向。北京春末初夏的民主運動在我們單位依然是轟轟烈烈，民主派得一些領導支持仍算佔了上風。

問：你們在討論學生運動時，是上班時討論還是下班討論？

答：我們很多時間是上班時討論，文化單位裏討論也可算是一種工作。當時的形勢大家認識到，要求民主、反對腐敗、拯救國家我們每一個人都責無旁貸。我們討論的主題就在這裏，如何喚起更多的民衆加入民主運動。因爲光光依靠學生的力量是不夠的，要喚起工農。我們當時印刷的宣傳單，就明確的提出要「喚起工農千百萬」，才能最後取得民主運動的勝利這口號。

問：你們在具體地發動工人或農民的工作上做了什麼？

答：我們的工作包括到街頭、廣場進行演講、散發傳單、張貼標語；爲「工自聯」廣播站提供稿件。宗旨就是要喚起工農，提點民主運動應當如何促進。首先就是要喚起民衆，要讓民衆有一種民主意識，達到一定高度的認識。如果民

衆沒有這種自意識而去喊民主是空泛的；所以不應當有局限性（因爲開始學生不願其他人士介入），而應當是全民運動。

問：那時是幾號？

答：我們搞這些東西時間是5月中旬。

問：你剛才說，你們有一個民主促進小組，對於這個組織單位的保守派有什麼反應？這個小組光是你們單位的人嗎？

答：小組成員以我們單位爲主，也有其他單位的人，如：「中國作家協會」、「中國食品部」也有人參加。我們的活動單位保守派是知道的，但在當時的形勢下，他們沒有作出強烈反應，儘管他們心裏很反感。搞投機的人總要利用各種機會，適者生存。那種大氣候他們不公開反對。只是說我們一些口號過激欠斟酌，對我們印刷傳單實行管制，說我們浪費紙張。

問：你們寫標語，印傳單都在你們單位嗎？

答：因爲小組成員多數是我們單位的，所以在我們單位做的多一些，在其他單位我們也做過一些。

問：其他成員單位中領導，有沒有阻止他們做這些？

答：有些具體工作他們是不知道的。大陸領導並不是每天都到辦公室巡視一遍，不了解手下人在做什麼也就談不上阻止的問題。況且有些領導對青年人搞民主是支持的。

問：你們印傳單，寫標語用的東西是自己弄來的，還是用單位的材料？

答：我們主要是用單位的設備和材料，因爲我們單位有這個條件，速印機、打字機、油墨、紙張都有。

問：你認爲這個情況在「全總」的其他單位普遍嗎？

答：據我了解「中國工運學院」就有這種情況，「全總」一些支會也有這種情況，但是「全總」這單位是比較「左」的單位，民運期間運動不大。



◆北京工人的示威遊行隊伍。



◆5月中，北京市各界人士都動員起來，聲援學生。



問：學生絕食後，「工自聯」很快就成立了，你們是怎樣知道「工自聯」成立了？你們那裏的反應怎樣？

答：「工自聯」成立，我想凡是關心這場民主運動的都會知道。我們幾乎是每天都去天安門廣場，「工自聯」的情況同學生的情況一樣受到大家關注。「工自聯」從籌備到正式成立醞釀時間比較短，準確的成立時間我不知道，記得是學生絕食後期。他們打出一個橫幅，宣佈「北京工自聯」成立。對於「北京工自聯」的成立，我們單位開始的反應是衆說紛云。大多數人開始時認為「工自聯」成立缺乏基礎，他們只是有熱情、有願望，缺乏組織，沒有完整的綱領，比較盲目，缺乏凝聚力，沒有核心人物。後來有轉變，主要是「工自聯」的成員努力不懈，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在發動工人參加聲援學生，爭取民主權益方面，得到很大反應。他們的領袖人物韓東方很年輕，受教育程度不高，但是他提出了一系列理論和綱領，我們認為是比較實際的，是可行的。

問：你們是怎樣接觸到「工自聯」的理論和綱領？是在廣場聽，還是接到他們的傳單？

答：我們在廣場經常能聽到「工自聯」的廣播，從中可以了解一些情況；也接到一些傳單，並且和「工自聯」的成員有聯繫，幫他們做過一些事。

問：你們在單位有否討論過「工自聯」成立和「全總」的關係會怎樣？會產生什麼影響？

答：我們沒有正規的討論過這個問題。但是認為「工自聯」畢竟作為體制外的一個獨立組織，是一個好現象。實際上在當時那種特殊情況下，產生這種特殊組織，跟「全總」產生一種對立是一面重要旗幟。我們很高興感到中國工人有希望了。「全總」這個機構只是黨的馴服工具，不能真正行使工會的權力，如同虛設，是個空架子。

問：那時你們是否很高興，看到「工自聯」成立，還是有些保留，認為現在不適合搞一些體制以外的一些組織？

答：我們當時認為的「工自聯」想法很好，但缺乏系統理論，條件並不成熟。「工自聯」只是在特殊條件下產生的特殊組織。對「工自聯」的成立我們感到很高興，儘管它不夠成熟。我們認為工人的崛起更能夠動搖統治階級，因為只有工人的崛起，當真正的無產者起來的時候，是腐權統治者最恐慌的。全國有幾千萬工人，這股強大的動力一旦被發動，中共統治必將倒台。而能夠發動這股動力的不是「全總」，不是其他民間團體，工人最信賴的莫過於自己的組織，所以我們希望經過這場運動的洗禮，「工自聯」能逐漸發展壯大，日趨完善。

問：你們「全總」系統當時是否認為支持重點應該放在「工自聯」一邊，還是學生一邊？

答：我們支持重點開始時放在學生一邊，後期有轉變。

問：後期是什麼時間？

答：是5月下旬。我們之所以把支持點從學生轉向工人是因為我們認為，這場運動要長期進行下去，僅僅靠學生是不能的，必須發動工人。工人在政治和經濟地位上都處在社會底層，受政府政治壓迫經濟壓迫最深，要求民主、自由的願望是強烈的。

問：你們當時有沒有具體幫助做一些事？

答：有。我們給他們提供一些稿件和一些其他的事。

問：5月底「工自聯」有三名成員被抓，你們知道這件事嗎？

答：知道。也有人（但不是有組織的）到公安部門前和其他人士一起要求釋放「工自聯」三名成員。

問：在6月2日《北京晚報》登了一篇《北京市總工會公佈》說「工自聯」是非法組織，要求政府打擊，你們有什麼反應？

答：政府要取締「工自聯」這個組織是意料中的事。因為任何

一個行將死亡的腐權政府，對所有新興力量和組織都要極力鎮壓、排斥。「工自聯」的一套行動綱領是能夠代表工人利益的，符合大多數工人願望的，中共這樣的獨裁政治更不會容異己力量的存在。因為工人提出的很多東西和政府的意願是格格不入的。

問：你們覺得「北京市總工會」發這公佈是出於自願還是被迫的？

答：我認為是被迫的、違心的，起碼受到一定壓力，他們比局外人更能了解工會在工人中的地位。

問：在你所接觸一般的工會幹部會不會對一個獨立的工人組織，比如「工自聯」產生抗拒性，還是他們認為這是需要的？

答：就接觸的工會幹部中，他們認為工人應當有一個能夠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自己可信賴的組織，他們都認為「全總」不能代表工人們的利益，不能反映他們的願望和要求，更不會為工人權益和勞動保障和政府抗衡。這些工會幹部對「工自聯」的產生，非但沒有抗拒性，還積極參加支持「工自聯」的工作，他們從「工自聯」的成立看了中國工人的希望。

問：六四後你們單位的情況如何？5號上班時大家有何反應？

答：六四屠城後我們大概有一個星期沒有上班。因為六四後軍人還不斷在放槍，人心惶惶，而且人們處於極度的悲痛和憤怒之中，接觸到的所有人都在罵李鵬政府的殘暴。

問：一個星期後上班是你們自願的還是單位領導要你們去？

答：我們都是自願去的。

問：上班後你們是否可以公開的討論屠城的情況？有沒有覺得要反抗？（不便談的可以不講，做個大概介紹）。

答：我們上班後，幾乎其他工作都暫時停頓了。首先大家不願為喪失良心的政府做事了。北京民主運動不但震動全國而



▲「全總」屬下的「工人日報」也跑上街頭示威。



◀ 站在羣衆那一邊的解放軍文職人員。

且震驚全世界，除了心情感覺極大的壓抑，為死難的戰士和無辜死去的人感到萬分悲痛以外；覺得這是中華民族又一次新的崛起，是五·四運動的繼續中國民主運動，不會就此泯滅了。獨裁政府的大勢已去，民主運動加速了它的滅亡。

我們討論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如何保留民主運動的火種。這次民衆自發的民主愛國運動雖然被鎮壓了，但不能就此沉淪、徬徨，應當制定今後的奮鬥目標，繼續八九民運未完成事業。在屠城之後幾天未發佈通緝令時，大家的討論還未受到很多限制，人身安全暫時未受到威脅，話還敢講。每天大家聽到的情況，信息都及時通報，作出分析判斷。總結這次運動中的經驗及教訓，包括學生和工人哪些做的不夠。學生從開始要求民主對話，絕食到後來不可控制，工人開始比較盲目；到後期有自己一套綱領逐漸走向成熟，在萌芽階段又被扼殺了。今後中國民主運動道路應該如何走？大家認為採取非暴力手段解決中國問題是最佳選擇。

問：你覺得大家當時的心情如何與76年天安門事件相比與文革相比？你覺得六四以後人們對共產黨政府看法是否改變？有否討論到這個問題？

答：在屠城之前和屠城之後的說法有很大差異。四人幫倒台那年，四五運動發難，對全國有很大震動，也成為此次民主運動在全國爆發的契機。客觀的講，十年改革在屠城之前，確使中國大陸發生了一些變化。無論是政治上、經濟、教育、農業、人民生活都較十年前有所改觀，百姓感到中國還是有希望的，政府並不是不可救藥的。六四槍聲使人們對共產黨的最後一點希望破滅了。

問：你認為這種想法普遍嗎？

答：相當普遍。

問：你們有否談到在北京六四那晚及六四後那段時間被殺的

有多少人？

答：六四那晚我就在長安街上，沒有在天安門。那晚11點左右長安街的燈忽然熄滅，防暴警察開過來。一邊走一邊朝人羣開槍，當時大家很天真認為政府不可能向手無寸鐵的要求民主對話、促進國家進步的百姓開槍，心裏還想不過是橡皮子彈吓唬一下而已；可是當子彈射到牆上濺起火星，這告訴我軍人打的不是橡皮子彈，是真槍實彈，是可以打死人的。政府對人民下手了！在距我幾米遠外的幾個人中彈相繼倒下，發出沉悶的「扑通」聲，我恐有不測，趕緊往胡同裏跑，一些不明真相、憤怒的人們還在往外跑。天亮後，就是六四早上，我沒出去，下午我又到長安街上去了，昔日寬闊整潔的長安街上，滿目焦土，遍地瓦礫，有些商店玻璃上彈痕累累；一些鐵欄被子彈打穿，彈孔有手指樣粗。驚恐、憤怒的人羣，在長安街上利用一切可能和政府派來保護人民的「天使」——持槍的軍人做頑強的抵抗。這場偉大的運動人民付出了巨大代價！長安街燈欄貼着傳單；據紅十字會統計，六四一天死難人數已達三千！6月5日我再次到長安街，軍人還在不斷開槍殺人，坦克車不斷掃蕩，從中南海門前一直開到工會大樓以西，然後再開回來；一天三趟，天空直升機在盤旋，北京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 訪問記(一)

按：以下訪問是在5月下旬在天安門廣場「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廣場指揮部內進行，被訪者是「工自聯」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為了安全理由，被訪者身份不予公開。

問：你可否講述一些工人參與這場運動的狀況？

答：最初，我們一班工人並不是要組織什麼組織。大家走在一起，舉起「工人自治會」的牌子是作為一種號召力，它並不包括什麼政治目的，也不想走在運動的第一位。當運動一開始，大學生是先導者，他們的行動喚起了我們最起碼的良心，就是一種善良的同情心。很多人都因為這個同情心，走上了街頭，知識份子也認識到這是實際的問題，也走上了街頭。運動愈發展，就愈顯得緊張。我們的首務是要保衛大學生，我們於是發動阻截軍隊進城。可以說，每天都不能睡覺，吃也吃不來。我們什麼設施都沒有，像這個指揮台都是臨時架起。這面大旗子打出來並不代表這個工人自治會是如何如何的成立；它主要是發揮一種聯合作用，爭取更大的團聚，爭取運動的目標實現。

當初，我們對運動的認識不是那麼深刻，因此，在過程中，完全是一個認識過程。可以說，首先是憑着一種熱情把大家團聚在一起，都是自願來的。我們打起大旗，自己捐錢，獨立運作，我們主動聯絡「市高聯」，提供協助。在運動開始的時候，我們就說，今天我們參加這場革命，就有不怕死的精神。政府已將這場運動定性為「動亂」，情勢就顯得相當緊張。我們就算死，也和千萬民衆心連心，甘願死在這條戰綫上。政府煽動地說我們的運動是一小撮的人策動。你看，今天的聲勢那麼浩大，一兩個人可以煽動起來嗎？造成這樣浩大的聲勢是政府錯誤的決定及獨裁的本質。例如，學生提出的只是兩個簡單的要求。作為一個人民政府，如果承認它是一場愛國運動的話，政府是應該實行對話的，學生的意見可以作為一種參考，反正學生並不是無知的，他們是有理智的。我認為，假如政府當初接受對話的話，就不會發生今天的事情。中國人的本質是善良的，但善良本質並不表示可以任人勞役、愚弄。作為一個人民機構，就必須要想到這一點，假如要在人民面前玩弄政治手腕的話，人民就會發動起來。經濟改革發展了一段日子，國民經濟稍有起色，但政治上老是停滯不前；政治體制改革老是提，但具體方案就從來沒有交待出來，今天，大學生的行動就是要求加速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首先是要實現民主、法制，如果沒有民主、法制作為前提，要進行改革也只是空話。「工人自治會」成立不僅僅是作為推動這場運動的一種力量，而且是徹底否定所謂「工會」的政治體系的一種象徵。我們組成時的概念是，與「學生高聯」聯合起來，聯合行動，互相呼應。不過，在運動過程中，我覺得學生仍然缺乏經驗，而且在決定某行動時往往沒有經過深思熟慮，不太成熟，行動上很容易造成一些亂子。我有一段時

間在廣場指揮部替學生領袖做了很多思想工作，例如在前幾天，政府說會在早上5時清理廣場。當時廣場上相當混亂，也很緊張。當時我是在指揮部的。學生指揮部說要撤離廣場，我就同他們分析形勢，我說：「你們一定要了解情況、分析情勢；必須要穩定軍心。現在不單單是學院運動，現在各方面民衆都起來，他們會與你們站在一起的，你們不能隨意作出撤離的決定。全市人民都在發動保衛學生的行動。」可以這樣說，學生的行動也是保衛全市民衆。每個人都以大學生爲中心。

說到我們的政府，我認爲作爲一個人民政府，看見了成千上萬的大學生在靜坐、在絕食，兩天、三天或者可以忍，但發展到五天、六天就不可以忍了，到第七天，絕食同學的生命已到了極危險的地步；無論一個政府如何腐敗，如何沒有人性也好，都應該出來看看學生。不要把人民看作是愚蠢的。如果是真正爲人民着想，就必須放下架子，說說話；這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問：當天你們跟學生領袖做思想工作，兩者之間的思想差異，或者他們對「工人自治會」的反應是怎樣的呢？

答：最大的差異是學生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場全民運動。他們一直認爲這是一場學生運動。他們把絕食團、請願團作爲鬥爭的主體。但我認爲，假若學生有「全民運動」這個概念，他們必定在我們之後。也在全民保護之後，當時的事態發展，已非學生的能力可以應付，但他們還是站在前綫！我們意識到這是場全民運動，但學生們還是認爲這是學生運動的過程！在運動過程中，有很多市民組織，什麼「市民請願團」，都自發地組織起來，都是自願的。他們有一點熱情，一點同情心，「你們跟我走，堵截軍車」，就這樣帶着羣衆。他們的行動都是跟大家保持一致的。但這個組織成立不成立，對學生組織來說，就沒有什麼承



▲新聞界的遊行隊伍。

認，也沒有什麼不承認。有一次，我到廣場指揮部聯絡工作，我希望在學生的思想上做些工夫，可是「學生高聯」看來沒有把「工人自治會」放在重要位置上；學生運動就是以學生為領導，我們的地位、角色就成為次要。當初，事情發生時是一場學院運動。開始時確實是一場學院運動，你不能否定，假如開始時不是學院運動，是工人運動，政府就可以馬上把你鎮壓下去。所以這個問題是一個時期問題。就是前一段時期，學生有沒有這個概念，到後一段時期，他們還是否有這個概念。到後一段時期，情勢已發展到全民運動，但他們的思想、概念還是沒有轉變。我打個比喻，作為一個指揮，你不考慮這個轉變的問題，那麼歷史賦予你的責任也就到此為止。一個有責任的總指揮，有的新思想、組織概念，就應該馬上介紹出來；同樣，當認識到一個比自己更有能力、更適合的人，我覺得應該讓地位給他。歷史使命我已完成一部份，自己再沒有能力的，就應當由更有能力的人繼續完成，不應認為到自己死才算完成使命。鄧小平的悲劇就在這裏。你看，現在就要走上民主嘛，那為什麼自己先來獨裁呢！

問：剛才你說到這是一場全民運動，你們作為工人階級有沒有想過擔起這場運動的領導大旗呢？

答：在這場全民運動中，工人的領導地位是不容否認的。從歷史來看，他們始終要走上這一步。但是，從過去到現在，工人始終沒有真正完成這個歷史使命。像五四學生運動及以後的學生運動，結果都走上了工農的路線，工農擔當了領導運動方向的角色。我們「工人自治會」的大旗打出來，作為一個組織，有它的綱領、宣言、目的、任務，按照這個程序辦事。在今天這個情勢下，為了千萬大學生的生命安全，為了保衛我們的民主，為了國家的前途，我們是必須要站出來的。我們擁護共產黨，但共不表示我們就擁護這個獨裁的政權。這個觀點有必要弄清楚的。

問：學生對工人組織起來的反應是怎樣呢？

答：我們從當初打起這支大旗到今天，學生反應特別強烈。可以這樣說，當「工人糾察隊」走到學生方面去時，學生表現特別感動。就說我吧，當我看到學生及老百姓熱烈歡迎我們時，我實在控制不了。而羣眾對待學生也表現了那種至愛之情。學生沒錢，羣眾就拿來東西，「吃吧，吃吧」；學生就回應：「北京人民好，謝謝人民」。從這小小的事件，可看到人的感情及彼此之間那種融洽。自從學生民衆擔當起維持首都秩序之後，交通事故，大大降低；盜竊、刑事案件率大大減少，這已經說明了問題。就說普通的老太太們，她們站出來說：「孩子，你不要怕，軍車來，我去，我看他們夠膽對我這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做些什麼？」有些躺在坦克車下說：「你壓吧！你要鎮壓學生就首先在我身上壓過吧！」有些軍人真的被感動了，無地自容，他們覺得有愧。

問：你可否談談你們的組織情況？

答：「工人自治會」還是在一個籌備過程中。「工人自治會」的牌子打出去，是作為號召作用，宣傳作用。我們當中全部是工人，其中有「首鋼」工人，也有一些是攪新聞工作的同志，他們放下原來的工作，跑到這裏來。此外，我們的結構都很簡單，我們有常委會，當中選出一個總指揮，其次有秘書處、宣傳部、聯絡部、接待處、後勤部、糾察隊、播音部等。開始時，我們都沒有什麼選舉，我們看重素質要求，誰願意，誰有能力、才能，就由誰人擔當領導工作。

問：在學生運動爆發之前，在工廠內，你們有沒有組織類似「工人自治會」的概念呢？

答：可以這樣說，學生運動未開始之前，誰也沒想過要組織什麼的組織。但形勢的發展使我們意識到就我們被槍斃、被

殺頭，也要站出來，這是一場運動嘛！胡耀邦逝世那天，成千上萬的人站在長安街兩旁，我坦白說，大家對胡耀邦不是特別了解的。他死的原因，他有什麼過錯，大家都是不太解的。學生遊行，喊出「胡耀邦同志，你去得太早了」，從那個時候，學生的行動起了一個啓蒙的作用，也由此而導致這場運動，而我們也不得不組織起來，站出來。至於參加「自治會」都是自願的，有個人，也有些代表單位的。我們也派人到各單位聯繫，而廣場上的「工人糾察隊」、「工人敢死隊」也跟我們聯繫，願意加入的就接受「自治會」的指揮，大部份都是個人自願加入的。

問：有人說，我們的國家是工人當家作主的，你認為呢？

答：在我們的國家，當家作主的問題，是一個很抽象的問題。你說，誰作主？這裏就牽涉到權益衝突的問題。就說我們的工會，它作為工人的工會，其真正目的應是很鮮明的，是要為工人說話嘛！這是最起碼、最簡單的概念。但很明顯，它還只是給我們發幾張電影票的機構而已！在很多情況存在這個問題，誰當家作主就是很明顯的了。但對於工人當家作主，或是說無產階級專政的是否認同的問題，我想是必須要認同的，但必須在充份的民主法治的基礎上建立工人當家作主的這種制度，它不是以某一個人的利益為前提，而是以全國大多數人民利益為出發的一種結構。這是必須同意的。如果只是口頭上，而非實質上，就會名存實亡了。今天這場運動，是要推翻一個以個人的意願代替全民族的意願的一個獨裁結構。如果你聲稱一個人的意願代表全民族的意願，就不要表現在口頭上，而要表現在實際行動上；如果是真的代表人民的利益的話，人民會跟你走；如果你的意願與人民的相違背的話，你只會被孤立起來。我相信，這個概念很清楚的。

問：在工人首次組織遊行之前，是否對學運或民主問題已進行

討論呢？發動遊行前後，工人的政治意識有什麼變化呢？

答：在學生運動開始時，工場中大家都有議論，大家都認為學生運動肯定會走上進一步的高潮。至於到怎樣的高潮，大家都只是在議論；更沒有組織一個什麼的組織的想法。而所討論並非什麼民主等理論問題，大多是圍繞現實的問題，對生活表示不滿的較多。工人始終是從較實際的地方考慮問題的。但到學生絕食以後，大家都有保衛大學生的態度；到後來，大家都不想單獨行動，因而有組織一起的概念，以團聚更多人。工人能夠站出來，成立「工人自治會」，充份表現了他們已建立了一份信心。不要以為工人是一些「能幹活就算了」的那一類大老粗。有理論水平的人，也會走上工人崗位，當起工人，當考慮到工人的權益時，他們也會站出來的。從今天這個運動的情勢來看，可以看到人民是希望參政、議政的，希望知道國家的大事，為民族作出貢獻。雖然「人大」是存在，但「人大」能不能代表人民呢？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問：工人心中看來是有很多不滿，但為什麼不見他們把不滿通過行動表達出來呢？

答：我認為這個由於缺乏一個真正代表工人、真正為工人作主的機構，可以說是工會吧！假如現在的工會肯為勞動人民說一句話，那麼，今天的工人就可以打出自己工場的工會牌子；假如工會的領導人不怕掉烏帽，為履行工會應有的責任，站出來做一點事情，相信他們的號召力肯定比我們大。現在這個「總工會」徹底把自己否定了。我們對「總工會」已不存幻想，真正的力量還是要靠自己嘛！

問：你認為「工人自治會」最終能代替「總工會」的地位嗎？

答：代替不代替的問題，我認為，中國假如實行了政治體改革，「總工會」肯真正為工人做一點事情，那麼它的角色仍會是工會的角色。不過，民主法制不健全還是最根本問題，

根本問題解決了，其他事也會好辦。

問：「自治會」與「總工會」同時並存會否做成矛盾呢？

答：不會。假如是在同一個利益上，都是為工人謀利益的那就不會矛盾。只要你承認其綱領，服從其權利義務，都可自願參加，不應是強制性的。

問：「總工會」是共產黨控制的機構；而「自治會」是工人自發組成的機構，兩者之間無論在形態、意見、行動上都有很大不同。

答：這是一個最基本、最根源的問題。如果我們的宗旨都是一致的，為什麼今天我們出來遊行呢？如果我們的利益都是一致的，為什麼我們要幹出今天的行動呢？產生分歧就是這根本性的原則問題。所以說，「總工會」實際上是存在的，但實際工作沒有做。假如我們能擔當起，或如你說代替「全國總工會」的話，我想，這場運動會攪得更徹底。我們都是原來的工會會員，為什麼我們站到這裏來呢？現在可以說，已經否定了原來「總工會」，站出來就是否定它嘛！這是很自然的。

問：如果這場運動給政府武力鎮壓下去，「工人自治會」將會怎樣發展呢？

答：從現在的形勢看，暴力鎮壓的可能性是不太大的，因為它所波及的不單單是北京「自治會」，它已經發展到一場全民運動。如果今天我在部隊裏，有思想、有頭腦的，就是殺了我，我都不能殺我的親人，我的槍怎會對着我的兄弟姐妹呢？

問：運動發展到今天，你認為發展方向正確嗎？

答：我想，運動是以人民大眾利益為出發點，是沒有錯的。有人喊出支持趙紫陽，我認為喊出這個口號的人，並不是對趙紫陽抱有什麼幻想。首先並不是某一個人的意志來決定整個團體的意志。趙紫陽出來也只是帶個頭。問題不在於

其個人是好是壞，而在於這個制度能否建立在一個真正的民主法制的基礎上。

問：至目前為止，你如何評價這場運動呢？

答：這場運動能喚起民衆站起來，為共同一個目標，它的中心目標跟每一個人的利益都是相關的。如果毫無相關的話，就根本談不上根本利益問題了。民主問題就是每一個人的問題。所以，談到評價，是有目共睹，不管它成功與否，它也會在歷史上成為光輝的一頁。

問：有人說，中國解放之後，仍沒有改變獨裁專政的本質；你認為呢？

答：這個問題這樣說，從1949年開始，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他這樣說並沒有真正意識到如像這場民主運動會有一天發生。說「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只是從被人欺負的意義下站起來。怎樣真正的站起來，它的涵義還是很深遠的。當時他這樣肯定地這樣說是不對的。我認為「站起來」在歷史的情況下應有其階段性。從49年到今天，發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情，不管十年文革也好，或是其他人為的災難也好，中國都經歷了一些混沌的階段。因此，國家是需要一個比較穩定、有秩序的安定、和平階段，才能鞏固經濟發展。如果在這個階段保持經濟發展的同時，國家不斷改變原來的腐朽機構和真正把整個改革建基於民主法制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展民主政治的話，那是更有效的避免發生這種「動亂」。現在這場運動不是被定性為「動亂」嘛！我們為什麼要動亂，我們根本不需要動亂，誰喜歡捱餓、受累！我認為「真正站起來」，在目前還不是下定義的時候。民主的真正站起來，不僅僅是說擺脫外人控制的「站立起來」。

問：你對「民主」的概念是怎樣的？

答：一般的概念是「大家說」；但是在某種情況下不能「大家



◆設在天安門廣場西北角的「工自聯」指揮部。



說」，大家說就會亂。有民主就有集中。民主的意見代表了共同的意願、大多數人的意願。「民主」的概念還是在逐步完善的過程中，孫中山也談民主；但今天民主革命仍在進行，那些民主革命的先烈不知會有何感想呢？他們把過去的封建腐朽政權推翻，取得政權，建立「民主」政府，但為什麼我們還要進行民主革命呢？那些在天之靈的先烈們，不知有何感想呢？學生提出了很多爭取民主的口號，但沒有什麼具體內容，我認為這是一個啓蒙，提得過高的話，看來是不合學生的身份，過低也喚不起民衆。我看，他們提出的口號也是有道理的。

問：你認為如何在中國貫徹民主呢？

答：民主，先是一個認識，這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歷史是一步一步來的，它總有一段過程，我們從49年開始就談民主，今天，也還是在這個階段上。

問：那麼，「民主」的概念是否可通過「人民代表大會」體現出來？

答：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根本沒有真正貫徹「人大」的真正作用。「民主」概念根本被他們自己徹底否定了。如「人大」常委會在非常時期可以馬上召開，但沒有。如果「人大」在較早時能夠召開，解決問題，我想是可以穩定局勢的。

問：你對一黨制的看法如何？

答：一黨制有利有弊。利的是，可以完全集中，黨的根本路線可以統一。根本的統一，對於工作有很大的好處，都是在黨的綱領之下嘛；它的弊，是往往對一些不同意見不能接受及容忍，相對來說，對不同意見未有產生保障作用。譬如說，什麼民主黨即使存在，但也只是屬於共產黨的附屬

物，可以說是黨的機構。

【選編自《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二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年11月】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 訪問記(二)

按：以下訪問是在5月下旬在天安門廣場「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廣場指揮部內進行，被訪者是當天負責帶領工人、市民大遊行的總指揮。為了安全理由，不公開被訪者身份。

問：你可否講述一下目前的狀況？

答：目前的形勢已發展到李鵬偽政權與全國人民和學生為敵的時候，學生所組織的，或者各階層發起聲援學生的運動，經過長期的請願、遊行和各種憲法賦予的權利的行動後，在這次對中華民族有重要意義的民主運動中，仍然取不到果實的時候，就需要有一個由工人為主體的，包括知識份子參加的各階層的聯合會，能夠有犧牲精神、挽救中華民族的命運的集團站起來。我認為這樣才能夠把這個運動推向勝利。李鵬政府是人民的公敵，他手中有莫大的權力，有他的腐敗的組織，還有他控制了的新聞工具。人民作出了很大努力，我們的大學生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堅守在天安門廣場，和市民一起堵截戒嚴部隊。這樣的場面是非常悲壯的。但是，經過了這樣長時間的鬥爭，還沒有什麼

結果；我們的學生遭受到這樣的苦難，和我們的市民的那種熱情和勇敢精神，作出種種努力，仍然沒有改變政府面對人民的狀況。我認爲，作爲有智慧、有理論修養的、關心國家前途的青年們、知識份子和工人的中堅力量，必須站起來，用犧牲精神，把中國前途推向光明，否則，中國最終也會光明，但有可能存在一段恐怖時期，籠罩在每一個市民身上的黑暗時期。世界各國正注視着我們，外國留學生注視着我們，各界人士也注視着我們，因爲，中國邁向民主化、現代化、科學化的勝利對世界的和平、世界的富強和發達有着重要意義，因爲中國是一個十一億人口的大國。繼承這次運動，把二千多年來封建的、迂腐的政治殘渣餘孽、頑固勢力，徹底掃除，真正的向民主化、科學化和有利於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邁進，中國人才有希望，中國人的智慧、勇敢精神和他們的創造力才能得發揮，我們這個悠久的中華民族才能有希望，才能以更快的步伐和速度超越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否則我們只會繼續落後。

問：剛才你說學生沒有能力完成這次民主運動的任務，爲什麼呢？

答：這是從中外的學生運動史、中外的共產主義運動史來說，這是一個規律。由於學生本身的經驗、對理論的把握、組織上的能力，都只限於和平請願。任何一次歷史都看不到學生可以真正帶領全民族把一獨裁的政權、頑固的政治無賴的這樣一個政權推翻的。但是他們可以在和平的條件下，用憲法賦予的權力，或者，可以把國家的民主化推上一步；或者用他們的熱血、犧牲精神喚醒民族的覺醒。這是他們最大的貢獻和意義。但是他們有局限性。沒有工人和知識份子的起來，這個任務是完成不了的。我認爲，中國的知識份子有軟弱性、依附性和缺少犧牲精神。在這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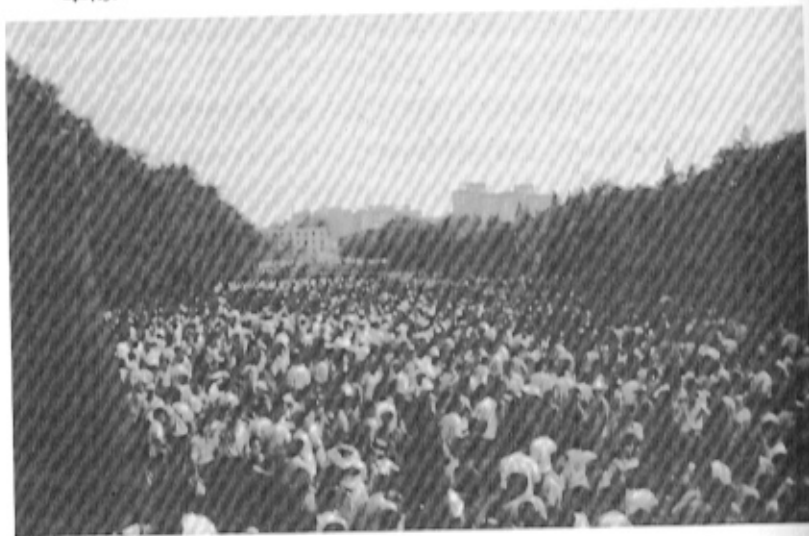
情況下，只有工人才能真正的站出來。我認爲中國人的忍耐精神是有目共睹的，這幾天的罕見場面，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在這種情況下，在種種感人悲壯場面出現的時候，我們的市民、我們的工人、學生們仍然表現理智，仍然維持了首都的秩序，用憲法賦予的權利來爭取我們的民主權利。我們都不希望有動亂，而事實上，這次運動絕對不是動亂，更絕對不是一小撮人所能發動人的。人民是有理智、有頭腦的。這次的全民民主運動，從政治、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是必然要發生的。

再過幾十年，回過頭來看時，這一次運動對中國歷史會起着一種無法估量的意義。只要站在理論的高度、站在羣衆、站在這個運動的發展高度來預測或者來評價的時候，正如當年的馬克思評價、研究巴黎公社失敗一樣。只有這樣，才能洞悉中國現在發展民主運動和它對中國以後進程中所產生的巨大的歷史意義。在這場運動中，儘管是失敗或取不到怎樣的成果，實際上，學生是勝利的，人民是勝利的，因爲已經喚起了全民族的民主意識，我們中華民族的勇敢、智慧和犧牲精神，再一次得到體現。我知道國外很多政府、人民對我們的學生、市民的勇敢及理智表示了重大的敬佩，我覺得這是值得我們驕傲和自豪的。我認爲一個人的生命的價值在於他追求民主和自由。實際上，一個人遲早都要死，十八歲也死、八十歲也是死、一百歲也是死；死的意義不同，有的輕如鴻毛、有的重如泰山。我認爲，目前的經濟改革，都以追求金錢和商品爲目的，當中國人民忍受不了這種商品經濟時，特別是上層權力腐敗、官僚腐敗，給人民帶來災難的時候，人民所受的壓抑必然會爆發出來。胡耀邦的死引發這場運動，我認爲，即使他不死，在五·四紀念時也可能要爆發的。這是歷史的必然，任何人都阻擋不了，就像世界各國一樣，都向民主

◀挨餓的學生弟妹們，你們的工人
老大哥來了。



▼ 6月3日，「工自聯」成員帶領羣衆，湧向各路口堵截軍隊。



化、現代化發展，這是潮流。任何人想借助人民的力量，想利用人民創造的財富，貪污腐化，過奢侈的生活，這是歷史所不容許的，人民也不會容許。

問：假如工人領導這場運動，其意義會與現在的有什麼分別呢？

答：工人是社會歷史的創造者，當他們起來的時候，就直接威脅國家的生產、社會經濟和社會發達，這不是學生能夠替代的，因為他們不生產，不直接創造價值。當工人組織罷工，整個社會都會癱瘓，直接給這個政府造成威脅。如果軍隊要鎮壓，生產就會停頓。人總要生活吃穿嘛！這就是工人的力量，這就是工人創造世界、創造歷史的力量。但是，工人也必須要和知識份子聯合起來；因為，工人在理論上，在指導運動上，在整個理論水平上，他們不具備一定的條件。現在的潮流是重視知識份子，重視科研人員，我認爲原因在於此。假如現在我們的工人素質都是那些高科技人員，我認爲這場動中，工人早就會起來，不會拖到今天的。實際上，今天「首鋼」工人仍然未有站起來，未有全部站起來。我認爲他們早就應該站起來，盡快結束這場全民愛國民主運動。否則的話，每拖一天，對我們中華民族沒有好處。

問：你們有沒有去其他工廠，例如「首鋼」做宣傳及聯絡工作？

答：有。我們有派工人去「首鋼」做宣傳鼓動工作，這是我們任務之一。我們是以工人爲主體，那麼就要聯繫工人與其他力量，聯合起來，參與這場全民愛國的民主運動。我們一定要勝利，否則中國就會進入一個黑暗時期。

問：你們在工人當中如何宣傳呢？

答：我們通過工人的自發宣傳，通過宣傳車、「工人自治會」自辦的廣播、小報，各種方式都有。官方宣傳渠道被官方壟斷控制，那麼人民就必須有自己的一套宣傳手段。我們

宣傳時，例如在「首鋼」，我們可以保證「首鋼」工作，生活秩序為前提的。我們是按照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利來進行的。我們是從國家的大局出發的。如果事態發生到非常嚴重的話，只有工人罷工能解決問題的時候，那麼，我們就會號召罷工。

【選編自《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二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年11月】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 訪問記(三)

按：以下訪問是在5月底大屠殺發生之前進行的，被訪者是「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的負責人。為了安全理由，被訪者身份不予公開。

問：你們組成「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最大的目標是什麼呢？

答：我們「自治會」的目標是為工人爭取民主權力。由於現在的工會只是做一些娛樂性的工作，不是代表工人自己的政治利益的組織，來把工人團結起來，來保護工人自己的權益。

問：「工人自治會」會否取代目前的「總工會」呢？

答：我認為不會，因為「總工會」是政府的一個組織。工會本身有它一套的系統，它的一套綱領，是共產黨的一個外圍組織，或者說是一個基層組織；它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也發揮它自己組織工人、團結工人的作用。而「工人自治會」是一個工人羣眾自己的團體，是作為工會的競爭對手而存在，與工會競爭。如果工會辦得好，那麼，我們的「自治會」很可能在以後人民民主參政的過程中取不到地

位，不能代表大多數工人的利益；但如果工會辦得不好，我們「自治會」就可以出來，代表大多數工人，保護他們的權利。

問：這樣說是否表示你們有這樣一個概念，就是在以後，把「自治會」變成爲一個政黨呢？

答：在我國，民主黨派的概念包括一些社會團體；「工人自治會」只是一個社會團體，不是黨派，以後也不會轉變爲一個黨派。一個政黨有內部嚴密的組織；「自治會」是一個鬆散的組織機構，不具備與任何政黨爭權奪利的條件。

問：你們作爲工人有參政的概念，如果沒有屬於你們的政黨，如何參政？

答：我們的看法是，共產黨從根本上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的，也代表了工人的利益的。但是，共產黨的某些政策，或者說政府的某些政策執行得不得力。在正常上，雖然是代表工人的利益，但它在下面執行的過程中，由於種種原因，發生了一些轉變，這樣，使得這個政策本身執行的結果，並不是符合工人的利益的。所以工人成立「自治會」，是爲了修正，或者是監督共產黨，能夠更好的執行政策和方針。

問：剛才你說「工人自治會」爭取參政及監督共產黨。你可否說一下怎樣參政及怎樣監督共產黨呢？

答：我個人的意見是，可以建立一個參政會，由民主選舉產生。這個參政會中，「工人自治會」可以作爲一個團體。或者說，按照目前我們的講法，一個民主黨派，跟社會其他各階層，例如農民階層、商業階層，一齊來制定一個可以達到我們目的的法律。這個參政會相當於外國的上議院，或者是參議院；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一些最基本的政策，由參政院制定具體實施的法律。在這個制定法律的過程中，由共產黨和其他各個黨派參加這個參政院。可以說，各黨派、團體，包括共產黨在內，是公平競爭，通過選舉參加

這個參政院。

問：你這個概念是不是把目前中國原有的制度完全改變？

答：不是完全改變，而是改革。我們認爲，十年經濟改革已經使經濟基礎發生了重大變化。根據馬列主義的原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那麼上層建築也應該發生相應的改變。目前，我們國家的政府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進行了很少的、一點點的工作。由此，產生了這次運動。

問：那麼，在你的概念中，改革後的中國是否仍存在最高權力機關呢？

答：目前政府的最高權力機關仍會是國務院；而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是「人民代表大會」。我們贊成西方的三權分立的原則。

問：三權分立是西方資本主義國的政治制度，你這樣說是否反映工人階級希望中國走回資本主義的道路呢？

答：不是。我的看法是，既然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那麼，作爲自由經濟的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和作爲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在商品經濟這一點上有共同點；那麼，共同的經濟就會決定共同的政治結構。我認爲目前的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因此上層建築要作相應改變，通過參政院機構，制定具體實施的法律，而計劃則由政府制定。

問：政治制度的改變，會使共產黨原有的政治權力受到削弱，你們如何把你們的概念付諸實現呢？

答：共產黨的權力是否下降要看它是否能夠更全面、更真實地代表全部整個人民的利益。我們認爲我們的主張，必定會是共產黨內高層領導人，或者說是共產黨從上而下的領導階層中的部份既得利益者所不能接受，而並非是所有共產黨員。我們希望通過這一場人民民主運動，爭取我們的主張付諸實現。我們的組織、行動對政府來說是很大的威

脅；同樣，政府對我們來說也構成威脅，因為它隨時可以把我們壓下去。但我要重申，我們所反對的是現政府的一些倒行逆施的政治措施；我們並不是要推翻共產黨，我們是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的。

問：過去，中國發生了很多政治、經濟、社會問題，有人說做成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是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你認為呢？

答：我認為，從根本上找原因，是由於生產力變化以後，生產關係就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從而導致經濟基礎的變化，最後導致政治上層建築的變化。比方說，一個最簡單的問題——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問題。過去，我們知道任何東西都是社會上所需要的；那麼，作為計劃經濟，那是很容易解決的。比方說，我只要規定你生產最多的東西就可以；而現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已經達到可以超過你需求的那種要求。比方說，生產電風扇、洗衣機等，很多工場都生產這類產品，一下子，產品就衝破需求錢，造成了市場的不合理及混亂。而共產黨任命這個政府，其中某部份人的無能，相應地就造成了貪污腐化等現象。

問：中國號稱是社會主義國家。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社會主義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表現，你作為一名工人，你認為在中國是否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呢？

答：我認為共產黨一直以來，到現在，都是實行人民民主專政。但是「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概念應該拋棄，因為人民民主專政是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提出來的；在目前，階級鬥爭已經轉變為第二位，而經濟建設已轉變為主要任務。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提出「人民民主專政」的口號，而不是人民民主專政。我們提參政院的主張，在這方面來說，也可說是有相連關係的。至於「無產階級」這個概念，假如無產階級能夠代表整體人民利益的話，那麼「無產階級」與「人民」就可以劃上一個等號。共產黨從根本上是代表無





旗幟鮮明的「工自聯」。

產階級的利益，而作為共產黨政府，不但要照顧無產階級的利益。（在我們的國家，「無產階級」的概念就是工人階級），也要照顧農民、幹部、商業、知識份子和各階層的利益，所以我提「人民」這個概念。但我一直說的是，共產黨能夠代表人民的利益！並不表示它已經做到這一點。目前的共產黨已經違背了工人，或者是人民的利益。

問：很多人都說工人階級很現實，他們只關心工資多少、獎金多少、生活如何等，政治意識是很低的。你認為呢？

答：作為首都工人的一份子，我可以說，在全中國範圍內，整個工人階層中確實有這類工人存在。但作為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首都工人不是這樣的。有很多人都以為首都很好。實際上，住在北京，在生活和各方面都不會比外地的舒服。但是有一點不同的就是，北京的政治氣氛是很活躍的，任何一個工人都總是滔滔不絕地議論國家大事。此外，中國的新聞並不是完全自由，新聞發佈很多東西都包含虛構的成份。那麼，北京人有很多都是靠小道來流傳真實的消息。北京工人中，有很多是高幹子弟，很快就取得來自中央和政府中的內部消息，我們工人都經常在工廠內討論政治、經濟、民主等問題。可以這樣說，北京工人一般都對政治事情很敏感的。

問：工場內有沒有一些小組或秘密組織這些討論？

答：據我所知沒有，因為沒有這個必要，我們隨時都可以公開討論這些問題。人民有不滿或者是有關的問題都不能真實地在新聞中反映出來。所以，這一次的運動中，所爭取的第一個自由就是新聞自由。

問：你以為「工人自治會」可以爭取到合法地位嗎？

答：我和我所有的工人朋友都認為「工人自治會」是不可能取得合法地位的。

問：假如不能取得合法地位，你們以後如何把這個民運動繼續

推展下去？

答：我意思是，在短暫時間內，「工人自治會」不可能取得合法地位。至於通過怎樣方法推展這個民主運動，這裏恕難奉告。我只能說我們希望在全國各地都能成立「工人自治會」的組織。

問：你們有否想過在這個民主運動的過程中，聯繫農民力量呢？

答：毛澤東曾經說過：「學生是先鋒，工人是主力軍，農民是同盟軍」，我們認為他的論調在今天來說仍然是正確的。

【選編自《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二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年11月】

記北京工自聯義士

呂京花

六四事件已過去幾個月了，那令人難忘的往事，常常牽扯着我的心。一想到那天安門廣場上的戰友，有的倒在坦克、機關槍下面，長眠於長安街街頭；有的正遭到中共獨裁者逮捕受盡酷刑折磨；或是遭到追捕到處逃亡，心中的悲痛是無法言語表達的；然而，不能容忍的是中共政府顛倒黑白，編造種種謊言欺騙愚弄中國人民和世界輿論，袁木竟面對着全世界制造出一次又一次所謂「真相」；我作為一個參與民運的倖存者，我的良知讓我把親身經歷和幾個朋友的事情告訴世人，因為人民才是真正的真相見證者。

韓東方是「北京工人自治會」常委，當我第一眼見到他時，印象就很深刻，他那裏堅毅的神色和作為年輕指揮的老成，令我驚嘆。由於他廢寢忘餐地工作，鼓舞着大家的勇氣，大家有事願意同他商量，自覺地按照他分配的任務，去努力完成。

記得5月28日舉行行大遊行，「工自聯」的隊伍聲勢壯觀，隊伍走向人羣時，時常獲得長時間的掌聲。這時播音機傳來韓東方粗壯宏亮的聲音：「中國建國四十年來，長期被封建專制桎梏。中國人的權力和做人的尊嚴，被他們無情剝奪了。」

他們認為一切權利和尊嚴都是帝王們的獨家財產，而人民只有乞求的份，絕無爭取的份。所有這些形成中國人長期沉默，逆來順受的病態心理。而今天在學生運動的啓蒙下，我們要成立一個真正由工人組織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如果你們面對一個不能代表廣大工人利益的工會，請你們站出來！中國人自古有不怕死的氣概；中國的工人，應該勇敢地站在爭取民主，爭取民權的最前列，支持和參加我們這個工人組織，我們願為工人說話，為工人的權益服務！」這聲音激起了羣衆的陣陣掌聲歡呼。

當廣播車來到工廠的大門口時，熱情的工人送來慰問品和那發自肺腑的知心話，此情此景令人難以忘懷！我們受到極大鼓勵，遊行的隊伍返回總部時，大家已精疲力盡；但仍然情緒高漲，激動地交談。認為「工自聯」必須馬上成立。

這天晚上「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委會」正式成立，經過民主協商選出了五名「工自聯」籌委委員。同時經過討論，通過了一份《工自聯臨時綱領》。韓東方在會上總結時，強調籌委會當前的任務是建立內部組織，深入到工廠開展宣傳，號召更多的工人參加這次偉大的民主運動。

5月29日各部門的會員都投入緊張的工作。傍晚時一名糾察隊員報告：一名不知身份的人員，命令我們立即撤離此地，聲稱此地（天安門城樓西邊）是國家重要基地；如果不執行，後果自己負。韓東方跑到大門口，交涉一番後，立即召集大家開會。會議內容短簡精悍，他把現在的處境分析給大家聽；當時氣氛十分緊張，周圍的燈光昏昏暗暗，好像預示着白色恐怖的降臨。大家分手時韓東方臉上表情十分嚴峻。就在那天的夜裏，常委沈銀漢在返回家的路上，被不明身份的幾個人強行架走。幸好機智的沈銀漢把一個記錄「工自聯」會議的筆記本，扔到汽車底下。當汽車開走後，過路的行人，發現地上的本子才得知是「工自聯」的會員，後通知我們總部。

韓東方：

「現在是戒嚴期間，我們來這裏需要承擔沖擊公安局的責任。但被抓的是北京工人自治會的會員，應該由工人代表去談判，爲了不讓公安局抓我們的人，現在我們進去同他們談。請大家在外面的，想一想什麼是顧全大局。」



公安局門前的韓東方。

到了第二天30日，陸續又來了兩名會員的家屬，講述他們的家人參加「工自聯」組織，被警方帶走的經過。消息一傳開，大家的情緒都十分激動、氣憤，所有的會員非常緊張。爲了穩住大家的情緒，韓東方同在場的常委商量後，便召集部份隊員到市公安局進行交涉。隊伍未到大門口時，已經有許多學生、市民得知消息後，自發來到這裏。學生們舉着各院校的大旗，其中一幅標語寫着「秘密抓人」四個字，有的學生在問圍觀的羣衆講述抓人的事情，在這種羣情激憤的氣氛下，韓東方把手有力地揮揮，大聲地告訴大家：「現在是戒嚴期間，我們來到這裏需要承擔『沖擊公安局』的責任。但被抓的是『北京工人自治會』的會員，應該由工人代表去談判，爲了不讓公安局抓我們的人，現在我們進去同他們談。請大家在外面的人，想一想什麼是顧全大局。」這時公安局廣播不斷傳出：「現在是戒嚴期間，同學不要受少數人煽動，不要上當，應該馬上離開，因聚在公安局門前，是違法行爲。」接着從公安局跑出來三十多名警察，把聚集的人羣，推出十多米遠。警方拿着攝影機，把在場的人員全部錄影下來，以此恐嚇在場的羣衆。一個工人勇敢地站出來帶頭喊「放人」「放人」，隨後又帶頭高唱「幾度風雨、幾度春秋，風霜雪雨搏激流，歷經苦難，此心不改……」

這時韓東方已來到市公安局信訪辦公室，一名公安幹部出面談判，「工自聯」一名法律顧問提出三點要求：第一、公安局應當証實沈銀漢是否被抓；第二、如果被拘留或逮捕是否合乎法律程序；第三、如果被拘留應當向家屬和「工自聯」講明拘捕的原因。市公安局幹部當回答了三點：第一、「工人自治會」是非法組織，其組織違反戒嚴令；第二、他們是負責接待，不了解具體情況；第三、工人來到公安局門口，違反戒嚴令。我們法律顧問回答道：該組織的合法與否跟此次交涉無關，接待處雖然不了解情況，但是否有職責調查以上情況，並

予以回答？那名公安幹部回答道：法律顧問無權代表「工人自治會」提出要求。他們願意直接與工人代表交涉。我們的法律顧問暫時退出，後來韓東方與公安局的交涉也未能繼續下去。

這時已近傍晚，韓東方帶領隊伍返回指揮部。疲累一天的韓東方坐在地上，背靠着天安門城樓的紅牆，眼睛望着天空，一言不發。我焦慮地走上前，想去問後來的結果；他察覺我的意思時，突然低下頭，用力地擺了擺頭，嘴角露露出一絲淡淡的苦笑便答道：「你猜他們跟我說什麼？小伙子，你太年輕了，好景還長着呢！」「這是什麼意思？」我脫口而出追問。他接着答道：「我當時說：『你們大概也該清醒了吧，你講話已經是語無倫次了。』」好啊！短短兩句話就把他們的威風掉回去了，也壓倒那些官僚的盛氣凌人，不可一世的臭氣。

韓東方不僅僅是他的果斷，他的自信和能力都令我深有感觸。突出的是在民運中，他忘我的獻身精神。經過工人們堅持不懈的努力，和廣大市民學生的聲援，市公安局不得不在四十八小時後無條件釋放沈銀漢和其他兩名成員。

在發生秘密抓人事件以後，我們幾名隊員都是提心吊膽，恐怕再被抓。在高壓恐怖和白色恐怖下，「工自聯」成員唯有一顆撲不滅的心在燃燒着。爲把民主運動的發展深入化，我們決定轉入地下；準備組成全國大聯合，派出代表到外省聯絡更多的工人建立組織。作出決定之後，當晚部份人分頭離京南下、北上。到了第二天，一位青年婦女來到天安門廣場總部（當時我們已搬遷廣場內），大概也聽說我們有人被捕的消息；哭泣地詢問她丈夫的消息，因爲她丈夫三天沒有回家了。看見她難過的樣子，我真不忍心，只好把真實的情況告訴她。這位工人在臨行前托我把他的自行車鎖匙，轉交給家裏人。他原本是工廠的電工，在民運期間吃苦耐勞；我們的廣播器材，備有一台發電機，是需要人工操作的，每隔一小時就要加油，用人工帶動後才發電，機油噴到他身上，他也顧不得擦洗，總

是默默地工作。在離京時身上還穿着那件佈滿油膩的汗衫。類似的情況很多，因為也許在你回家換洗衣服時，會遭到逮捕，索性不回家，髒點反倒心裏安寧些。

還有一位糾察隊員，從我見他時直到六四，身上總是那件灰白格襯衫，油膩的領子黑得發亮，上身被汗液染成花色。不是他們不在意個人衛生，而是因為當時組織上要求嚴謹。糾察隊員的任務更繁重，隨時保護着各部人員。6月3日下午，這名隊員的弟弟來到總部，抱住他哥哥的胳膊，欲哭無淚勸他的哥哥：「你知道嗎？他們有多厲害，連我都跟踪，嚇得我都不敢回家，咱們快跑吧！」這個隊員從後面發現我過來時，很歡快地跟我說：「我弟弟太激動了！」

就是這位隊員，當市民紛紛跑來報告各地死傷人數時，他早已按不住地大喊着要與殺手們拚個死戰。這時槍聲已在廣場附近發出，形勢十分緊張、嚴峻。他立即召集大家把汽油灌進汽水瓶裏，但我們並沒有多少汽油；當廣播發出我們急需汽油的消息時，一個市民馬上開來一輛大型公共汽車，打開油箱倒盡所有的汽油。

當時間近晚上1點50分，天安門廣場東西兩側同時來兩部裝甲車，車內是全副武裝的軍人。我們的隊員的拿着自製的燃燒瓶，飛快地朝裝甲車開來的方向跑去，有的砸開桌子上的木腿，有的人折下馬路上的鐵棒；人們抓起他們所能自衛的東西，隨着人流一次又一次沖上去，機關槍一陣一陣向人羣瘋狂地掃射。子彈擦過我的頭頂，「颼颼」的聲音在身旁，羣眾那嘶啞的呼喊聲，亂成一團，跑在前面的隊員，有的已中彈。跟在人羣中的市民有的開始往後退。當有人發現人羣中有女的時，大聲喊道「你們女的往後撤。」這時我被拉了下來。可是子彈並不能嚇住憤怒的市民，男的、女的，仍然拼命地朝前衝，廣場上一片憤怒的吶喊聲。這時，離「工自聯」廣場指揮部的地方，又傳來急速的槍聲，十多輛坦克車，裝甲車並排開

來。車上發射子彈時火光一閃一閃，火藥味沖天；眼看着有人倒下……。這時，我同兩名隊員撤到了北京飯店附近，遇上我們「工自聯」一對夫婦。她告訴我×××死了，×××中彈了，其中剛才安慰他弟弟那個隊員已經死了。來到飯店門口，真是人山人海有的市民們哭着，咒罵着當權者的殘忍，有一位市民認出我時，抓住我的手喊着：「這就是『工自聯』的人。他們有很多人都死了！我們拚命地幹活爲什麼啊？明天罷工！罷工！」人羣中發出「罷工」的吼聲。

剛提到那對夫婦，他們住北京郊區，自己開一個塑料加工廠，我6月8日到他們家時，展現我面前的是一幅油印的場面。幾天來，我過度緊張恐懼的心情一下子消失了。據了解，他們自費買了一台油印機、紙張，把天安門的真相，複印成傳單，到市區街頭散發。我擔心地勸阻他們安全要緊。他說：「我們不怕，就是要把天安門真相告訴給人們。死的人不能白死，再說『工自聯』還沒有死光。」見到他們如此堅定，我當時的心情，難以表達，淚水不禁淌了下來。多麼尊敬，又多麼可愛的人們呵！由於我們的天真、善良，盲目地低估了現政權的殘暴；還報以「人民既然不擁護，我會退下台」的夢想！真像毛澤東當年斷言「你不打，他不倒，自行不會退出歷史的舞台」的再次驗證。離開此地，我的心總掛着，一直不能安靜。直到6月下旬，從官方報導中得知，他們被捕的消息，官方稱破獲了一個地下印刷點和五名工作人員。

那些爲民主獻身的戰友們！和那些正遭受中共慘無人道酷刑的戰友們！你們的熱血灑在長安街上；儘管現政權靠暴力和謊言，能維持一時，但不能抹去人民心頭的血迹。你們的業績，就像夏日雷電一樣，轟鳴全世界，它的光芒永遠載入史冊。

革命工人韓東方

麥燕庭、黎佩兒

「現在戒嚴期間，我們到這來，需要承擔「衝擊公安局」的責任，但被抓的是「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的常委，若叫學生去談判，是沒有道理。」（鼓掌聲）

他輕輕揚手止息羣衆洶湧的憤怒，再以十分冷靜有力，緩疾有致的語調說：「但我們要顧全大局，請你們相信我的頭腦，無論我出來作出的決定是怎樣地出人意表，都請你們相信我的大腦……請你們在我進去之後，想一下什麼是「顧全大局」。」

韓東方三言兩語便把學生在交涉中的代表性，被公安局蒙騙的問題全點出來，他與另外兩名工人終於獲准入公安局交涉「工自聯」三名核心份子的下落。

留下百多名工人和數十名學生，楞楞地看着他高瘦的身影——既震懾於他的冷靜理智，又對他誇下的承諾滿腹狐疑。

那天是5月30日下午，烈日當空，大批工人學生打着旗幟，不理戒嚴令，公然聚集在前門東大街的北京市公安局，抗議及向公安局要人。

事緣當天凌晨，「工自聯」的沈銀漢、白東平、錢玉民分別被公安模樣的人，強行架走。

二十多名工人早上九時到來交涉，被公安逐個錄像，氣氛十分緊張，千名學生從廣場趕至聲援，工人代表擔心會予當局「動亂」口實，勸諭同學回廣場，僅留部份學生作聯絡通訊員。

公安局指「工自聯」是個非法組織，只答應與學生談，談了很久，學生帶出來的消息是「當局要二十四小時後，才能回覆有沒有抓人，若有，將在兩天內解釋抓人原因」。在場工人非常不滿，羣情洶湧。

下午3時許，工人代表終於爭取到入內談判，談了一刻鐘，韓東方出來了。

公安局不斷以強力的廣播：「現在是戒嚴期，同學不要受少數人煽動，不要上人當，應馬上離開，因聚在公安局門前，是違法行爲。」

韓沒有用喇叭，他在震耳的廣播句語停頓處，向羣衆交待「當局沒有答覆他們。」

他仍然要求在場的工人「相信他的大腦」，再等一小時，才聽他的最後應對方法。

工人在焦灼中度過一小時，公安局仍無答覆，韓東方要求工人聽他的：遷到天安門廣場東北面的中國公安部靜坐，直至該三名工人獲釋。

工人果然聽他的，全站起來跟他打着旗，秩序井然地離開那剛剛增派千多名武警駐守的公安局。

由一名軍隊「先進」變成被官方鎮壓的反革命組織的負責人，韓東方的心路歷程足以證明「革命往往從靈魂深處爆發」的名言。

甫跟個子高高、面孔長長、五官稜角突出的韓東方打個照面，便覺得他是一個硬朗和倔強的人，再加上那股淡淡的、溫文爾雅的書生氣質，記者很快便在一羣幹完宣傳工作回來的工人中，注意起他的舉動來，再經人介紹，才知他便是筆者要找



韓東方：
「中國人自古有不怕死的氣概；
中國工人，
應該勇敢地站在爭取民主，
爭取民權的最前列。」



的人，當時他是籌組中的「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的負責人。

現年廿六歲的韓東方於北京出生，但還未得到首都氣息薰陶，便於三歲回到窮困的山西省黎城縣老家，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爆發，在這五年，他過着艱苦的生活，但他認為，「這是得天獨厚的好事，我學懂了獨立思考，對外界的反應，防禦都加強了。」

帶着這些特點，他走進了軍隊，過着刻苦的紀律生活，使他倔強、硬朗、吃得苦的性格逐漸形成，並在部隊獲得「先進個人」的榮譽，他笑說：「我紅得很哩！」他復員後轉當了三年武警，於84年轉往鐵路局工作。

但悼念胡耀邦活動卻改變了他平凡的生活。韓東方憶述道，在4月17日經過天安門廣場時，他看見紀念碑下圍着很多人，於是便下車看個究竟，聽見不少人在發表有關時弊和民主自由的演講。他說：「我受到感染，很激動，於是也發表演講，大家都很激動，開始感覺到民心所向。」自此以後，他便不時到廣場吶喊和演講。

他和上街募捐的同學談起來，更加深了他對民主自由的渴求和對學運的認識。學生開始在廣場絕食後，韓東方每天下班便跑往廣場東側的歷史博物館前留意學生的情況，間中也找學生領袖談理想。

然而，學生為保持學運的純粹性，刻意排拒外界的加入。韓說：「學生對我的意見有興趣，但對我的職業沒興趣。」

韓東方每晚去看望學生，和常在那裏的十多名工人混熟了，他們逐漸感覺學生「承受不住，犧牲太大，需要工人及市民接力。」於是在一些學生協助下，在五月下旬籌組「工自聯」。

在他構思中，「工自聯」並非什麼福利機構，而是一個具監察功能的論政團體，由不同行業的工人選出代表，再由代表選出常委；但考慮到工人會因壓力大而不敢參加，以致一個行

業內沒有足夠人數參加，故也可按區選派代表。他樂觀的認為，無論是大廠或小廠，只要約十人參加他們的組織，工廠便不敢怎樣。

但他想法根本無法驗證，因為號稱實行工人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最怕的便是工人。「工自聯」5月30日晚上正式成立，當天凌晨官方便來抓人，使「工自聯」還未正常運作，便遭取締，而學生工人大聯盟的計劃亦告吹。

韓東方沒有懷疑自己籌組「工自聯」的能力。他輕鬆地說：「還可以。雖然我只是高中畢業，沒上大學，但平常也自修心理學、社會科學。而且我頭腦特別清醒，邏輯思維較強。」

韓東方沒有上大學，他說：「鄧小平上台後曾標榜文憑至上，但我不同意，所以抵制。」他頓了一頓又說：「不過，現在倒有點後悔，所以唯有靠自修了。」

那他是否作了一次「錯誤」決定？他將來又會否為現在的抉擇而後悔，害怕被開除？他毫不猶疑地說：「不怕，人總有辦法活下去的，我只希望有一個真正能為工人講話的工人組織，況且現在退回去，處境可能更壞。」

韓東方笑言，他的妻子也是經過他這番解釋後，才減少憂思，後來更常在公開場合出現，在精神上支持他，使他幹得更心安理得。

韓東方不諱言想當政治家，然而，在他心目中，政治家應能看清楚政治形勢，並能掌握民衆心理；可惜現在的當權者已脫離羣衆，而政府亦過於官僚。

他在血腥鎮壓前預計，若政府鎮壓學運，國民經濟便會崩潰，因工人可能消極怠工，生產必因而長期受損，比罷工更可怕。此外，更會令中國在國際上的威信一落千的，而中國的地位亦因而受影響，令一些人瞧不起中國人。

看來，他真的不幸言中了。

【選編自《人民不會忘記》，香港：香港記者協會，1989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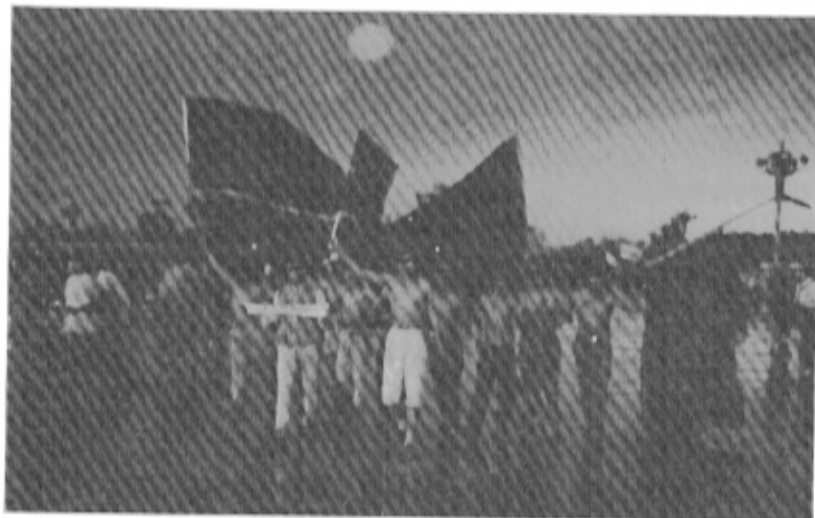
天安門衛士劉強

劉強，二十七歲，印刷工人，北京「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工人自治會）主席，是在天安門廣場支援學生的「工人糾察隊」總指揮。

當北京學生運動進入高潮時，一批工人自發組成了「工人自治會」，並組成「工人糾察隊」維持天安門廣場的秩序。「糾察隊」員三四百人，大多數是北京工人，也有小部份是外省工人。對學生來說，工人的加入是一股強大的力量，不過，「工人自治會」及「工人糾察隊」的組織看來較鬆散。此外，「糾察隊」與廣場上靜坐學生之間的聯絡也很薄弱。

劉強高中畢業後即在海軍服役三年，復員後就讀「北京經濟函授大學」，修讀經濟管理、心理學課程。他說：「『工人自治會』成立及『工人糾察隊』成立，發展到如此階段是以前沒有估計到的。當軍方直升機在天空盤旋時，我真有點膽顫心驚，但既擔當了指揮，便不能後退。」

他強調自己發起成立工人組織並沒有任何野心，不是想搞亂國家，而是在與黨保持基本原則一致的情況下促進國家民主化進程。他說：「這組織跟其他羣衆為學生送茶送水，捐贈、救護等性質是一樣的，即出於人道主義的精神。」



▲劉強所領導的「糾察隊」隊員，如今身在何方呢？

如果熱淚可以洗淨塵埃
如果熱血可以換來自由
讓明天真記今天的怒吼
讓世界看到歷史的傷口

——〈歷史的傷口〉

劉強也承認組織工人的工作很艱難。他說：「政府已對今次運動『定性』，工人有後顧之憂是可以理解的，故只能呼籲工人憑良心參加。『自治會』及『糾察隊』憑工作證申請加入（組織），規模尚難估計，只能每次有行動才組織一次。」

在短短的幾天裏，劉強深深感到個人的能力有限，在後勤、聯絡器材、交通運輸方面都匱乏下，每次聯絡都靠在街上攔截過路車輛解決。他表示「已經四、五天沒睡覺，一天沒有吃飯了」。

「工人自治會」和「工人糾察隊」若要跟「北京高等院校自治聯合會」聯繫，則由學生派人徒步與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學生指揮部之間，在二十萬人聚集廣場情況下，工作十分困難。至於「工人自治會」和「糾察隊」日後的發展，劉強迷惘地說：「現在情況如此緊急，無法考慮這些問題了。」

（編者按：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

【選編自：《亞洲週刊》，1989年】

默默耕耘的劉煥文

張倫

在波瀾壯闊的八九民運中，湧現出了許許多多各行各業的代表人物，他們挺身而出，站在民主鬥爭的前線，為我們的民族奮鬥着，不管將來的歷史如何發展，不管將來他的個人命運如何，他們在那個時刻，那個我們民族光明與黑暗決戰的時刻為我們民族所做的一切，都應被永遠地記起。劉煥文是其中一個。

4月20日夜，我正在天安門廣場主持第一次「首都各界維護憲法聯席會」的會議，×××（「××」的××系×××，我的一個朋友）來了；他說：你等一下，「工自聯」的劉煥文一會就來。這是我第一次認識劉煥文。黑夜裏看不清楚，只是覺得他身材很高，臉上有一疤痕。會上他發了言，當時正有人在紀念碑三層上向我們開會的地方拍照，我趕過去阻止，他講了些什麼我沒有聽清，只模糊地記得，他強調工人組織起來的重要性以及「工自聯」的一些計劃。散會後我們握了握手就散去了。

以後數天，我們天天在一起開「首都各界維護憲法聯席會」的例會。每次會上，他都有發言，我因夜裏幾乎每次都不能睡覺，所以非常困倦，他講了些什麼我都記不清了。成立「保

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後，我任糾察總指揮、糾察部長，他代表「工自聯」經常與我在一起工作，幫我做了許多工作。每天，我們到處檢查，維持秩序，他總是披着一件舊的黃大衣抵禦春夜的寒冷，我們沒有太多的時間說個人的情況，只知道他好像是「首都鋼鐵公司」下屬的一個工廠的工人，詳細情況我已記不清了。逃出大陸後，曾有人問起我他的家屬情況，我非常內疚，當時沒有多打聽一下，現在真不知道他的家人情況如何。

由於他經常出來開會，和參與協助我這方面的糾察工作，「工自聯」之事過問的少了一些。後來「工自聯」改選，他就不再是領導人之一了，「工自聯」的一個常委代表韓東方專程來告訴我這件事。我說，這是「工自聯」的決議，我沒有意見，我還是希望「工自聯」能與我保持聯繫。以後，雖然「工自聯」派了其他人來，但劉煥文還是常來我這裏幫助我工作。

六四後，我躲在外地，從電視上看到他被捕時的情景，後來，在中共拍的宣傳電視片上，又看到一個他被審訊的鏡頭，我不知道他現在的情況，也不知道何時才能再見劉煥文——我們這位天安門的戰友。



▲在「工自聯」的紅旗帶領下，市民前往各路口堵截軍隊進入天安門廣場。

悼念胡耀邦爲何爆發民主運動

——4月21日晚在天安門廣場的演講辭

任曉町

作者簡介：任曉町，「北京建築工程學院」畢業，中國著名民主運動份子。79至83年因參與「民主牆」活動被判監四年，出獄後在「北京設備安裝公司」任職。曾有多篇民主運動理論著作在海外報刊發表，傳媒對他的介紹亦甚多。因爲參與八九民運現已再次作階下囚。

4月18日開始，中國首都北京再一次爆發了聲勢浩大的人民民主抗議示威運動，參加的人員之多不亞於1976年的四五運動。

本來，一個中共的前總書記的去世並不值得這樣過份地加以哀悼，正如十三年前的四五革命，人民羣衆借悼念周恩來之機爆發的反專制反封建社會主義的人民運動一樣，也正如1979年民主牆運動期間，胡耀邦個人兩次告誡「不要隨便抓人」而最終民主牆主要首領全部逮捕歸案那樣，這次運動人們的情感抒發，思考注意力和意志表達的方向也主要傾注在中國社會政治體制弊端的整體結構上。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

歷史不會有過單純的悼念

歷史上不會有過單純的悼念活動，任何力量也不可能規定悼念活動的延伸與擴展。

開放、改革這個共產黨從十年前民主牆接過的人民口號盡管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一定的好處和自由；但是，四十年來，一元化的中國社會的政治結構使人民對共產黨一黨集權的種種害處有着切膚之痛。

因此，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前必然地也令人吃驚地出現了「推翻專制」和「打倒獨裁」的巨幅標語和口號，新華社4月20日的評論也不諱言人們呼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民主萬歲」、「人權萬歲」、「自由萬歲」的聲浪一陣高過一陣，匯成了這場抗議運動的主旋律，國際歌聲此起彼伏，在這裏，完全變換爲另一種意義和效果。

任何一個客觀公正的目擊者和觀察家絕不會將發生的這一切認爲是少數別有用心者的煽動、破壞和搗亂，而這種爲維護特權的不負責任的指控恰恰是一種中傷和誣蔑。人民不會答應。

四年前，工人被誣蔑爲挑起八六學潮，一些工人被判處徒刑，這是又一批冤假錯案。

爲了戳穿謊言，爲了回擊中傷，我要求中共司法當局將這次運動出現的最主要的「推翻專制」、「打倒獨裁」、「打倒共產黨」的三大標語口號的調查結果公佈於衆，並使人們了解，這究竟是工人所爲還是學生所作？

不論是學生所爲還是工人所作，執政黨如果繼續錯誤評價和對待這場人民運動，企圖規定悼念活動，那末，執政當局從歷史上消失的日子不會太久了。工人會覺醒的，學生會同工人挽起手來。

中國之政治向人們展現的是一幅黨權一體、黨政一體、黨法一體、黨國一體、黨軍一體、黨民一體、黨經一體、黨文一

體的八位一體的巨幅漫畫。

憲法只規定公民權利的狹小範圍，而不得越雷池一步，公權壓迫私權，法律對公民權利的規定具有顯著的管束性、限制性和壓迫性，而不是保護性、開放性和鼓勵性。

游行的條例規定及其它將要出台各種條例法規在中國這種人治國家必定是強化管束，強化限制，強化壓迫公民權利的又一道枷鎖。

而中國共產黨違反憲法發動文化革命和無數次的政治思想運動，長期侵犯和剝奪數億公民權利，將數百萬優秀的社會改造黨人、共產黨人及民主黨人迫害至死或長期監禁，對中國人民犯下了難以寬恕的歷史罪過。

中共當局對國內外要求赦免釋放民主牆人士的強烈呼聲無意糾正置若罔聞的事實，再一次向人民呈現的痛苦事實是，在一黨集權的人治國家，法律的制定黨不但可以違背憲法而不受法律約束，反而利用法律殘酷打擊和迫害政治反對派。

中國的動亂是共產黨製造

國內外輿論界呼籲赦免一些政治犯難道就會有礙於國家穩定嗎？

現代中國的每一次動亂，哪一次不是共產黨的內亂製造的，共產黨不亂，中國何以動亂？

我國社會表面的虛假的寬鬆和安定團結是以對全體人民普遍的高壓政策和數百萬優秀人才的鮮血、生命以及喪失自由和健康的高昂代價換取的，中國人民不需要這種虛偽的所謂的寬鬆和諧安定團結，這不是人民希望爭取的政治目標而是一黨和八黨私利。

「錯打孩子論」是強盜的懺悔。

「不嫌母丑論」是強盜的麻醉。

不管憲法將來如何推倒重來，爭取實現現行憲法的各種公



只有幾千萬產業工人
意識到自身民主權利不是靠他人賜予
而是靠自己爭取
並足以掌握國家局勢的時候
中國的生產騰飛和民主事業就接近實現了
——任曉町

民權利是歷次人民運動也是素來人民運動的基本要求之一。

無數共產黨人與民主黨人用頭顱和生命換來的運動憲法絕不允許腐敗營私和壓迫人民的私利集團所玷污。

這就是人權即人民權利的要求。人權的要求與民主的要求互為前提，互為條件。歐洲的文藝復興和社會進步就是從人的權利的解放，人的價值的尊重作為革命開端的。

我們要駁斥和粉碎所謂「打着合法旗號」的無理指控以及宣佈取締合法行為。合法就是合法，非法就是非法，既然是「打着合法旗號」就必需認定為合法。

同時，憲制改造已經提上日程，人民運動在呼籲法學界的覺醒。

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屬於人民，這不過是一句冠冕堂皇和抽象空洞的虛偽條款。

四項基本原則如果不能從憲法上消失，那末四項基原則必將高懸在人權利益之上，「一切權力屬人民」就是十足的騙局。

一元化的八位一體的社會政治結構如果不能從中國地圖上消失而代之以多元社會結構及多元文化結構，開放改革和振興民族只不過是掛在牆上的一塊畫餅或許永遠是一塊畫餅。

改造我國的社會體制是十年前民主牆運動也是現在和將來人民運動的最高理想和綱領。

同學們！一元化帝國結構得不到基本的改造，教育何能救國，科學何以至上呢？

究竟是國家重要、民族重要，還是開放人心性解放人權重要，爭取實現公民權利重要？也就是說，民族的凝聚力是依靠一個政黨的外力捏合還是人權解放每個民族的天然聚合？

五四運動的「救亡圖存」固然是也不過是那個時期的歷史需要。而民主牆運動早已走出了所謂國家和民族的虛幻境界，認清了統治者的國家利益和統治者的民族的利益，順乎歷史的

需要和潮流，代表人民發自肺腑的心聲，高舉起人權和民主的義旗，使民主牆載入史冊。

民主牆的人權與民主同五四時期，同其它時期的相同要求具有非常不同的意義和效果。它是在1949年共產黨執政之後發生。

人權與民主是人民運動的永恆主題。五四運動一百週年紀念的時候，它仍舊是中國人民政治追求的偉大理想和旗幟。

革命的五四運動只能讓位於革命的人民運動，只有人民民主的範疇，而絕不是權力的範疇。

今天，「中華民族」並沒有「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而是中國人民的人民權利、人民民主和社會的改造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八六學潮的學生們因履行公民權利到被指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些工人和市民蒙受不白之冤成為學潮的替罪者。

民主牆人士履行公民權利捍衛人民民主首倡思想解放言論自由，開創了我國政治歷史和文化藝術的新時期，卻被殘酷鎮壓，判刑監禁至今，出獄人員備受壓制和歧視。

改革治理因觸及到一元化八位一體體制和觸及到政黨私利而陷於重重矛盾，進退難容。

貪贓枉法、政治腐敗、黨規不厲、正氣不舉、物價飛漲、盜賊蜂起、民怨沸騰、民不聊生、法無定法、國將不國、改革面臨夭折危機。

民主運動挽救中國危機

然而，中國現代民主運動自五十年代民主黨派企圖嘗試執政以來，歷經作為人民反抗運動的文化革命、四五革命、民主牆運動、八五學潮、八六學潮、八九上書及目前的運動，這一次又一次人民民主的強大示威和抗議驚醒了共產黨執政者，迫使它糾正錯誤，幫助它撥正航程，一次又一次之挽救了國家危

機。

這種看似一時的動亂，對國家、對民族、對執政黨有什麼害處呢？那些單位個人有組織有系統的上書進言，你們什麼時候認真對待過呢？

紀碑前的花園、天安門廣場的人羣、長安街上的遊行、新華門前的靜坐，這是教育執政黨最好的辦法。

如果說，民主運動有什麼罪過的話，那末可以說中國的民主建設不是一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而是通過一系列人民運動革命洗禮而逐步實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基不是由日益腐敗的政治風氣而是經過人民運動一次又一次的艱苦錘煉而奠定的，中華民族的民魂不是由日漸沒落的黨風而是由一次又一次人民運動的英雄風範而塑造的。

人民最激進，也最有智慧；人民最清潔，也最有力量。

人們發現，人民運動爆發的頻率在提高，在知識爆炸的信息時代，具有二、三百年一元化帝國的歷史可能不會重演了，除非再度倒退回封閉世紀。

自由結社是人類改造社會的通行手段。人民民主運動的充分展開和高級形態必將求訴於社團聯合與政黨領導。

幾十年的海峽兩岸人民運動史一再向歷史揭示的真理是，除了共產黨、國民黨、八大民主黨和民進黨之外存在一支永不消失的人民民主力量，目前的任何執政黨及在野黨都不可能代表這支力量。

民主牆運動產生過《中國人權宣言》這樣簡潔的綱領，產生過「人權同盟」這樣鬆散的政治社團，各社團成立過聯席會議，制定過共同慎守的聯合聲明，各社團經常有聯合行動、有救援行動。

八六學潮的缺陷在於民主、人權、自由的空泛口號而無具體的行動綱領和長遠的奮鬥目標，沒有代表人民提出反對通貨膨脹、降低物價、提高工資的要求，因而失去了支持，八六

學潮應該產生自己的理論總結。

我國工人要使工會在政黨的領導下爭得獨立地位，否則就另起爐灶。

在民主牆和八六學潮中慘遭逮捕和監禁的我國工人的歷史教訓是疏於組織和社團弱小，同學們要幫助工人。

只有當幾千萬產業工人意識到自身民主權利不是靠他人賜予而是靠自己爭取並足以掌握國家局勢的時候，中國的生產騰飛和民主事業就接近實現了。

赦免釋放，平反民主牆和八六學潮的人士及案件，這是我們同政府對話的重要條款。

還要爭取提高工資，反對物價膨脹；

爭取基本住房，反對高價售房；

爭取校園民主，反對校園干涉；

爭取辦報自由，取消反革命罪名。

工人兄弟們，合法組織起你們自己的社團吧！學生同工人的聯合萬歲！

【選編者《新報》，香港，1989年5月15日】

八九民運中國工人 為何未能成功發動？

建元

轟烈悲壯八九民運雖被殘酷鎮壓了，但稍有歷史眼光的人都知道，這不過如史劇的一場序幕而已；重要的場面和高潮還在後頭，正義和公理決不是這樣簡單就能消失。現在需要的是認真的反思和總結，清醒地認識過去和面對未來。

許多八九民運人士和關注中國政治評論家都認為，這次民主運動的失敗與中國工人的未能成功發動直接有關。工人掌握着國家主要經濟命脈的運轉，從歷史及各國民主改革的成功經驗看有道理的。那麼89民運中國工人為何沒能充分參與呢？下面試分析之。

許多海外人們都為北京市民在民主運動中前仆後繼，英勇無畏的精神所感動；看到中國的民心 and 希望。他們的有關報導中，工人在其中的位置是舉足輕重的。

歷史性的突破：中共執政四十年來，工人自發地、公開地、大規模地參與對抗政府的民主運動，這還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不同於文化大革命受控於毛澤東的「最高指示」）。

他們首次打出「工人自治聯合會」、「工人民主自治會」、「團結工會」（註：似河南鄭州工人）等自己的、獨立的旗幟，喊出「打倒貪官污吏，要鏟除腐敗政治」，「嚴懲官倒，穩定物價」等發自自己內心的口號。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武漢、西安等全國二十幾個大、中城市參與示威、遊行、聲援救護學生，抗議當局暴行等行動。在北京參加遊行聲援和阻擋軍車的工人（市民中大部份都是職工）就達數十萬人，自願報名參加「北京工人自治會」的萬餘名工人多是冒着戒嚴後的政治風險，懷着熱血、置生死於度外，並以「通緝鄧、李、楊」等行爲體現了工人階級的大無畏氣魄。從天安門絕食請願到血腥鎮壓的不到一個月時間內，就形成一個空前的歷史性突破。

介入程度不足：這樣一場以城市爲主要的，關乎國家命運的人民民主運動，雖然也有像「北京焦化廠」那樣的工人傾廠出動的；但作爲國民經濟主要力量，並佔人口大多數的工人的介入程度，總體上還是很不夠的。工人始終未成爲運動的主要力量。工人的介入多以支持、幫助學生開始，即以「配角」的角色出現的。運動過程的口號、目標和行動等也多以學生爲主要，缺乏明確的屬於工人階級的目標和主動性。另外，工人的參與面甚小，據粗略估計發生民主運動的各城市參與的工人（以參加遊行等具體行動爲首）一般佔不到該地的工人總數的15%；而且主要是青年工人，中年以上工人參加甚少。如與波蘭的90%以上的工人參加民主運動比較，就相差太遠了。再加上工人組織程度也很薄弱，包括「北京工人自治會」在內的爲工人組織規模都不太大，組織也較鬆散，缺乏對廣大工人的聯繫和影響；而在鬥爭綱領、策略上都存在較大的盲目性，這跟波蘭團結工會的全國組織網絡及系統的鬥爭方針略策等也是差距甚大的。

先天之不足：中國工人急促參與這場才存在幾十天的民主



▲工人借出的「花車」。

▼公共汽車工人支持民主鬥士的物資——公共汽車。



▲參與管理「人民事」的自行車協會。

▶愛自由是沒有年齡的分別。



運動，從思想、理論、組織、策略等方面都存在許多不足，更缺少同全國及國際勞工界的聯繫。表現了缺乏準備，很不成熟，但這是可以理解的，就像一個先天不足的嬰兒，我們不宜過多地去指責他，而應該研究如何給予彌補和幫助，提供給他適宜的成長條件。

既然這場民主運動牽動全民之心，深得廣大工人的贊同，卻又未能獲全國工人的協助、響應等原因而失敗，其原因何在呢？我覺得有如下幾方面。

一、專制與扼殺：假設這場民運未被殘暴鎮壓或延擱期長一些，我相信工人的發動及整個運動的局面將會大為改觀。可惜的是，四十年的專制直到六四的屠殺，中共決不肯留給工人真正獨立自主參與政治的空間與時間，決不允許除官方工會之外的任何工人組織的存在。從78年北京的園林工人魏京生到81年的廣州的鍋爐工人王希哲，無數工人的民主萌芽都難以倖免被扼殺。專制制度造成工人民主運動長期缺乏生存的土壤和氣候，這應該是此次中國工人無準備地匆匆上陣，又很快地被暴力所擊潰的重要的外部原因。

二、思想和組織上缺乏準備：雖然有78年民主牆和幾年來學潮為前奏；但八九民運主要還是起因於人們對近年政治、經濟腐敗之風的不滿，學生和知識份子都缺乏對歷來民主的經驗總結，和對這個政權的本質性認識及應爭取的戰略方針等問題的系統性思考；更缺乏像波蘭民主運動那樣的組織基礎。故運動過程中知識界自顧不暇，無法更多地給工人以理論和策略上的指導、幫助。處於配角地位的工人的組織者們也沒能提出較成熟的綱領，如：運動要達到怎樣的目的地？如何達到此目的地？「工自聯」在運動中要發展為什麼樣的組織？當前中國環境下要用怎樣的鬥爭策略？對這些基本問題的認識都處於較模糊的狀態。「北京工自聯」雖也提出了一些綱領性文件，可以說都還是頗為粗糙的東西。譬如說，如果組織綱領上「工自聯」是

要建成一個與官方工會相對應，自成體系的全國性獨立工會組織，而非一般性的組合團體；策略上應是首先在北京和全國建立以基層工廠、單位為根基的組織網絡；把一個多月的鬥爭重點，放在向廣大工人的宣傳和組織，而不是把全部力量都放在天安門廣場的話；但到了關鍵時刻，能形成全國性大罷工等廣泛響應的聲勢，那麼後來的局面也許就會有所不同。當然，就一個多月的民運時間裏，要想達到如此的成熟是不可能的。問題在於，如果策略方針得當的話，有可能延緩鎮壓；或鎮壓後形成更大規模的反響，贏得更多發動工人羣衆的時間和機會，以影響整個民主局勢。

三、民主意識的薄弱：民主是人的一種本能要求，經過文化革命和十年改革，中國工人的民主意識總的來說在逐漸增長；但在專制制度的長期壓抑下可以說仍然是很薄弱的。例如現在在職五十歲以下的工人，基本上都是在「黨的教育下」成長；頭腦中長期形成了中共政權的「絕對性權威」觀念，並且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享有真正的「工人當家作主」的機會。「領導說了算」已成為習慣，造成民主意識的麻木性。一個主要因素，乃是專制性的體制下，缺少滋長民主的社會氣氛。諸如波蘭宗教界敢於公開批評政府，工人的對抗思想和行爲可在教堂裏得到庇護等，中國就沒有這個環境條件。新聞的封閉使外部民主潮流等有關信息更難傳播到工人中。在長期之愚民政策壓抑下，工人的文化素質普遍低。對於社會、政治等缺乏客觀上的認識，不容易像學生那樣在客觀聯繫上理解自己的位置和使命；更難於攝取多方面知識信息，形成理論上的思考和政治上的敏銳。也不清楚自己為什麼總生活在這樣一種無奈之中，民主與改善自身的生活有什麼關係，如何去爭取民主等基本問題。由於長期處於低微之社會及經濟地位，令到一般工人缺乏自信，以至容易受「拜金主義」等社會不良思想影響；喪失正確進取方向等。這些都影響他們像學生那樣普遍地

成民主的自覺戰士。

四、生活的鎖鍊：在幾年的經濟改革中一部份工人增加了些收入，但大部份工人則喪失了原有的穩定性保障。隨着物價的不斷上漲甚至威脅到基本生活，許多人不得不在八小時工作之外另謀副業以補助開支。工人除休息之外的大部份時間被束縛在謀生和家庭事務上，對政治的關心和參與自然受影響。當一個政治運動發生時，許多工人首先考慮的是，會否影響我的「飯碗」問題？以及捲入運動後帶來的「清算」對家庭、子女的影響等，令到工人的遲遲才加入民運隊伍，而且相當部份都是沒有家庭負擔的年輕工人。這些都與中國工人承受的沉重生活負擔直接有關。

以上的分析都只能是站在今天的時空點上去反觀和考慮，上述限制八九工人運動成功幾方面因素多是歷史形成的。就是說當時的歷史條件決定了這次工人發動參與民運的命運。我們不能苛求歷史，但可以透過歷史去把握現在和影響未來。

民主的潮流正以不可阻擋之勢澎湃於世界，東歐的改革形勢令人鼓舞和羨慕，而中國卻失去了一次歷史機會。但這一切都是不從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最現實的是，我們現在還能為中國民主事業做些什麼？我認為，每一位願為這個事業承擔職責的人士，都應該把進一步喚醒以工人為主的更廣大民衆的民主覺悟，作為一項重要的戰略任務來看待。新形勢下我們應該着手於：

一、重樹工人民主自治組織旗幟：八九民運中誕生的工人民主自治組織，是代表中國工人新覺醒的旗幟，海內外民主人士都寄於它關切和期望。工人民主運動不應該，也不會因六四屠殺而終止，許多工作也需要有組織地進行。因此重樹起這面旗幟是當務之急。通過這面旗幟鼓勵國內外的信心，爭取各界的支持，團結各方面力量開展長期性的宣傳、組織、救援、聯絡和研究、諮詢等工作。

二、民主的啓蒙工作：在中共的嚴密封鎖下，這是困難也是最需要的工作。包括：通過各種渠道向國內工人傳播世界民主潮流和國內外各種民運信息；開展國內外工人現實狀況和工人民主運動啓蒙資料，設法傳播到國內工人中；應用海外現有多種民主及工運報刊，逐漸增加工運信息，或開闢工運專欄為先導，爭取逐步創辦公開和非公開國內和海外的多種形式的民主工運報刊、通訊報等（波蘭團結工會的各地宣傳刊物達數百種），使之成為國內工人經常性的民主教育工具。

三、促成工人組織的合法、多元化：通過長期的不懈努力，恢復、建立和健全全國網絡性的，獨立於官方工會的工人民主自治組織，及其它文化、技術等性質的職工團體。可從地下和合法化雙軌着手，逐步發展，達到真正實現中國憲法第35條規定的「結社自由」。促成工人組織及政治體制的多元化局面，以保證工人組織在真正的獨立自主性的基礎上，維護工人的政治、經濟等正當權益。

以上三大方面的工作具有近期性和遠期性，假如能得到逐步實現，那麼中國工人的面貌將有一個大的改變。強大的工人民主隊伍即將形成，一場新的中國民主運動則將成功地完成它的歷史使命，——葬送專制制度，迎接中國新生。

民主和自由是不可戰勝的。成功來自失敗的總結和艱苦的準備，海內外的民主志士們，讓我們開始新的準備！

完稿1989年11月底

工運與學運、民運

程真

作者簡介：程真，「北京師範大學」三年級學生。89年5月「天安門廣場學生絕食團」發起人之一。現已逃抵美國。

轟轟烈烈的中國八九民運，初時一直保持着學生運動的純潔性。這個所謂的「純潔性」表現的一個主要方面是：它的組織者、發動者和直接參與者，皆以學生為主體，知識份子和作為社會主體的廣大市民、工人一直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或觀望、或支持、或捐助；直到絕食運動開始以後，他們才投入。

中國現代史以來的歷次學生運動都是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的，何以今次學運一直沒有發動工人、市民參與，而是在學運後期工人、市民自覺加入的呢？

五一三前的觀望與捐助

歷史是無情的，它往往把一些謊謬的邏輯和謊謬的理由強加在人們身上，使人們不得不面對現實、接受事實。1949年中共建國以來的歷次學運，都是以失敗而告終的；而每次失敗的原因幾乎都是因為被「動亂」的帽子而扣死的。所以今次學運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們，雖然明明知道所謂動亂，與學運根

本無關而是中共向來運用的卑鄙手段而已；但為免學運過早夭折，為了學運能取得點滴成效，他們只能單單着手於學生組織的更理性和有秩序、有組織化。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避免一些無組織份子的過激行動，給政府鎮壓提供借口。因此也只能將任何學生以外的人拒於遊行隊伍之外。這是顯然的事與願違的做法。但是以往的教訓是那麼深刻，致使學生們一面渴望着市民、工人的支持，一面又不得不謹小慎微地行事，萬萬不敢去組織和發動工人。好在今次學運一開始便表現了非凡理性與機智，所提出的口號如：「打倒官倒」、「懲除腐敗」、「人民萬歲」、「民主、自由萬歲」、「反對暴力」等也深得人心，所以工人和市民不但能體諒學生的苦衷，而且還自覺地幫助學生維持秩序，積極為學運捐助資金。更絕無趁機鬧事、趁火打劫之事發生，比平常的社會秩序更好了。在「四、二二」、「四、二七」和「五、四」大遊行中，工人、市民雖沒直接投入，但是他們紛紛上街給學生助威，當學生的隊伍受到軍警的阻擋和威脅時，他們也能隨機應變、予以援助。

當然，工人和市民沒有很早積極投入，也有他們自身的特點所形成的原因：工人、市民不像學生那樣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他們的獨立性遠遠不如學生。因為他們大都背負着家庭經濟的沉重負擔，一個人的得失影響着一個家庭的得失，「秋後算賬」對於他們的威脅更大。一些沒有經濟負擔的年輕工人也因為父母兄弟的牽扯而未敢做出頭之鳥。所以，他們樂得出錢出物相助而非直接投入。

5月4日，「北京高校自治聯會」成立。五四以後，學運一度進入低潮期。政府對學生所遞呈的要求對話的請願書置之不理，而罷課和遊行也都不能給政府施加任何壓力。許多學生的熱情漸漸地消磨了，而另一方面，政府卻深知如何瓦解和分化學生領袖，使廣大學生失去對他們的信任。

在這種情況下，儘管有新聞界的人士出來與學生呼應——

他們也成立了「記者自治協會」，並向「全國記協」遞呈了要求「新聞自由」、「新聞要說真話」、「新聞立法」的請願書，同時也要求與政府對話，但畢竟人數太少而顯得勢單力孤。此時在學生中，對應否發動工人參加民運，應否讓工人出來成為該次民運的生力軍發生過爭執。有的人認為：今次學運的主要目的就是推進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深化民主意識，建立民主機制以此反對獨裁所致的腐敗現象。提出的口號也以：「民主」、「人權」、「反腐敗」、「反官倒」等為主。所以深得廣大工人、市民的支持。但是，如果一味地求「純潔性」而把他們置於觀望的位置上，必然會使自己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況且，開放改革以來，儘管西方的先進思想和民主意識漸漸滲透到中國廣大的工人、市民階層中；但是自由、人權和法制的觀念在人們的頭腦中仍然很淡薄。所以，學生應該向工人和市民闡明民主與他們切身的經濟利益的關係，對工人進行思想的宣傳和啓蒙，進而發動他們去爭取民主、自由和人權。這些同學還認為，學生不可對工人、市民的素質估計過低。幾次大遊行中他們的表現已經說明，只要對他們稍加組織，他們會形成比學生更有力的制約力量，因為他們是現今城市的主要生產者，他們在經濟上可以發揮更大制約力。否則，學生所提出的要求和付出的努力必將付諸東流。

另外一部份同學則反對這種做法。他們認為中國將面臨的問題有很多，如教育、人口和經濟、能源問題，這些問題不是一下子就能解決的。如果發動工人、市民罷工、罷市，必然會引起更大的經濟危機；而現存的危機仍然不能解決，所以即使推翻了日益腐敗的中國共產黨的獨裁專政，那麼廢墟之上何以為主？這不能說不是一個更嚴重的現實問題。深重的歷史責任感使他們感到不可輕舉妄動。他們不想中國再度災難深重，他們不想已經非常貧窮的中國人再過幾年或十幾年、幾十年的苦日子。他們要求政府的改良進而一步步地走入民主化的過程

中，這樣，對經濟的損失不會太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會遭到更大的影響。更有一些人認為，一些學生領袖在學運初期就有了很高的威信，建立了深厚的羣衆基礎，且有很強的號召力，讓他們作為運動的主要形象，收到更好的效果。所以，他們也不主張「讓權」給工人。當然有這種想法的人也是基於對工人素質的不信任。而況且當時大多數同學都只求政府加速政體改革無心推翻共產黨的統治，所以後者的觀點自然佔了上風。

「五、四」之後，政府一再拖延對話的時間，且始終不肯正確評價這次學運，學生便無計可施了。「絕食」實屬無奈！學生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只能採用這種方法以死相諫。此時的工人市民也與「五、四」之前的態度不同了。他們雖然沒有改變對學生的正確看法，但是畢竟「民以食為天」，多次的遊行已經使他們感到厭倦，且他們中間大數人都求平安渡日。所以，他們也希望學生在「五、四」之後復課，日後再慢慢與政府磋商現存的各種社會問題。以往對學運的支持的熱情也漸漸減弱了。

捐助、觀望是工人、市民在「五、一三」之前的主要表現。那麼後來他們又是如何加入民運並成立了自己的組織呢？

五一三後同情、聲援與自治

因為「五、四」後學運呈低潮期，工人、市民又不能成為學生的後援力量，所以學生只能死諫政府，發起了空前規模的「絕食請願」運動。筆者是絕食運動的發起人之一，當時絕沒有想過要把學運的規模擴大化，只求民主與自由之堅定信念及愛國愛民的赤膽忠心。沒曾料到，學生們此舉竟大大喚起了廣大市民、工人的同情心。同世界上所有善良與正直的人們一樣，北京的工人與市民們對絕食學生的聲援首先是從人道主義



▲「工自聯」遷入天安門廣場後，象徵八九民運由學生運動開始，邁向全民爭取民主運動。



▲從工人起來聲援學生，到組織「工自聯」，是否大屠殺的催化劑呢？

的立場出發的。他們為此喊出的第一句口號就是「學生絕食、我們心痛！」「救救學生！」等。生命，在中國廣大的受苦受難的人民心目中可能不會顯得很高貴，他們可能像牛馬一樣，忍氣吞聲地活着。然而生命卻是絕不可輕易失去的，它的存在是天經地義的，是極其重要的，儘管活着對他們來說是那麼的不隨己願，是那樣的多災多難。所以，當學生們將自己的生命抵押給這受苦受難的祖國，並乞求以自己的生命換取一個民主、自由、美麗、富強的祖國時，我們廣大的工人、市民們被深深地感動了，也被大大地震撼了。他們此時才似乎真正感覺到了民主與自由的份量——那是比苟活着的生命還可貴的東西。

這種感動和震撼促使他們不能再觀望、猶疑下去，不能再做旁觀者。當政府拒不接受學生的請願條件，反而污蔑這次學運是動亂時，他們便忍無可忍，勇敢地站出來呼籲政府正視現實、尊重國格。這裏要注意的一點是：在運動中，工人、市民的民主意識是漸深、漸強的。他們不再單單要求懲除腐敗現象、打倒官倒等，而是要求一個政治體制完善的政府。他們意識到，體制不完善的話，任何開明的「君主」都是無用的；只有法制才能避免人治所造成的災難。所以，他們喊出的口號也體現很高的水準，如：「我們不要廉正阿斗」、「要民主、不要專制」等。他們也喊出「李鵬下台」的口號。在此同時，他們也思索着如果再上台的是「張鵬」、「王鵬」而不是我們所希望的賢明之君時候如何？這種思索也正表現了他們對民主意識的深層探索。在與他們的談話中可了解到，具有上述想法和思索的人很多，他們大都意識到了他們每個個體和整體的高尚和不可抗拒，也意識到了他們對政府的制衡力量——儘管李鵬、鄧小平並沒有應他們的呼籲和抗議而下台。但是他們已經促使李、鄧在中國人面前大曝光，揭示了腐敗的、無能的政府的嘴臉。這種風氣一旦形成，中國人就不再信「神」，不再信

「救世主」和「大救星」。

但是，由於工人、市民並不是在學生的發動、組織下加入民運的；而是在學生的影響下自覺加入的，具有自發的性質，所以他們最初的參與是零散的、無組織的。那些到天安門廣場將民運的主角和領導權讓給工人、市民。於是，兩者的「無勇氣」和「權力慾」一拍即合，致使「工人自治聯會」的成立大大推遲了，且沒有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

學生、工人聯手陣營

「工自聯」的成立儘管有許多人為的障礙，卻是勢在必行的。

5月19日晚，李鵬發佈了戒嚴令，北京的工人、市民氣憤異常，他們自覺地到各路口和交通要道阻擋軍車；每天晚上都有大批市民湧向廣場以求保護學生。這時，工人迫切需要有自己的組織來指導行動、表達思想，「北京工人自治聯會」便應運而生。這個幾經周折才誕生的組織，一成立就遇到了許多的困難。(一)民運中所誕生的學生領袖們意見不合，已達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特別是個別人的不理智和權力慾，使廣大的參加者和支持者大為失望。加之戒嚴令並沒有實施下來，許多人放鬆了心情。所以，原來在廣場的學生都因過於疲勞並且失去信心而返歸學校，只剩下那些餘興未盡的外地來京的大學生。市民當中，來廣場的人數也大為減少了。(二)共產黨領導層內部鬥爭的形勢也日見分曉，但是一些人仍然表現出隨黨派鬥爭而行的傾向，而招安傾向尤為嚴重。這種時候，如何保持民運的純潔性，而不被共產黨內部派別鬥爭利用，確實是個難以解決的問題。諸如此類的困難，使「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宣傳顯得手忙腳亂和不知所措。

另一方面「工自聯」卻堅持探索與自主，吸引了大批的工人市民，宣傳的格調也很有深度和力度。他們堅持的原則仍然

是和平、非暴力和完善組織；並且對時事和人物的評價、論述也公正、合情合理。他們還組織工人做那些比較實際的工作，廣場指揮部的宣傳因此也不再顯得孤立無援了。此外，「工自聯」的組織裏還吸收了一些學生為主要成員。例如宣傳部長就是最早的「臨時高聯」主席周勇軍——該同學曾因有過決策和指揮上的錯誤，被「高自聯」撤銷其主席職務和常策職務，他也忍辱負重，繼續做更實際、具體的工作。當「工自聯」成立的時候，他便再度成為民運的領導者。學生與工人的合作，使「工自聯」的行動既不過激也不過份妥協，形成了不卑不亢、堅韌不拔的精神面貌。所以，很自然地，他們就變成了政府的眼中釘、肉中刺。況且，政府對工人罷工、罷市的懼怕遠遠勝過學生絕食給政府造成的窘迫。因為他們掌握的政權所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隨時都會因工人的罷工罷市而出現危機。

於是政府就利用工人組織的某些弱點來對「工自聯」施加壓力。後來又有了三個「工自聯」的成員被拘捕一事，理由無非是擾亂社會治安等。面對這種壓力，「工自聯」自覺地與學生取得聯繫，與「北京高校自治聯會」密切配合，隨時取得學生們的支持。三個工人的獲釋不能說不是學生聲援的結果。在五月底形勢危急的情況下，為了保護「工自聯」領袖的安全，兩個在廣場的廣播站的同志經常交換位置；因為那時學生們還幻想着政府不會用武力對付學生而最可能武力鎮壓工人的組織，所以把工人換到廣場中央或許可以使他們暫時安全一些。

工人與學生的配合固然會產生積極的效果，但是那些非組織性的合作也產生過不好的影響：廣場指揮部不單是學生的組織，其中夾雜的人員各種各樣，特別是糾察隊中的許多人都是工人和市民，有的是北京的，有的是來自外省市的。這些人之間沒有很好的合作，指揮部的威信不足以使這些雜亂的人員對它有足夠的信任，致使廣場一度混亂。因為許多工人、市民的行為不夠理智和謹慎。也許，最後的屠殺促使了工人、市民與

學生的最好合作；也只有這最後的瘋狂才能具有如此強大的組織力和號召力。沒有人號召、不用人組織，成千上萬的工人、市民勇敢地走向各個交通路口，手牽手、肩並肩……一羣人倒下了，另外的一羣又走過來；不問你是誰，不論你曾經做過什麼，只要此時站在一起，便互相給予信任和鼓勵的目光，互相聲援學生的人，也都是因為自己對學運的關心。隨着形勢的發展，一些工人和市民便代表他們所在的工作單位前來聲援學生。儘管沒有得到上級的批准，他們還是憑着非凡的勇氣、打着旗幟而來。有了這樣一些帶頭人之後，大批的聲援隊伍便如潮漲般湧向天安門廣場。前來聲援的各工人、市民隊伍之間雖然沒有互相聯繫，但是每個隊伍都是各自有組織、有秩序的。所以，天安門廣場上儘管擠滿了聲援的羣衆和學生，卻絲毫不顯得雜亂無序。然而，工人、市民的聲援隊伍畢竟沒有一個如「高自聯」一樣有威信的最高組織指導他們的活動，所以與學生的配合不是很好，只能在廣場外圍遊行、聲援。當時學生的絕食團因為防備政府所遣的便衣警察和那些居心叵測的幫凶，形成了一道保護絕食學生的防綫；進出人員一律要受到檢查，除學生和記者外，其他人一律不得進入。這樣，學生又一次把積極參與的工人、市民拒之門外，又一次失去了聯合鬥爭的機會。

面對這種情況，學生中的一些人非常焦急，他們看到：形勢發展至今，學運已經轉化為聲勢浩大的全民主運動。在如此巨大的場面中，學生已不該仍然佔據着主角的位置。因為他們已經沒有能力把握整個運動的方向，也沒有能力左右整個民運的局勢。所以，發動工人並幫助他們成立自己的自治組織，將更有利於形勢的發展。學生應該明確自己的作用：作為民主運動的旗幟和象徵，學生可以繼續佔據廣場，但主要任務應該是幫助工人將鬥爭進一步深入下去，用更強大的聯合力量，迫使政府做出讓步。這些學生也曾經做過許多努力，他們到工

廠、企業發動工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學生在這次運動中一開始便有了很好的組織能力、表現了極好的秩序，所以工人大部份認為學生該繼續他們的領導位置（這實際上是中國人劣根性的一個不經意的表現：既無誠意，又無勇氣），而學生領袖當中的一些人，也因為不肯丟掉已得政治資本而不情願給予鬥爭的勇氣。

更令人忘不掉的是，在學生撤離天安門廣場的時候，工人和市民表示了最大的理解和最寬厚的胸懷。他們沒有因為流血而抱怨，流血是為他們寄予過厚望的學生們的安全。筆者是當時撤出的最後一批學生之一。記得我們的隊伍走過「毛主席紀念堂」東側時，夾道的工人、市民對着低頭不忍見人的學生們高喊：「你們不要低頭！你們撤出了仍然是英雄，總有一天你們會再回來的！廣場屬於你們，你們是中國的希望！打倒法西斯！打倒李鵬！……」學生們哭聲一片，它和着槍炮聲在廣場上迴蕩着，預示着黑暗中國的一綫希望之光。

星星之火，勢必燎原

回顧中國五四運動以來的歷史可見，中國的民主運動沒有一次不是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的，卻也沒有一次是成功的。知識份子所倡導的民主與科學的精神通常都轉化為其他形式的鬥爭，而真正的民主意識卻從來都沒有在中國的國民頭腦中確立起來。最有力的例子就是「五、四」運動，運動一開始便演變成轟轟烈烈的民族救亡運動；民主所包涵的人權、自由和法制被演變成狹隘的民族主義以及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對抗。暴力鬥爭使得勝利後中國共產黨只圖政權的鞏固，而以往所口口聲聲稱道的民主、自由和科學的精神卻被拋在一邊。他們不思建立完善的民主政治，卻立即建立了又一個獨裁政府。所以，何為真正的民主，中國的工人市民們是全然不知的。另外，中國共產黨建國以後一再聲稱「農村包圍城市」取

得了革命勝利，使得工人的政治地位反而不如農民。看上去，中國的領導階級並不是工人而是更多數人的農民；加之建國後的各種政治運動，搞得工人階級不再有勇氣來顯示它的力量。所以到如今，工人、市民便成了既無信念、又無信心、更無勇氣的階層。

改革開放以來，雖有一些先進的民主思想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而工人、市民也較多接受新觀念、新思想，但是「心有餘悸」是建國四十年來的政治運動給人們造成的最大心理障礙。所以今次民運中，儘管他們擁護者甚多，加入者卻很少。八九學運後期，工人、市民加入者較前期多一些，那是因為許多企業的領導人本身也贊同的緣故。而那些擁有大量職工的企業如「首鋼」、「燕化」等却來者不多。可以說，這次民運中工人的參與只能算是星星之火，而六四後這些星星之火可能因遭到了腥風血雨的襲擊而奄奄一息了。然而毛澤東曾經用過的「紙老虎」一詞加在叫囂一時、貌似強大的中國共產黨身上是何其恰當！相反，工運的星星之火卻會在狂風暴雨的提煉中成長、壯大起來。在今次的民運中，他們由不自覺、無目的、無組織的支持，到自覺的、有目標、有組織的聲援；由被動地聲援學生到主動的積極的合作；由初時的不知所措到後來的沉穩機智，都表現了工運的成長、成熟過程。最應該注意的是：他們已經很好地掌握了各種和平鬥爭的手段，只要尚有機會，他們便會東山再起。

中國的工人運動因今次的民運而形成了方興未艾之勢。中國的工人、市民頭一次認識到了做為個體的力量和做為團體的力量之強大，民主的觀念已經深入到他們的頭腦中，只待他日東風再起時，工運的星星之火一定會成燎原之勢！

國際勞工組織對中國政府 打擊工自聯的聆訊

「國際自由工聯」的投訴

委員會^註於89年11月例會中審議有關「工自聯」個案，並審閱「國際自由工聯」ICFTU呈交的中期報告書（參考《第268號報告書》第668—701段，已獲244次例會的理事會通過）。

此後，「國際自由工聯」呈交進一步資料，見89年11月24日函件，而中國政府已呈交一份意見書，見90年1月5日函件，並於1月23日交到「國際勞工組織」手中。

中國並沒有實施1948年《自由結社及保障組織權利公約》（第87號），及《組織權利及集體談判公約》（第98號）。在1989年6月，「國際自由工聯」指大批「工自聯」的成員被拘捕，「工自聯」是一個在89年5月間在中國多個省份由勞動人民組織成的獨立工人運動組織。「工自聯」曾經發表的申訴中，最嚴重的有：工人與管理階層在生活水準及工作環境上有嚴重的差距，工場內沒有民主，沒有真正的工人代表，工作環境差及工人生活水準下降。在1989年5月28日，「工自聯」發表該組織的綱領，主要內容包括，該組織有獨立自主權及民主；宗旨是代表及維護工人的利益。「工自聯」正試圖令到該組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下成為合法組織。

根據「國際自由工聯」的消息，很多甚至大部份的「工自聯」成員已在1989年6月3至4日的天安門事件中被軍隊所殺。事實上，在天安門事件之前，已經有屬於該獨立工運組織的成員被捕，一位「工自聯」的領袖白東平，據聞在1989年5月尾被捕，在6月1日被釋放後再在6月20日被拘捕，他現在相信被拘留在四川省。電視上有播出被拘留者被嚴重拷打的片斷。據聞有二十六個工人在長春市因阻礙交通及煽動罷工的控罪被公開審訊。亦有消息指出，在6月21日有三名上海工人被處決，雖然事前三天，人民高院已發出延遲死刑的通令。工人徐國明、卞漢武和嚴雪榮被判放火燒火車及阻止救火行動罪名成立。該火車事前撞向一羣在上海火車站和平示威的羣眾。「國際自由工聯」又報導有三名「工自聯」的領袖被通緝，他們是韓東方，「豐台區鐵路局零件廠」維修組的工人，賀利利，「北京工人大學」的講師，和劉強，「3209工廠」的工人。「國際自由工聯」指出有多名「上海工自聯」的領袖及成員被指控散播謠言，成立非法組織及意圖推翻政府，他們是張期望、張仁孚、王妙根和王虹。沈志高，一個「上海玩具廠」的工人在6月11日被捕，罪名是散播反革命宣傳，另一個工人李治國在6月10日被捕，罪名是意圖推翻政府。

「國際自由工聯」又報告說，在5月26日，親官方的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一度發表聲明，支持學生示威，但後來該組織形容「工自聯」是一個非法組織及要求政府取締「工自聯」。「國際自由工聯」稱李貴仁（陝西出版社的負責人），被拘捕的原因是進行示威罷工，「工自聯」的活躍份子錢玉民在5月29日被捕，「工自聯」的另一領袖沈銀漢亦在5月30日或6月1日被捕。中國官方在答辯「國際自由工聯」的投訴時，指出投訴中國政府違反憲法第87條是沒有根據的，同時亦是一個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中國政府是不能接受的。根據中國政府所說，在1989年春末及夏初發生在北京的事，是政治

激於義憤焚燒火車的徐國明。



如果這是最後的一槍，
我願意接受這莫大的榮光。

——崔健
〈最後一槍〉

上暴亂，由一些反中國的外國組織策劃而成，目的是推翻現政府及建基於憲法的社會主義。

中國政府宣稱：「工自聯」是兩個發動及參與動亂的組織之一。「工自聯」不是一個代表工人的組織，只是一個由少數烏合之眾組成的組織。「工自聯」煽動人民罷工，阻塞道路以阻止軍隊推行軍管，進行破壞、搶劫、放火及謀殺的行動，危害國家及人民的利益。中國政府有義務及責任實行一切必需的行動，以制止暴亂及解散「工自聯」以維持法律及治安，保障人民的生命及財產。根據中國政府所說，任何外國、國際組織及外國人不能干涉這件事。中國政府要解散「工自聯」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工自聯」違反了國家法律及憲法，這與《國際勞工公約》第87條無關。

在1989年11月的會議中，委員會在考慮過該投訴是十分可信及直接關係到工人運動的權利後，發現中國政府沒有直接針對投訴而作出解釋後，委員會決定要求中國政府呈交對該投訴的調查報告及以下詳細資料：

- 1989年6月3至4日，「工自聯」領袖在天安門被殺的情況；
- 上海工人徐國明、卞漢武和嚴雪榮被判死刑及處決的程序及原因；
- 拘捕「工自聯」領袖及成員的理由、原因、檢控程序及現時情況，特別是關於以下的幾名成員，來自北京的白東平、劉強、錢玉民、沈銀漢、來自上海的張期望、陳盛福、王妙根、王虹、沈志高、李治國及來自陝西的李貴仁；
- 通緝韓東方及賀利利的原因及他們現時的情況；
- 中國政府有什麼根據指控「工自聯」有違反憲法及法律的活動；

委員會亦要求投訴人供給任何資料。

新投訴

1989年11月24日在「國際自由工聯」的通訊指出，由傳媒報導有關工人被捕的情況；獨立工會組織指出被捕工人比學生及知識份子受到更多的拷打及虐待。中國政府不斷聲稱沒有處決、殺害及虐待學生及知識份子，這令人相信工人並不享有這種權利。「國際自由工聯」因此覺得這種明顯的不同待遇，證明中國政府有意阻止獨立工人運動及用強硬手段去鎮壓。

「國際自由工聯」特別關注韓東方及劉強的情況，韓東方，二十六歲，受僱於北京鐵路局，他是「工自聯」的領袖，他是鎮壓對象。因為他在6月4日之前成功地令到公安局在5月30日釋放三名工人運動的成員。韓東方是政府首要的通緝犯，他被指控攻擊公安局，根據「國際自由工聯」的消息，韓君在6月初已經被捕。中國政府有關方面否認拘捕了韓君，估計他被軟禁，並有可能與劉強一起被虐待。根據「國際自由工聯」的消息，有證據顯示軍隊用暴力打擊和平及沒有武裝的示威者，做成數百人受傷及死亡。受害者有限度的反抗是一種自衛行為，被控刑事罪行的人都未有得到公平的審判。在沒有公平的審訊之前，他們是不應被定罪的。最後，事實顯示工人被施予特別嚴重的刑罰，這證明刑罰不但是針對公安條例，而是有政治成份及色彩的。特別是有些人被處決，原因不是由於罪案的嚴重性，而是由於他們曾積極參與獨立工會組織。「國際自由工聯」還附錄了一張工人及工運份子被處決及拘捕的名單。

中國政府的答覆

於1990年1月5日，在一項通訊文件中，中國政府重申是項投訴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同時亦嚴重干涉中國內政。中國政府曾宣禁一個並不代表工人利益，及宣稱以暴力去推翻政府的非法組織。政府聲明這與「自由結社」完全無關；故此，中國政府堅決反對這件事情安排在今次理事會會議討論。為了闡明

立場與澄清事實，中國政府呈交以下資料。

中國政府聲稱，成立「工自聯」觸犯政府所定的規例，「工自聯」是非法組織。1989年4月中旬，一小撮人利用學生不滿的情緒，儲心積慮地製造有計劃、有組織的政治動亂，目的是顛覆政府、推翻社會主義制度。5月13日，策劃動亂的人發動絕食，得到三千多名佔據天安門廣場的人士響應。5月16日，一小撮人乘局勢混亂之際，成立「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表明「工自聯」是有組織地介入這場暴亂的。

中國政府表示，成立「工自聯」是違法的，而佔據天安門廣場亦屬非法的。1981年頒佈的《北京市政府第136號通告》第3條訂明，「禁止進行一切損害國家地位、擾亂法紀、危害公安、破壞本市市容的活動。」成立「工自聯」，本身已直接違法通告的規定。爲了制止動亂，維持社會秩序，政府根據憲法第89條第16款，由5月20日起在北京部份地區實施戒嚴令。戒嚴令規定不得舉行示威、請願、罷工以及進行一切擾亂社會秩序的活動。5月26日，「工自聯」舉行記者會，宣佈成立，已是直接違反戒嚴令的規定。1955年，國務院通過《社會團體登記暫行辦法》，所有社會團體均需向政府申請登記。「工自聯」並無向有關的機構申請登記，因此是非法的。上海、廣州、杭州、西安的「工自聯」均無登記，因此亦屬非法。中國政府認爲，自由結社的目的在於改善工作條件、締造和諧氣氛，因此這些組織與自由結社的宗旨有所抵觸。「工自聯」不單沒有遵從這些宗旨，甚至擾亂工廠的工作，影響正常生產，危害社會安寧。

「國際自由工聯」稱長春市設有「工自聯」，而事實却非如此。6月10日，在長春市接受公開審訊的二十六名疑犯當中，大部份都是不願改過自新的勞改所釋放，曾犯謀殺、搶劫、強姦等罪行。其中有人發動罷工、設置路障、堵塞交通，並參加顛覆中國政府的活動，然後喬裝學生。他們所犯的罪嚴重危

害市民的生命安全，破壞社會秩序，並引起公眾憤慨。當中十九人被捕，另外七人被送往勞改所。中國政府認爲，依法懲治罪犯被視爲違反自由結社的精神，實在是謊謬可笑。

「北京工自聯」由白東平、劉強及另外七人組織成立。起初會員只有一百名左右，招收會員人數相當有限，最後只有數百名會員。因此，「國際自由工聯」實是故意誇大會員人數。上海及其他城市的「工自聯」情況亦如是。

「工自聯」似乎在《籌建綱領》中聲明接受憲法及國家法例，但事實證明言行不一。許多場合下，「工自聯」頭頭清楚顯露他們的真正目的。例如5月26日，中外記者出席記者會時，韓東方便表明「工自聯」的計劃和目標，就是推翻政府。

上海「工自聯」計劃發動工人罷工，建立武裝力量、打倒政府、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杭州「工自聯」則兩面討好，外表上提倡革除腐敗、打倒專制、鼓吹社會改革，內裏却宣稱要推翻人民專政、廢除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西安「工自聯」亦在活動綱領中列明以武裝力量推翻政府的意圖。

中國政府聲明憲法的兩項基本原則，是共產黨享有領導地位；此外，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憲法第1章第1節規定，任何團體或個人均不得取代社會主義制度。「工自聯」完全違反上述原則，因此是非法的政治組織。《社會團體登記暫行法規》第4條列明，不得組織反動團體危害國家或人民的利益，如發動組織屬反動性質，其登記應予撤銷，組織本身亦應予取締。因此，中國政府認爲取締「工自聯」是完全合法合理的。

中國政府認爲「工自聯」是策劃北京動亂的其中一個主謀，而且嚴重觸犯了國家刑事法。「工自聯」曾進行下列各項非法活動：

一舉行記者會鼓吹打倒共產黨、推翻政府。5月23日，「工自聯」舉行兩次記者會，出席人士包括中外記者。此外，「工自聯」又發表《致海外同胞書》、《致全國人民書》，煽動人



▼▲不畏強權，上街示威的上海市民。



▲李鵬總理，請問上海市長朱鎔基利用這些老人家，來對付他稱爲暴徒的「工自聯」成員，這是否你所謂的「人道主義」呢？

◀利用公共汽車阻塞交通意圖製造全市大罷工。

民批評政府，並聲言要推翻政府；

- 設立電台廣播反政府宣傳。6月3日暴亂前夕，電台重覆廣播由「工自聯」及「高自聯」聯擬的《絕食宣言》。號召全市人民罷工，對抗戒嚴令。「工自聯」亦有印製大量反政府的宣傳單張；
- 組織示威、製造動亂。「工自聯」曾組織兩次大型的非法示威活動，事先並無申請批准。5月25日，「工自聯」召集超過一百人沿長安街遊行示威、謾罵國家領導人；
- 組織衝擊政府單位及公安機關的活動。5月19日，「工自聯」頭頭帶領糾察員圍攻政府單位。5月30日至6月1日期間，「工自聯」數名頭領被公安局拘留。滋事份子召集數千人包圍政府單位，數次利用石塊和自製汽油彈襲擊政府機關；
- 積極參與設立「首都各界聯合會」，進一步製造動亂，對抗戒嚴令。「工自聯」常委韓東方及其他人士均與這些活動有關；
- 參與動亂的活躍份子。戒嚴令頒佈下，「工自聯」常委劉煥文出席了5月24日圖謀對抗戒嚴令的會議，並被委任為副指揮。6月3日，韓東方把「糾察隊」分為五組，派往主要路口設置路障，阻截戒嚴部隊的車輛。同日晚上，韓東方向「工自聯」講話，號召他們發動動亂前「緊急動員」。劉強把從軍車上偷來的刀分給「糾察隊」隊員，命其部下從廣場兩旁拆下鐵棒，還下令準備汽油彈。「工自聯」的一名要員郭亞雄，組織了「龍的傳人敢死隊」。此外，劉強亦曾參加「學生自治聯合會」的一次秘密會議，帶領糾察隊大搞打、搶、砸搶，放火焚燒十二輛軍車及兩輛坦克；

根據中國政府報導，以上所述均是證明「工自聯」參與北京的暴亂及反政府動亂的鐵證。其他省市的「工自聯」亦有參與搞動亂，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社會秩序及人民利益。

中國政府指出，刑法第90條規定，任何意圖推翻無產階級

專政及顛覆社會主義制度，以致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活動均構成反革命罪，「工自聯」特別違反了下列法例及規定：

- 根據憲法第51條及《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暫行規例》，在動亂期間沒有申請批准而擅自組織遊行示威乃屬違法；
- 根據北京市政府《環境噪音管理臨時措施》第24及26條，以及有關公安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25條，在天安門廣場設立廣播站及用揚聲器廣播乃屬違法；
- 根據北京市政府在1981年通過的《第136號通告》，長期佔據天安門廣場以進行反政府活動乃屬違法；
- 根據刑法第92、95及98款，「工自聯」頭目組織反革命團體，集合群眾發動武裝暴亂以及圖謀顛覆政府，犯下嚴重罪行；
- 根據刑法第100及110條，砸爛、焚燒及破壞軍車、警車及公共汽車乃屬嚴重罪行；
- 根據刑法第102條及有關公安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19條第5款，「工自聯」觸犯了散播種種謠言及煽動羣眾推翻共產黨和政府的罪行；
- 根據憲法第38條及刑法第145條，凡侮辱及誹謗國家及政府領導人的，均觸犯刑法；
- 根據刑法第158條、《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19節，以及北京人民政府於1989年5月20日發出的《第1號通告》，凡包圍及衝擊政府及公安機關的，均觸犯刑法；
- 根據刑法第159條，以及《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20和27條，凡在十字路口阻截交通工具、架設路障，以及妨礙戒嚴部隊的護送工作，均屬違法；
- 根據刑法第137條，「工自聯」狂毆他人，進行破壞、搶掠及放火，嚴重觸犯法律。

由於「工自聯」嚴重觸犯多項法律及規例，所以政府採取行動嚴禁這個政治組織。而據它所說，此舉與集會自由或工會

行使權力無關，中國政府只根據憲法執行法律責任而已。因此，此事純屬中國內政。

在中國政府採取最後一步，對這場騷亂進行鎮壓前，曾嘗試透過對話結束這場動亂，以表表明它是何等抑制及容忍。北京市政府甚至為天安門的學生及羣衆提供了大量急救用品，以及醫療服務。可是，發起這場動亂的人，包括「工自聯」的領袖在內，以為中國政府的抑制是軟弱的表現，於是繼續製造更多麻煩，使整個城市陷入無政府狀態。由於情況嚴重，中國政府不得不在北京部份地區實施戒嚴。對於控制這場動亂，維持社會秩序，以及警告發動風暴的人，此舉無疑十分需要，而且非常正確。可是，這些人却沒有立刻停下來，反而進行了一場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動亂。中國政府再無其他選擇，只好加以鎮壓，以期維持社會穩定，保護十年來的改革及開放成果。

鎮壓動亂之後，公安局拘捕了許多犯罪份子。在處理這些人時，中國政府根據事實及法律進行審判，並依法判罪。中國政府對自動投案，承認自己犯罪的人，均處之以寬，所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中國政府繼續列舉有關這類罪行的例子。

韓東方，二十六歲，「北京鐵路局僱員」，是運動後期「北京工自聯」的頭號領袖。5月18及19日，他在天安門廣場演講，煽動羣衆反對政府，鼓吹他們成立自己選擇的工會。5月26日，他曾以「工自聯」發言人身份，在記者招待會上回答問題。他明確指出「工自聯」的計劃及目標是要推翻政府。5月30日，他煽動羣衆遊行到北京市公安局。5月31日，他召集超過二百名市民堵住公安局的入口，嚴重影響公安局的正常工作時間，引致車輛堵塞超過六小時。在韓東方帶領下，「工自聯」的成員聚集了超過一萬名市民在天安門廣場示威。

在上海，三名男子積極參與6月6日晚至7日凌晨的嚴重

暴亂。他們分別是徐國明，二十五歲，前「上海釀酒廠」工人；卞漢武，二十一歲，失業；以及嚴雪榮，三十二歲，前「上海收音機廠」工人。他們放火焚燒火車廂、警車，以及毆打消防員，藉此制止他們撲滅引致嚴重後果的火災。由於案情嚴重，上海中級人民法院根據刑法第58條第1段及第110條，把這三人判處死刑。其後，這三人向上海高級人民法院上訴，但被駁回，並已於6月21日處決。整個過程依足法律程序，案中事實毫不含糊，而且證據確鑿，判罪公正，處罰洽當。「國際自由工聯」曾聲稱控方沒有提出證據指控被告，實屬惡意誹謗。

中國政府再次保證，除了為數極少的犯罪份子外，當局是會採取容忍政策，不向參與示威、靜坐抗議和絕食的學生及「工自聯」成員展開進一步調查。中國政府還表示會對未有違法的「工自聯」領袖，進行教育，使他們不致違反法例。錢玉民便是其中一例。他是「工自聯」的常務秘書，5月29日因參加非法組織「工自聯」，以進行反政府活動而被拘捕。不過，由於他承認自己的錯誤，所以第二天便獲釋放。自此之後，他再沒有受到騷擾，因為他已離開「工自聯」，又沒有參加動亂。

根據中國政府的資料顯示，「工自聯」並非工會組織，而是密謀參與北京動亂及暴亂的非法政治組織。因此，無論是鎮壓暴亂、是壓制反動的組織（包括「工自聯」在內），或是根據法律懲治極少數的犯罪份子，都屬政府的主權範圍之內，與行使工會權無關。而對於「國際自由工聯」竟根據自己的意見、價值觀，以及種種謠言及錯誤事實，投訴中國政府漠視集會自由，實在是無法忍受。總括而言，中國政府無法接受他人這樣不合理地干預中國內政。

委員會的結論

在審判有關今次案件各論據前，委員會猶記得中國在參加「國際勞工組織」時，答允像其他成員國一樣，尊重〈國際勞

工組織章程》以及《費城宣言》所載列的基本權利，其中包括自由結社在內。

「國際自由工聯」提出的投訴，源於中國政府採取種種手段，對付在中國數個省份成立的「工人自治聯合會」，導致該組織受到禁制，組織一些領袖在軍隊鎮壓時身亡，組織成員被判死刑，以及成員被捕。為證明上述指控，「國際自由工聯」提供一份很長的名單，羅列被捕或被殺者的名字。委員會得悉中國政府已就此事作答。

委員會首先注意到，投訴人及中國政府就「工自聯」性質及目的發表聲明，有極大差異。「國際自由工聯」聲稱，「工自聯」是獨立及民主組織，並曾照憲法規定，力圖使組織合法化；而政府則宣稱，「工自聯」是非法組織，從未申請登記，並且公開聲明以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顛覆政府為目的。根據中國政府的說法，「工自聯」為此而製造動亂，採用暴力，不能算是工會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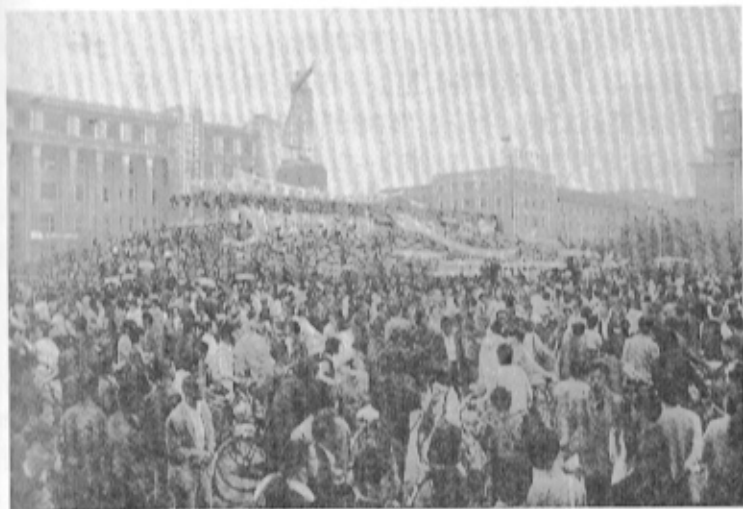
委員會記得，一切由工人或僱主成立，以推動及保障本身權益為目標的組織，均符合「國際勞工組織」為「組織」一詞所下的定義。就這宗個案來說，委員會得悉，根據「國際自由工聯」所言，「北京工自聯」會章主要的宗旨是：該組織應該以自治、獨立及民主為依歸，以依附代表及保障工人權益之原則。此外，按投訴人所述，「工自聯」的不滿之處，有關工作車間缺乏民主，工人沒有真正代表，工作環境惡劣，以及工人生活水準下降。中國政府並不否認這些指責，並且承認「北京工自聯」的籌建綱領的確說明接受國家憲法和法例，但却指出這與事實不符。委員會認為，「國際自由工聯」所指「工自聯」提出的不滿，正是工人組織在推廣及保障成員權益的責任，按照「國際勞工組織」的準則，「工自聯」可算是工人組織。

至於「工自聯」沒有申請登記一事，委員會認為，這不一定表示工人沒有結社的意圖，尤其是現時中國的法規，不容許



◀ 5月19日重慶市民舉行的示威集會的場面。

▼ 5月20日，成都市民在毛澤東（石像）指揮下，聲討鎮壓學生運動的鄧李揚集團。



在現行的工會架構外，成立其他組織，看來有一個工會壟斷的意思。以1987年《國營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暫行規定》為例，條例只提及「該工會委員會」，看來是否認有許多個工會委員會的存在。委員會必定注意到，在這宗個案裏，政府以「工自聯」未經登記為藉口，宣佈其為非法組織。委員會認為，她在成立工會或使工會有效運作之前，必須事先取得中國政府批准，才會獲得登記之條件，顯然違反了自由結社的原則（見「自由結社委員會」決策及原則摘要，1985第275段）。

此外，委員會對中國政府提供的資料深表關注。資料顯示，中國現行的法例明顯與工人及工會的權利有抵觸。工人的權利包括可自由組織及參加團體；工會則有權處理本身的行政事務、舉辦活動，以及制定行動的程序。委員會要特別指出，中國政府說「工自聯」涉嫌反對憲法中有關共產黨領導地位的條文，以及反對成立社會主義政府，作為實行這些措施的理由。中國政府表示，所有危害國家安全的反動組織，一律禁止活動。中國政府亦指出，一名「北京工自聯」的領導人，被控煽動羣眾反對政府，以及私自組織工會。委員會要指出，國家不應立法管制工會的結合問題，因為這與自由結社的原則背道而馳。委員會亦要指出，工人有自由結社的權利，即表示工人可在全無顧慮的情況下，有效地組織不受現存組織及政黨所影響的團體（見《第197號報告書》，第905號個案，蘇聯，第635段）。在這個案裏，這些基本原則均不受重視。因此，委員會促請中國政府採取必需的措施，以確保工人在法律上及實際上，有自由結社的權利，以及確保工會在法律及實際上，有自由運作的權利。

至於「工自聯」及其領導介入暴力事件的講法，委員會得悉政府所提供的資料。但在其回覆裏提到的暴力事件（焚燒軍車、設路障，以及阻止人們進入共公樓宇），均是「工自聯」被迫非法運作時所發生的。

有鑑於此，委員會認為，要使工會作出有用及切實的貢獻，工會必須在自由及安全的環境下進行活動。這即是說，當工會認為未有所需的自由直接完成任務時，工會有權要求當局承認，工會有這些自由和行使權利；而這些要求應該被視為工會合法活動。

對於「工自聯」領導人及活躍份子被殺、拘留和受到惡劣對待的嚴重控訴，中國政府並未提供詳細的答覆，委員會對此深表關注。

委員會就此提及在1970年「國際勞工會議」通過的提案。提案是有關工會權利，以及這些權利與公民權的關係；指出若沒有公民權、工會權利就沒有意義，所以賦予勞資組織權利前，必要尊重公民權。

有關投訴是1989年6月3至4日晚上，武裝軍警在天安門廣場進行攻擊時，「工自聯」領導人被殺的事件。中國政府未有對指控作出回應，委會因此要求中國政府就此事作出解釋，特別要提供這些「工自聯」領導人死亡的實際經過。

中國政府確認有三名來自上海的工人，因在1989年6月6至7日晚上發生的連串事件中放火燒火車廂、警車、以及阻止消防隊執行職務，被判死刑並已正法。該案共經兩次審訊，即原判法庭與上訴法庭，而刑罰則在事件發生後兩星期已經執行，本委員會對於這極其迅速的判決與刑罰，這種迅速處決意味着被告人未能獲得正常的司法保證，本委員會強烈希望這類簡略訴訟程序不會再被應用。

中國政府又確認有九名來自長春的工人被捕，其中七人已被送勞改營，為了證明這種做法是正確的，政府表示該等人士犯了謀殺、偷竊及強姦罪，本委員會要求中國政府就此等指控所根據的事實，特別是有關的裁決，提供準確資料。

中國政府提到部份工人曾組織罷工、堵塞馬路、參加反政府活動，但未有提供進一步資料。本委員會必須提醒中國政府



四月二十二日西安血案



，罷工乃工人與社會團體促進及保障其經濟與社會權益其中二項應有之重要方法（例子可見《第236號報告》第1066號案（羅馬尼亞）第122段）；而且，本委員會認為逮捕罷工者含有濫用權力的嚴重危機，並嚴重威脅結社自由。主管當局應獲得適當指示以避免該等逮捕事件對結社自由可能造成的危害（例子可見《第217號報告》第1034號案（巴西）第412段）。

至於「工自聯」領袖和活躍份子被捕事件，本委員會注意到被定罪的已送勞改營，另對未有觸犯法律的「工自聯」領袖已實施一項再教育政策。本委員會要求中國政府提供此等工會會員實施勞動教育的原因，其性質與目標。此外，本委員會又注意到中國政府發出的聲明，稱其一直採取寬容的政策，並稱只有極少數罪犯被懲。中國政府提到「北京工自聯」一名領袖韓東方的行爲，但未有指出他是否被判罪。另一方面，中國政府也沒有就一些被指受通緝或被捕的「工自聯」領袖和會員，提供任何資料。本委員會要求中國政府提交此事的觀察報告，以及就「國際自由工聯」最新通訊所附的名單上的其他工人的情況提交資料。本委員會又要求中國政府對某些被拘留人士（尤其是韓東方和劉強）被虐待的指控，提供觀察報告。

委員會建議

基於上述的臨時結論，本委員會促請理事會批准下列建議：

(a) 本委員會對本案的指控之嚴重性，以及中國政府沒有就指控提供有足夠資料的回覆，表示深切的關注；該些指控包括「工自聯」領袖和活躍份子的死亡、被拘押及虐待。

(b) 本委員會重申工人有按自己意願成立組織的權利。意謂真正可以在充份安全的環境下，成立不隸屬現存組織或任何政黨的組織。本委員會對這項原則在本案中未被尊重感到十分悲痛。本委員會對於中國現行的憲法及立法規定，明顯抵觸

了工人有按自己意願成立組織的權利，以及該組織有自由運作的權利的原則一事，深表關注。本委員會敦促政府採取必要的措施以保證該等權利得以在法律和實際上使用。

(c) 本委員會請中國政府注意一項原則：即如果批准工會登記的條件等同向政府機關事前領取批准的話，則這無疑已違反自由結社的原則。

(d) 本委員會再一次要求中國政府就1989年6月3至4日晚天安門廣場鎮壓中據說發生的「工自聯」領袖死亡事件，表明事實真相。

(e) 本委員會對於三名上海工人被判罪並處死一案中極其迅速的訴訟程序，深感悲痛，這件事意味著被告人未能獲得正常的司法保證。本委員會強烈希望該等簡略程序不再被應用。

(f) 至於九名長春工人的判決，本委員會要求政府就謀殺、偷竊和強姦罪（在答覆中提及）的判決所根據的事實，提供詳細資料，尤其要提供有關的裁決。至於被控組織罷工的工人，本委員會重申罷工乃工人與其團體促進及保障其經濟與社會權益其中一項應有的重要方法。

(g) 本委員會要求中國政府就對工會人仕實施再教育措施的原因、其性質和目標，提供資料。

(h) 本委員會再一次要求中國政府就「工自聯」領袖和會員被捕事件提供觀察報告，包括逮捕他們的理由，對他們起訴的任何訴訟的性質和他們現時的情況；並特別對來自北京的白東平、劉強、錢玉民、沈銀漢、韓東方五人，來自上海的張期望、陳盛福、王妙根、王虹、沈志高、李治國等六人，來自陝西的李貴仁被捕事件，以及對賀利利被列入警方通緝名單的理由和這名工人目前下落，提供觀察資料報告。本委員會又要求中國政府就「國際自由工聯」最新通訊所附的名單上的其他工人的情況提供資料。

「國際自由工聯」的被捕者名單

據「國際自由工聯」所稱，工人及獨立工會人士被捕或被處決之名單如下：

北京市

被拘禁：

—嚴富乾，「北京工自聯」成員，1989年6月10日被捕；

—蕭斌，6月10日被捕；被指控作反革命宣傳而在7月13日被判十年徒刑；

—郭亞雄，「北京工自聯」成員，與其他四名不知名「北京工自聯」成員一起被捕；

—張軍，與楊偉在6月11日被捕；

—王福順、李梅湖，與楊恒武被控設置路障，6月10日自首；

—李江，「北京工自聯」成員，6月11日自首；

—劉煥文，「北京工自聯糾察隊」隊長，6月13日在石家莊被捕；

—尤鈿祺，「北京工自聯」成員；

—白東平，「北京工自聯」成員，兩次被捕；

—孟舵，被控殺害一名士兵，6月15日被捕；

—田波敏；

—趙業堂、楊世曾、李偉東，被控謀殺一名公安人員；

—景偉東、孫若中，6月17日被捕；

—路中樞、王連禧，6月10日被捕，被控縱火焚燒軍車、襲擊士兵，各人均可能已被處決；

—劉強，「北京工自聯常委會」成員。

已被處決：

—林昭榮，被控放火焚燒軍車，及偷七件軍服；

—班會杰，被控毆打一名士兵，6月10日被捕；

—張文奎、祖建軍、陳堅、王漢武，6月10日被捕，被控縱火

- 焚燒軍車、公共汽車和救護車；
- 一羅紅軍，可能與上述同一案件；
- 一王維林，被公安局拘捕，被控進行反革命活動。

杭州

- 一高靜棠、朱廣華、李小虎，「杭州工自聯」領袖，6月10日被捕。

上海

被拘禁：

- 一張期望，「上海工自聯」成員，6月8日被捕；
 - 一陳盛福、王妙根、王虹，「上海工自聯」成員，6月9日被捕；
 - 一翁振敏，6月10日被捕；
 - 一孫滿洪、彭家品或(彭家民)、魏燕晨(或魏燕崇)、趙建敏、艾啓龍、遠志明，被控縱火焚燒火車；
 - 一楊孝、謝漢武、孫積洪，可能與上述同一案件；
 - 一黃建華、單宏光，6月9日至10日與其他130人被捕，包括：宋瑞英、朱根寶、常期洋；
 - 一田偉，6月12日被捕；
 - 一周紹武，負責與「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聯絡；
 - 一徐兵力，6月14日或之前被捕，「上海自治權利協會」成員；
 - 一張仁孚、鄭良、董郎軍、江得蔭、鍾泉，「民主工人協會」成員，6月14日被捕；
 - 一蔡超軍、恭辰成、李志波等，「上海工自聯」成員。
- 被處決：
- 一徐國明、卞漢武與嚴雪榮等。

南京

- 一朱惠明、李虎玲，「南京工自聯」成員，與芮通湖，糾察隊隊長，與另外八名「南京工自聯」成員，6月10日或之前被

捕。

天津

- 周恩東(別名周波)，「天津工自聯」成員，6月9日被捕。

廣西

- 一潘海洪(別名潘海濤)，6月15日或之前在南寧被捕。

湖北

- 一胡良兵、楊哥船、陳偉、景濤，與另外十九位不知名人仕於6月7日被捕；
- 一彭景，6月16日在武漢被捕。

江蘇

- 一杜翁、楊勇敏，「救國自治聯會」領袖，6月11日或之前與其組織另外二十七名不知名成員被捕。

遼寧

- 一高雲明，6月9日在瀋陽與另外卅六名人士被捕；
- 一鄭全利、廖志進，6月14日之前在大連被捕；
- 一朱文力，6月12日在瀋陽被捕；
- 一李明賢，6月16日被捕；
- 一蕭斌，被控散播謠言與組織暴動，6月19日或以前被捕。

內蒙

- 一張利山、溫利華、蔡世、包會倫、楊栩東，「內蒙工自聯」成員，6月14日或之前與十位不知名成員被捕。

陝西

- 一劉中舉，與其他四十二位不知名「西安工自聯」成員，於6月11日在西安被捕；
- 一于雲剛、徐濤、呂夏龍、朱琳、唐自彬、王建軍、魏勇彬、李濤、潘孝彬，6月12日或之前被捕；
- 一李貴仁，7月17日因呼籲工人罷工被捕；
- 一岸保靜、包紅堅、常西敏、劉從書、任希英、徐英、趙得敏，「西安工自聯」成員。

山東

- 徐點偉、徐祥路、馬建國、徐建雷，5月30日與6月12日或之前被捕，被控偷竊；
- 劉玉濱、車宏年、張新潮、邵良臣、郝勁光，「濟南各界自治聯合會」成員，6月15日被捕。

四川

- 張有、嚴青中。

長沙

- 何朝輝、李建、柳星期、盧摘星、楊雄、張旭東，與周勇，「長沙工自聯」成員。

註：「國際勞工組織」ILO屬下的「自由結社委員會」。



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
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
但這就需要我們用這些年輕的生命去換取，
這難道是中華民族的自豪嗎？

——〈絕食書〉

國家是我們的國家，
人民是我們的人民，
政府是我們的政府，
我們不喊，誰喊？
我們不幹，誰幹？

——《絕食書》



首都工人宣言

北京工自聯

我們認識到：四月以來的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已經發展成爲與我們工人階級利益休戚相關的全民性的愛國運動。

我們認識到：學生爲整個民族的利益已經竭盡全力，參加絕食學生正面臨着危險。

爲了挽救幾千學生的生命，爲了我們工人階級利益，爲了中華民族的振興，爲此我們正式宣告：

中共中央國務院必須在廿四小時之內無條件接受絕食同學的兩點要求。否則，我們將從5月20日上午12時開始，全市工人總罷工二十四小時，並根據事態的發展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同時我們將向全國工人宣告：北京工人已經組織起來了！

北京市工人自治會籌委會

1989年5月19日

工人宣言

北京工自聯

工人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我們在民主運動中必須要體現中堅力量。

中華人民共和國由工人階級領導，我們有權趕走一切專制者。

工人最懂得在生產中知識和技術的作用，所以我們決不答應人民培養的學生受到摧殘。

摧毀專制和獨裁，推進國家的民主化，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我們的力量來源於團結，成功來源於堅定的信念。

在民主運動中，我們失去的僅是鎖鏈，而得來的將是整個世界。

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備委員會
1989年5月21日

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 籌建綱領

在4月中旬以來，以學生為先導的全民族愛國民主運動中，大多數中國工人已表現出強烈的參政議政的民主意願，同時也認識到現在尚未有一個真正代表廣大工人來表達意願的組織。有鑒於此，我們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為工人講話、辦事的自治組織。為此，我們籌備組織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並提出其籌建綱領。

一、該組織應當由工人自願參加並通過民主程序建立起來的完全獨立的自治組織，不應當受其它的組織的控制，應與其它羣眾組織平等共存。

二、該組織的基本宗旨應當是根據大多數工人階級的意願提出自己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主張，而不應當僅僅是一個福利組織。

三、該組織具有監督中國共產黨的功能。

四、該組織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企業、事業中有權採取一切合法而有效的手段監督其法人代表，保證工人真正做企業的主人，在其它企業、事業中通過與企業主談判或採取其它合法手段保障工人的權益。

五、該組織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保障其會員一切合法權利。

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備委員會

1989年5月21日

【選編自《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一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年6月】

（編者按：本綱領與下頁刊登的章程中，所引用的綱領有出入，由於沒有原文核對，又未能向有關人仕查詢，以解懸疑，謹此致歉。）

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 臨時章程

本會以1989年5月25日發表的《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備委員會）籌建綱領》為本章序言，現載明如下：

「在4月中旬以來學生為先導的全民族愛國民主運動中，大多數中國工人已表現出強烈的參政意願；同時，也認識到現在尚未有一個真正代表廣大工人來表達這種意願的組織。有鑒於此，我們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為工人講話，並組織實現工人參政、議政的自治組織。為此，我們籌備組織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並提出其籌建綱要。

一、該組織應當由工人自願參加並通過民主程序建立起來的完全獨立的自治組織，不應當受其它組織的控制。

二、該組織的基本原則是根據大多數工人的意願，提出自己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要求，而不應當僅僅是一個福利組織。

三、該組織應當具有監督工人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功能。

四、該組織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企事中有權採取一切合法而有效的手段監督其法人代表，保證工人真正做企業的主人；在其企業中通過與企業主談判或其合法手段保障工人的權益。

五、該組織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保障其會員的一切合法權利。

六、該組織應自由願參加的個人會員和建立在各企業的分會集體會員組成。

第一條會員

凡擁護本會宗旨和任務的本市企業、事業單位的在職和離退休職工以及本市企業事業單位的工會或自治工會均可報名參加本會。

職工個人會員和工會或自治工會集體員均有權退出本會。
本會會員依照規定交納會費。

第二條誓詞

本會會員應忠於下列誓詞：

「我自願遵守國家的憲法和法律、遵守本會的紀律，為工人整體利益進行堅持不懈的工作。」

第三條會員大會

第一款 會員大會是本會的最高權利機關，由執行委員會定期召集。

經本會常務委員或五分之一以上會員提議，執行委會應召集臨時會員大會。

第二款 本會章程和修正案經三分之一以上會員同意通過。

第三款 十名會員聯署提議並經會員半數上通過選舉產生執行委員會委員。

第四款 十名會員聯署提議並經會員半數以上通過可罷免執行委員會委員。

第五款 十名會員聯署可提出大會議案，由大會主持人提交大會討論決定。

第四條常務委員會

常務委員會由參力本會的各企業、事業單位的工會或自治工會代表組成，其組織和職權由常務委員會規章具體規定。

第五條執行委員會

第一款 執行委員會

執行委員會大會選舉五至七名會員組成。

第二款 執行委員會推選一名主席和兩名副主席。執行委員會主席主持和召集執行委員會會議，副主席協助主席工作，在主席不在位時代行主席的職位。

第三款 執行委員會執行會員大會和常務委員會的決議，開展本會日常工作。執行委員會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出執行委員會決定。

第四款 執行委員會根據需要可設立若干辦公機構。

1989年5月28日

【選編自《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二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年11月】

告全市人民書

北京工自聯

當前全國人民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由於獨裁官僚的長期統治，造成物價飛漲，人民生活水平直線下降，統治者因為要維護他們少數人的揮霍，大量地發行各種債券，如國庫券、金融券，把人民僅有的收入據為己有，我們呼籲全市各階層人民團結起來，為真理、為國家民族的前途而鬥爭。

警察士兵兄弟們，請你們站到人民的一邊來，站到真理的這一邊，不要充當人民敵人的工具。你們也是受剝削受壓迫的。在「四五運動」及「四·二〇血案」中鎮壓人民的劊子手，這筆賬人民永遠也不會忘記的。

我們鄭重提出：增加工資、穩定物價、國家官員及子女收入支出要公開，我們全市工人階級和各階層人民支持全國大學生的正義鬥爭。

北京工人聯合會

1989年4月20日

【選編自《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一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年6月】

十問書

北京工自聯

請黨中央就以下幾個問題作出回答：

- 一、請問鄧樸方在香港跑馬場下的賭注有多少？這些錢是從哪裏來的？
- 二、趙紫陽夫婦每週打高爾夫球，交費了嗎？支出又從哪裏來的？
- 三、請問黨中央對前一段時間的改革有何評價？李鵬總理在今年春節團拜會上承認當前的改革過程中有失誤。請問失誤在哪？實際情況又如何回答？
- 四、中央曾經提出制訂措施，控制通貨膨脹、控制物價、而實際情況卻是，物價還在不斷上漲，人民生活水平直線下降。請問，這又如何回答？
- 五、從明年開始，將要償還外債。請問，對全國人民來說，每人要負擔多少？人民生活的基本水準是否受到影響？請回答。
- 六、請問，鄧小平曾經提出，要把知識份子的地位從老九變到老大。請問，老大的位置是什麼？是地主還是地主的父親？請回答。
- 七、請問，黨中央領導人在全國各地的住房、別墅有多少？他

們經濟消費與支出有多少？是否可以公開？請回答。

八、公開黨中央領導人的私人收入及他們的支出情況。

九、對於台灣當局有關和談的三項先決條件，中央對此將如何回答？

十、請黨中央就以下三個詞匯的概念及涵義作出正確的解釋，請回答：1.「政黨」；2.「革命」；3.「反動」。

以上十個問題，謹請黨中央儘快在報紙上作出書面回答。

北京市工人聯合會

1989年4月20日

告全國同胞書

北京工自聯

貪官的橫行到了極點！官吏的殘暴到了極點！大陸之大，已經沒有真理的一席之地了！任何反動勢力也阻礙不了全國人民憤怒的洪流，人民不再會相信當局騙人的鬼話，因為我們的旗幟上寫着：科學、民主、自由、人權、法制！

我們北京市工人聯合會爲了維護工人的利益，於1989年4月2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並於同日發出二份文件《告全市人民書》、《十問書》；「四·二六」社論卻污蔑它爲反動的。那麼請問你們：既然不敢在報紙上公開回答我們的十個問題，那麼就把我們的這兩份文件全部刊登在你們的報紙紙上；難道你們連這點膽子也沒有嗎？你們不是喊了四十年的「相信廣大羣衆」的口號嗎？我們嚴正要求徹底否定「四·二六」社論，嚴懲文章的炮制者及其後台！

我們認真核實了對工人的剝削帳。剝削方法是按馬克思的《資本論》告訴我們的分析法。我們將全部產值扣掉工人的工資、福利、醫療及必要的社會積累、設備折舊和擴大再生產等費用外，我們吃驚地發現：「人民公僕」們侵吞了人民盡血汗創造的全部剩餘價值！剝削的數值是空前的！殘酷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民的「公僕」用人民的血汗在全國到處營

造豪華的別墅（用軍隊看守，名曰：軍事禁地！）、豪華洋車，出國遊樂（名曰：視察訪問，包括他們的子女，甚至保姆！男性官員姘美女，女性官員養「面首」……）它們的醜事及罪惡，罄竹難書！

方勵之同志從國家、民族的利益出發，關於「如何引進外資」的意見是正確的。我們支持和擁護，因為，這些「外資」會像過去歷年一樣「合法地」轉變為「官倒」的個人的財富，受害的是國家，得利益的是「一小撮」，還債的是廣大人民。

我們反對繼續強購國庫券的侵犯人權的野蠻行動。我們要求向人民公佈幾年來發的國庫券收入、支出情況（包括用途），將現存於人民手中的國庫券立即全部總付本息，同時關閉國庫券市場——這是官商的一大市場，是「官倒」們的一大財源！我們重申：增加工資、穩定物價上漲，應該是結束老少二代人（甚至三代人）拿相似水平工資的狀況了；我們要求對中共中央委員以上、中央顧問委員以上、國務院各部委官員、中央軍委委員以上首腦進行調查。

第一批被調查經濟消費、別墅佔有情況的人員是鄧小平、趙紫陽、李鵬、陳雲、李先念、楊尚昆、彭真、萬里、江澤民、葉選平及他們的家屬，立即查封他們的全部財產，由經過普選出來的「全國人民調查團」執行調查，及時向人民公佈調查報告。

大學生們成熟了！在天安門前幾百萬人維持了良好的革命秩序就是明證！人民覺醒了！他們認識到了在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歷史階段，只有兩個階級，即：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順乎歷史潮流的階級、政黨、社團及個人，就是進步的、革命的；反之，則是倒退的、反動的。這正是自秦皇至今的「人治社會」中，中國人民之所以熱愛、需要、讚頌、懷念「清官」的根本原因所在。四十年來的政治運動。就是壓迫人民的一種政治手段，歷史證明了他們善於「秋後算帳」，但歷

史最終將不容篡改。

我們當前要特別警惕中共內部份政治野心家，利用這次民主運動，達到個篡權上台的目的。鄧小平正是利用了人民的「四·五」運動而上台後暴露出來的殺機。他們所鼓吹的「改革成績」是虛假的、表面的，真正的實際是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平直線下降，外債纍纍，等待着人民償還！

廣大的工人同志們，要緊密地團結在工人聯合會的周圍，在市工人聯合會的領導下，將當前的民主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高潮。本聯會定於5月22日14點正，在天安門前舉行全市工人大遊行，進行和平請願，聲援大學生運動。遊行口號是：「大陸之大，已經沒有真理的一席之地了！」

北京市工人聯合會

1989年5月17日

告全國工人書

北京工自聯

全國的工人們：

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上升為全民族共同參與的與整個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息息相關的全民運動，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必然趨勢。我們北京工人以中國人自古不怕死的氣概，勇敢地站在了爭取民主、爭取民權的最前列。

由於四十年或者說幾千年的封建專制的桎梏，中國人的權利和做人的尊嚴被無情的蠻橫地剝奪了。在他們的心中一切權利和尊嚴都是帝王們的獨家財產，而人民只有乞求的份，絕無爭取的份，甚至連乞求的份也沒有，誰敢爭取誰就要被殺頭、滅門。所有這些形成了中國人今天的這種莫明其妙的恐懼感。

而今天在學生運動的啓蒙下，我們雖然明白了自己應有的做人的權利和尊嚴，但在高壓政治的嚴密控制下，專制者利用行政開除和經濟制裁等卑劣的手段來威脅我們工人。人們明知自己的權利和尊嚴被專制強姦，却又不肯聲張，不敢反抗。由此可見，專制政權對人性的泯滅到了何等殘酷的程度。

中國人啊，一個多麼可愛又多麼可憐可悲的民族，居然被愚弄了幾千年，至今仍在被愚弄。不，我們更應該是一個偉大的、□□的民族，該恢復她的本來面目了！

工人兄弟們，如果這民族的恥辱注定要被我們這一代人帶進二十一世紀的話，那麼，我們寧願戰死在二十世紀！

工人兄弟們，強權政治不可怕，可怕的是強權下的總崛起！高壓政策更不可怕，可怕的是高壓下大爆炸！

我們呼籲中華人，已經醒來，千萬不要再睡去！

工人兄弟們，讓我們全民一心，用暫時的，也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巨大痛苦，去換取下一代人能自由地呼吸純淨的民主空氣，能享受和別人一樣的權利和尊嚴！

人民才是多數，專制者才是「一小撮」。如果我們工人站起來，向前走出一步，揚起的塵土也足以把專制埋入地獄！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

【選編自《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二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年11月】

告海外同胞書

北京工自聯

海外華僑、華人同胞們：

正當中國人民的民主愛國運動面臨空前嚴峻考驗的危急關頭，我們北京工人站出來了！

在人民共和國大廈的基礎和柱石上，有我們的鮮血和汗水的印迹，這個國家由我們工人和一切腦力、體力勞動者的奮鬥和勞動締造的，我們是這個國家的理所當然的主人，國家的事情怎麼做，應當而且必須聽聽我們的聲音。絕不允許由少數的民族敗類、階級的敗類，盜用我們工人的名義鎮壓學生、扼殺民主、踐踏人權！我們堅決支持民主愛國運動！堅決反對顛倒黑白、天怒人怨的《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沒有人能夠強迫我們在槍口下勞動和工作。我們堅決反對並竭盡一切努力抵制反人民的非法戒嚴！堅決反對罪惡滔天的李鵬的「五·二〇」講話！

爲了社會主義改革大業，爲了我們的民主愛國運動，爲了我們的後代能在掃蕩了斯大林主義專制之後的晴朗天空下自由地呼吸，像人一樣尊嚴地生活，我們緊急呼籲一切關心中華民族命運的海外僑胞、海外華人，立即行動起來，採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援中國人民的民主愛國運動，愛國一家，同種同根，

自由民主，人同此心。值此中華民族最危急的時候，讓我們發出共同的吼聲：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試看哪一個槍口膽敢對準人民的胸膛！

試看哪一輛坦克膽敢輾過北京鮮花盛開的、和平的田野！

民心必勝！

民主必勝！

理性必勝！

正義必勝！

北京工人自治會

1989年5月26日

告海內外同胞書

北京工自聯

海內外同胞們：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宣告成立了。它是以工人為主體的組織並廣泛地聯繫社會各階層人士，共同把民主運動進行到底。

同胞們，我們目前非常需要你們從各個方面給我們以強有力的支援，尤為重要的是輿論界、新聞界，及海外民主運動組織的支持。現在，我們的祖國還在受着驚大的磨難，做為每一個炎黃子孫，都應該為民族的利益着想，都應該為巨龍的重新騰飛，貢獻一份力量。

同胞們，我們要團結一致，組成以廉潔的中國共產黨為主導，以中國工人階級為主體，以海外內的愛國人士為「中堅」力量的體系。

同胞們，行動起來，時刻已經到了，我們要團結起來，打倒貪官，鏟除腐敗，為民主、自由和人權而戰，為真理而戰。

最後，我們緊急呼籲：「同胞們，中華民族要作出重大選擇，中華民族要作出重大選擇！」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

1989年5月

首都全體工人和學生的 聯合聲明

高自聯、北京工自聯

我們聲明如下：

- 第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立即召開臨時大會，罷免國務院總理李鵬，罷免國家主席楊尚昆，以及追究其他一切與人民為敵的現政府官員的法律責任。同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應組織特別法庭，依法公審這些暴君。
- 第二、反對軍管，呼籲北京市民抵制軍隊進城。如果軍隊進城，我們首都工人將同全市人民一道保護天安門廣場上已經絕食八天的幾千名學生。同時也呼籲絕食同學迅速停止絕食，沒有必要為這些暴君作出不必要的犧牲。我們工人階級感謝這些值得中華民族驕傲的大學生，歷史將永遠記住他們。我們將以天安門廣場為戰場，用我們的身體保護大學生及其他絕食者和靜坐者。我們將以我們的血再建一道巴黎公社牆。
- 第三、反對獨裁者愚弄軍隊，呼籲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體官兵調轉槍口，對準這幾個暴君。我們的原則是，人民的軍隊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子弟兵是保護人民的。

第四、我們不承認國務院總理簽發的關於對北京部份地區的戒嚴令。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9條第16款並沒有規定國務院可以授權北京市政府停止北京市公民行使言論、遊行、示威等憲法給予的權力。爲此，我們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撤消這個戒嚴令。

第五、我們學生將同教師一道罷課、罷教，直到我們取得最後勝利。

第六、我們首都工人將利用一切和平且有效的手段，包括罷工，來達到我們的目的。

(編者按：本文是廣播稿件，可能尙有其他部份。)

【節錄自：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驚心動魄的56天——1989年4月15日至6月9日每日紀實》；北京：大地出版社，1989】

北京市工人自治會的公告

今天下午，北京市工人自治會召開緊急會議，就目前形勢中我們即將展開的任務，召開特別緊急會議。常委們就目前的形勢，完善了領導班子，設立了領導小組，設立了秘書處、宣傳處、後勤處、以及聯絡處。

一、北京市工人自治會是首都工人自發組織的、適應時勢的。它的目的，是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下，去正確領導這場民主愛國運動。它歡迎首都所有工人及各廠礦單位的工會，積極加入我們的工會組織。

二、大會根據目前的形勢，特決定

- (1) 工人糾察隊目前的任務是與學生聯合自治會緊密配合，確保同學的生命安全，與北京市社會秩序的穩定；
- (2) 工人糾察隊員在維持社會治安的同時，確保北京市各種物質及市民平常生活所需的蔬菜、糧食等的運輸及各種生活用品的運輸。

特此公告。

北京市工人自治會常務委員會全體委員

89年5月21日

【選編自《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一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年6月】

【選編自《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一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年6月】

緊急呼籲(一)

北京工自聯

首都各界、各階層民主愛國人士、單位：

5月25日，我們發出緊急倡議，舉行全市大規模遊行。學生、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及各界市民請準備好本單位條幅，下午2:00湧向二環路，遊行路綫以天安門廣場為頭，沿二環路逆時針遊行。先頭標誌是宣傳車和工人自治聯合會的旗幟，後面為工人、市民糾察隊。

這次社會各界大遊行中心口號：

歡迎萬里回國，堅決罷免李鵬

否定動亂，取消戒嚴

立即召開全國人大緊急會議

立即召開中央政治局緊急擴大會議

立即召開政治協商緊急會議

這次運動是偉大的民主愛國運動

中華民族已到了最重要的歷史轉折關頭，讓我們每個人都行動起來。

人民必勝！！！！

1989年5月24日
天安門廣場西觀禮台

緊急呼籲(二)

北京工自聯

舉世矚目的這場全民愛國民主運動，在廣大首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積極參與下，已經取得了初步勝利。但是北京市政府却置人民的利益、呼聲不顧，撤走交通警察，停運公共汽車，製造恐怖，企圖製造動亂。但是，他們又一次錯誤地估計了我們的人民。近日報載，首都治安、交通、生活、生產秩序井然，我們的安全不用所謂的軍管保護。我們要求的是民主和憲法的尊嚴。

在此，我們呼籲首都各界迅速行動起來，請各個單位出面組織治安隊。我們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願意出面作協調工作，爲了民族大局，爲了維護憲法的尊嚴，爲了推進民主的進程，爲了不使中國的歷史倒退，讓我們携起手來。

同時我們在這裏希望市政府不要故意製造無政府狀態。我們也鄭重聲明：一切由一小撮反對人民的勢力製造出的動亂是不應由人民來負擔的。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
1989年5月25日

急件

北京工自聯

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委會關於沈銀漢委員被抓一事與公安局交涉的情況。

今天上午10時40分，首都工籌會代表韓東方與法律顧問李××一行三十餘人來到北京市公安局大門口，就首都工籌會籌委委員沈銀漢今晨被兩名警察帶進警車一事與公安局進行交涉。

北京公安局信訪辦公室鞏時斯接待了代表韓東方和李××。法律顧問李××代表首都工籌會提出三點要求：第一、市公安局當證實沈銀漢是否被抓；第二、如果被拘留或逮捕，會不會予法律程序；第三、如果被拘留，應當向家屬和首都工籌會講明拘捕的原因。

公安局負責接待的鞏時斯回答三點。第一、工人自治會是非法組織其活動違反戒嚴令；第二、他們是負責接待，不了解具體情況；第三、工人來公安局門口違反了戒嚴令，法律顧問李××回答道，該組織是非法與否與此次交涉無關，接待部門雖然不了解情況，但是否有職責了解情況並予以回答。負責接待的人回答不了解情況，但後來說，法律顧問無權代表工人自治會提出要求，他們願意直接與工人代表自治會接待，法律顧問李

××現暫時退出，工人代表韓東方與市公安局負責人的接待未能繼續下去。現在數百人聚集在市公安局大門口要求放人。

據報首都工人自治會聯合會籌委會另兩名工人錢玉民和白東平也被公安局抓走。

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
1989年5月30日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 緊急通告(一)

今天凌晨2:00一位目擊者在高聯的記者招待會上證實，今天凌晨1點多，在北京飯店附近，一輛裝有警燈的北京吉普車衝出兩名警察，將一騎車人拖了下來。這位騎車人喊道「爲什麼抓我？」警察不答話，強行將他推上吉普車。被綁架的人被推上吉普車前，將兩個筆記扔在地上，這位目擊者立刻將筆記本送到高聯。

這兩筆記本封面上寫着「沈銀漢」這個名字。筆記本裏有這樣一句話：「昨天籌到二百元錢整存在頑鐵處」。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委會由此證明這位被綁架的人就是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委會執行員沈銀漢先生。首都工人自治會得知此信後，立即派人往沈銀漢先生家調查，發現他確實沒有回家。

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是根據憲法「結社自由」成立的，無任何違法行爲。本籌委會將於今天早晨12點去北京公安局交涉，並號召廣大工人聯合起來，要求立即釋放工人代表沈銀漢先生。工人也有愛國的權利。救我同胞，救我工人代表！

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
1989年5月30日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 緊急通告(二)

今天凌晨，首都工人自治會籌委會經過調查證實，我籌委會執行委員錢玉民、白東平先生被鐵路公安局非法綁架。

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委會是根據憲法「結社自由」成立的，無任何違法行爲。爲此，我會全體會員對僞當局的違憲行爲提出強烈抗議，並號召廣大的愛國工、農、商、學、兵等一切力量支援我們要求立即釋放工人代表錢玉民、白東平先生，並嚴懲非法綁架的凶手。

工人也有愛國的權利，愛國是無罪的。

救我同胞！救我工人代表！

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委會

1989年5月30日

註：本會將於今天上午9點前往北京市公安局交涉。

廣州工人自治會宣言

廣州工人自治聯合會在這次全國規模的愛國民主運動中已經發展成爲一個完善的愛國組織，今天宣告成立。廣州工人自治聯合會是廣州工人自發的組織，受廣州市民監督，對廣州市民負責。我們的目標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爲了苦難中國自由、民主和富裕，爲了推進中國的民主進程。

現在，北京開槍了，人民在流血，中華民族到了生死攸關的危機時刻，歷史的重擔責無旁貸地落在了每一個中國工人的肩上；反對暴力，支持學生，發揚民主和科學，這是別無選擇的選擇。

中國昏潰迷茫，輾轉反側，官僚主義橫行，政治經濟腐敗，國家的興亡關係到我們每一個工人的切身利益。廣州工人已經再也忍無可忍了，我們廣州工人自治聯合會緊急呼籲社會各界人士支持和參與這次全國規模的愛國民主運動。

廣州工人自治聯合會

1989年6月4日

【選編自《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一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年6月】

城建工人自發聯合會的宗旨

中國城建工人自發聯合會，於1989年5月21日18時正式成立，宗旨如下：

我們不是監外執行的勞改犯，我們是共和國合法公民，我們要民主、要自由。學生為民絕食請願，我們工人是有良心的中國人，政府如此毒狠，工人十分同情學生弟妹，我們工人一定要對學生支持到底！

國難當頭，匹夫有責，各行業工人階級團結起來，保護我們的學生。小平、李鵬，不識抬舉，我們就把他扔下台去！

中國城建工人自發聯合會總會長草
1989年5月21日

【選編自《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一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年6月】

緊急動員起來， 攻克八十年代的巴士底獄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

——我們的呼籲

決戰的時刻到了。

改革在危險中！民主在危險中！愛國民眾和愛國青年在危險中！

已經遭到億萬人民唾棄的法西斯政府及其斯大林主義的專制制度，並沒有，也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李鵬及其後台和一小撮頑固不仁的追隨者還在歇斯底里地表演，他們完全有可能再做一次孤注一擲的政治賭博。不是盛傳曾經有人揚言「不惜二十萬生命，換取廿年安定」嗎？任何有一點理智的人都不會對這個被北京許多羣眾唾罵為「流氓政府」、「無賴獨裁」的政權抱什麼幻想，都不會去天真的相信他們的什麼決不秋後算賬的承諾。

值此危急存亡之際，為着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更加完善，為着我們的民主愛國運動，為了我們的後代能健康地成長，象人一樣的尊嚴而生活，我們緊急呼籲一切愛國民眾、愛國青年，一切真誠信仰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為根本目標，有良知的

共產黨員們，動員起來同仇共奮衆志成城，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和平方式，向法西斯暴政，進行最後的抗爭。

不自由，毋寧死，我們要象人一樣活着。二百年前，英雄的法蘭西人民用啓蒙運動發起來的自由理想和革命激情，創造了幾乎是赤手空拳，攻克封建專制的最後堡壘，巴士底獄的歷史性奇蹟，爲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自己的獨特貢獻。今天英勇善良有着高度智慧的中國人民在已五千年文化和一百五十年民主革命傳統熏陶出來理性，感情百折不撓堅強毅志和無私的犧牲精神，向着三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巴士底獄及全世界斯大林主義的最後堡壘，進行空前波瀾壯闊，激烈悲壯的最後抗爭，歷史將以金字鐫刻 公元 1989 年 4、5 月間發生在中國北京天安門廣場的這一切，我們的後代 將爲他們的前輩對人類文明發展幾做出的前所沒有的劃時代的 貢獻而 永遠自豪！即使到幾千年以後，人們在回顧今天時，也 會激動 不已，熱淚盈眶。

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那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未來屬於我們！

民心必勝！
民主必勝！
理性必勝！
正義必勝！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
少年中國通訊學會
1989年5月26日

工人兄弟，動員起來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

在民主自由與封建專制的決戰時刻，工人兄弟們站出來，站起來！

人民要民主、要自由，專制者在發抖！他們要作最後的掙扎。工人兄弟們，我們有力量，我們一聲吼，地球也要發抖。獨裁者，見鬼去吧！

北京工人聯合自治會倡議，5月28日上午舉行全市大遊行。工人兄弟們，勇敢地走向街頭，組成這次全球華人大遊行。
注：1.目前的形勢

爲了鎮壓民主運動，黨、政、軍中的一小撮壞人又施毒計，強行把民主運動的骨幹同趙紫陽等同志拉在一起，說趙紫陽、秦基偉、鮑彤是領導此次民主運動的骨幹，是成員，參加民主運動的人是受他們的利用，並以此欺騙軍隊和人民，並且取得了相當程度的成功。目前，我們隨時可能被鎮壓。

2. 28日10點以前，各單位從本單位出發，向廣場進發，然後繞二環繞行進，舉行一個聲勢空前及數百萬各界人士的大遊行，這次遊行在紀律、組織等各方面都要給人一個印象：我們是正義的、强有力的、有極強自控能力的推動中國進步之師。

這次遊行將通過一定的形式(如標語、宣言、口號等)達到

如下目的：

- (一) 揭露和粉碎目前黨、政、軍中一小撮壞人所施的毒辣陰謀。
- (二) 再振學生、工人、知識份子、市民的權威，並抓住這個契機將工人和市民發動起來，建立自己的自治會機構。
- (二) 敦促人大的召開，以解決國家面臨的嚴重問題和國家領導問題（罷免李鵬），召開全黨代表大會，解決黨的領導問題。
- (四) 要求萬里委員長返京治病，並希望能帶病主持人大會議。
- (五) 為萬里委員長和各位常委提議罷免李鵬提供事實上的依據。
- (六) 粉碎李鵬等人的無恥濫言——「人民（包括北京市民）是擁護我們的」。
- (七) 向人民、城外受騙的士兵，和人民的敵人展示一下人民的力量，並讓士兵思考一下與人民一致參加支持的運動能是非正義的嗎？

「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讓我們共同去迎接自由、民主的社會！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
1989年5月27日

人民的號令

公鳴

多少年來，我們這個十一億人口的大國，被一撮官僚主義者，打着社會主義的旗幟，實行獨裁主義統治，實施愚民政策，迫害知識份子。他們高高在上，無視國法黨紀，為維護自己的統治，拉幫結派，大搞裙帶關係，任人唯親。特別是當代的「慈禧太后」，搞起垂簾聽政，分離羣衆，與人民對立，只知橋牌、撲克，不體察民間疾苦，內外債纍纍，人民稅收重重，物價飛漲，逾十億人民的中國在世界上名列尾後。儘管如此，他控制言論自由，宣揚什麼我國的總產、總收入等接近或超過別國，可殊不知別國的人口才有幾個，而我國的人均收入共有別的國家的幾十分之一。在世界上，還能有我們這個大國的地位嗎？同樣是人，為什麼我們十億人如此貧窮，如此落後呢？難道是我們無能嗎？如果說我國因為人多，那麼，日本也是人口密集的国家，為什麼比我們好呢？如果說美國是因為建國時間長，那麼南朝鮮、台灣為何也比我們好呢？幾年來，官僚越來越腐敗，領導無能力解決，究竟是何原因？近日在人民的呼籲下，李鵬雖說他的三個兒女未參加官倒，但作為總理來說，並不意味着你的兒子不是官倒就稱職，而是要你能消除、制止所有官倒才行。然而，你們至今仍不知誰是最大的官倒和

最腐敗的官僚，你們檢查不出來還要站在台上吃什麼乾飯，如此無能，當何總理？中國地大物博，人力資源豐富，你們却把中國搞的一塌糊塗。說什麼搞社會主義沒有經驗，就帶着十億人摸着石頭過河。這麼多人摸石頭，摸了這麼十幾年，走的路又如何呢？難免有很多摸不着石頭的人，豈不就被河水淹死了？難道官人就把人的生命財產當兒戲嗎？改革十多年來，沒有方向，沒有目標，到底十億人奔向何處去？誰個官人能具體確切地回答清楚？說什麼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那麼，如果有一個老鼠白貓黑貓都去抓，豈不要打起架來嗎？即既造成混亂。又造成矛盾，分化越來越深，其必導致官貓越吃越肥，民貓越來越貧，難道這是治國良方嗎？

周總理說：誰贏得學生，誰就能贏得未來。毛主席說：鎮壓學生運動的人沒有好下場。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我們要民主也須付出犧牲，因為統治者不打，是不會自己退出歷史舞台的。他們絕不會恩賜我們民主權利的，所以要我們去鬥爭，去爭取民主。沒有真正的民主，官倒和腐敗就不可能徹底消除，而要想實現真正的民主，就必須廢除終身制。否則，一人獨裁、萬民敢怒不敢言，還談何民主。沒有民主，就沒有人權。沒有人權就是奴隸。讓我們不願做奴隸的人民立即起來，挺起胸膛，直起腰，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快把愛國民主運動的烈火燃燒的通紅，不失時機才能成功。實踐證明，目前民主運動的首要問題是政權問題。只有把獨裁統治者打倒，清除民主運動的障礙，才有希望把民主運動推向前進。否則，我們的民主運動，必然遭到獨裁者的秋後算帳。為此，愛國民主運動號召我們！以下歌詞為抗大校歌：工學商聯合起來，奔向那愛國運動的前方。聽吧，民主的吶喊在呼喚！看吧，自由的旗幟在飄揚。我們工學商一道，奔向那狂風暴雨迎接那曙光。工學商，

全民衆起來，奔向那愛國的前方。

同志們，我們反對黨的某些領導人。並不是等於反對黨的領導。我們反對政府某些領導人，並不等於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動的獨裁統治者給我們亂扣帽子，亂打棍子，這不就是因為沒有民主造成的嗎？難道我們還能讓這種現象再度出現嗎？人民不答應！各民衆團結起來，為救中國，為救人民，快把大獨裁鄧小平推下歷史的舞台。使我們中國全面開創民主、自由的新局面。

人民記者：公鳴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
1989年5月29日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 籌備處公告(第一號)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是首都工人非常時期自發產生的過渡性組織，其宗旨是：爭取民主，反對獨裁，支持聲援保護絕食學生，與大學生及全國各階層人民一道推進國家民主化進程，為此自治會號召：

(1) 北京市各行業所有職工於5月21日12:00實行總罷工(不包括供電、供水、供氣、郵電、通訊)，直到調進部隊全部撤離北京市。

(2) 堅決阻止軍隊進城，捍衛這之民主運動已取得的成果，維護天安門廣場現有秩序，動用各單位所有車輛封填進城的主要幹綫及所有地鐵出口，並保障中央廣播電台電視台的正常運轉。

(3) 配合全市各界人士積極向進駐北京的廣大官兵宣傳事實真相。

1989年5月20日

【選編自《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一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年6月】

首都工人自治會籌委會 新聞發佈會

5月30日晚9:30首都工籌會在紀念碑北側舉行了新聞發佈會。工籌委發言人韓東方宣讀了《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臨時章程》。首都各界聯合代表也發來了賀詞。在新聞發佈會上，英國工黨青年部史蒂芬·約利代表英國工黨青年部發來的賀電，他說：「幾個星期以來的中國學生已獲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並很高興地看到中國工人參加了這次民主運動。」他認為社會主義需要民主正如身體需要氧氣一樣，最後，他表示英國工人中國工人永遠站在一起，英國工黨發來的賀電全文是：「願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委會)永遠獲得勝利。為了民主工會的運動和工人的民主，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一位加拿大工黨(左派)成員也發來了熱情洋溢的賀詞。

最後，首都工籌會法律顧問李××介紹了就三位工籌會員被公安局帶走一事與公安局交涉的情況。工籌會向公安局提出三點：一、公安局應當證實沈銀漢、白東平、錢玉民三位是否被公安局扣押；二、如果被扣押是什麼性質的扣押，是否符合法律程序；三、如果被扣押，能否給予明確的答覆。按刑事訴訟法規定拘留或逮捕應出示拘留或逮捕證，被拘

留或逮捕應正面鑒定簽字，公安局應在二十四小時內告知被拘留逮捕的親屬。公安局沒有證實他們是否抓了工人，是否按照法律要求抓人。

【選編自《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二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年11月】

流行歌曲新編

人民唱：我曾經問過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總是笑我，一無所有。（一無所有）

中央唱：跟着感覺走，緊抓著小平的手，脚步愈來愈輕柔。

政協唱：我想唱，可又不敢唱，小聲哼哼還要東張西望。

人大唱：河山只在我夢裏，權力已多年未親近。

國務院唱：我是一只來自北方的狼，走在無垠的曠野中。

（狼）

軍委唱：大刀向同學的頭上砍去。衝呀，殺！（大刀隊進行曲）

省政省唱：月亮走，我也走，我送老鄧到橋頭。（十五的月亮）

縣政府唱：不管是東南風，還是西北風，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黃土高坡）

鄉政府唱：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一個更圓，哪一個更亮。

同學唱：打倒李鵬，打倒李鵬，要民主，要民主。（打開蚊帳）

（編者按：這些都是中國大陸近年來最受歡迎的流行歌曲，在89年6月2日，天安門廣場「工自聯」的廣播時有播出，經改編後，歌詞尖銳及幽默，甚受大眾歡迎。）

中國現狀十大怪

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

- 一說：三中全會開，號召富得快，百姓的口袋沒見鼓，黑貓白貓肥起來。
- 二曰：對外要開放，投資引進來，外債欠了一屁股，卻把私款存起來。
- 三談：鈔票「加時賽」，國庫券上「短平快」，副食補貼七毫五，物價卻比火箭快。
- 四論：改革形勢好，政策也不壞，大鼻子沒入中國籍，炎黃子孫往外跑。
- 五看：賓館酒店多，面貌換時代，鶴立雞羣成風大，市民少住宅，好的經驗吸收慢，茅房收錢學的快。
- 六罷：貪大求洋不務實，國財理不開，教育經費出不起，吃喝之風全上台，國運家運加惡運，都因上層太腐敗。
- 七評：憲法一大本，法制雄威在，奈何「油瓶兒」「醋平兒」多，人治勝過法制裁，民主自由更可憐，說錯一句抓起來。
- 八笑：新聞「二五眼」，更有「味糊兒」電視台，謊話鬼話少真話，要你幹嗎來！
- 九罵：蒼天不開眼，賊貓李鬼登上台，出爾反爾造動亂，當朝

一品是無賴。

十怪：太平北京城，大軍調進來，只因學潮扎了眼，老爺屁股

不自在，坦克飛機毒瓦斯，槍口對誰開？

現狀十大怪，其實並不怪，

都因官僚吃錯了藥，

禍起蕭牆，該！該！！該！！！！

首都工人自治會宣

1989年5月26日

北京人讚美詩

偉哉！北京人！第一次來到北京就趕上這個偉大的時刻，我有一種妙不可言的感覺，那是一種妙不可言的感覺！什麼叫偉大？看一看北京人你就明白，什麼叫「光彩」請聽一聽北京的砍大虎！以前我不懂得多只是以爲小□，如今我才大徹真正的明白了，其實並不深奧的道理，崇高的世界只是這樣一種現世的堅決！！！以前我聽說過北京的猿人偉大，今天我親眼目睹，偉大莫過於當代的北京人！！我激動地要預言，「北京人」這三個光彩奪目的文字，將永遠地載入歷史的史冊，無疑！這是一個真正人的世界，鬼成了很容易的挑剔，如果說當代最可愛的是大學生，那麼無疑當北京人就是最崇高的人！偉哉！北京人！崇高的同學們，我高興的預祝北京人將爲古老的中國贏得第一塊諾貝爾獎，且舉起鮮紅的酒，來來來乾一杯。

歷史發展到今天，中國人民不應該像野狗一樣的習氣，因向有一口飯，一個工作，一個配偶，一塊遮體布，就只顧禽獸般苟延殘喘地生着！而忘卻社會主義國家的尊嚴！民族的尊嚴！主人翁的尊嚴！人格，人性的尊嚴！有知識有骨氣，有民族氣節的中華各民族英雄的人民和英雄的人民子弟兵，愛黨愛國的士兵將領們！起來！起來！萬眾一心，爲捍衛馬、恩、列、毛澤東主義的真理而英勇鬥爭，推翻鄧、趙幾個野心家，

陰謀家卑鄙的獨裁，詩還我人民大眾的十年的血淚債，恢復我人民共和國的本來面目，恢復我們偉大中國共產黨的本來面目。語言發自我們的肺腑，忠於黨、忠於祖國、忠於人民的人們。起來！起來！起來！

新編共和國歌

中國工人詞

起來，各民族英雄的人民，瞪大我們的眼睛，看清我們真正的敵人，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發出憤怒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誓死為真理而鬥爭，前進！前進！前進進！

中國工人詞
1989年5月21日

北京工人致學生公開信

北京一億工

你們的正義行動，感動了我們，感動了全社會，你們道出了我們的心裏話。你們憂心憂國的心情，也是我們的心情。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目前由於種種原因，我們工人階級還不能像你們學生那樣走上街頭，高呼口號，實行總罷工。但我們的心是連通的，我們的眼光是一致的。我們堅決支持你們提出的七條合理要求。為真理而鬥爭，死又何懼！

雖然我們現在還不能加入你們的行列，但是，我們可以從精神上、物質上幫助你們，使你們不至於走上孤軍的境地。你們若是需要資金，我們可以為你們募捐；要是需要器材，可以提供。工人階級是慷慨的，更何況你們的行動是正義的，是為了國家的興亡，是為了人民的安危，理應得到全中國人民廣泛的支持。

最後提幾點建議供參考：

- 1.由於新聞機構顛倒黑白，蒙蔽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建議你們廣泛宣傳，包括印發傳單、組織講演隊伍，使人民大眾可以知道事情真相。
- 2.實行罷課以後，各項工作要抓緊進行，包括遊行、請願、示

威等是會有一種壓力的。

3.使更多的高校參加大家行列，同時邀請支持學生運動的各地名流、知名人士發表談話，以期擴大影響，獲廣泛的同情與支持。

4.堅持到底，不達目的，絕不罷休，要有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

最後，讓我們再感謝你們的正義行動；前途是光明的，而道路是曲折的，曙光已經出現。奮鬥吧，同志們！讓我們一齊高呼：民主、平等、自由萬歲！

北京一僱工

4月23日

【選編自《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一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年6月】

一個工人致學生的信

北師大

同學們：

你們的活動已經堅持了幾天，你們一定要爭取到廣大工人、農民、士兵和個體戶們的支持，那麼怎樣才能得到他們的支持呢？首先不要只強調知識份子待遇和增加教育經費，不要空洞地喊要求民主，因為這會影響同學和工農間的關係，不利於團結。

要向工農兵宣傳所謂「全民所有制」實際上已變成了少數貴族老爺所有制廣大工人農民創造的財富，少數貴族老爺享受，他們稱我們是「國家主人」，可是主人幾世同堂，住房擁擠不堪。他們自稱「公僕」，卻到處建別墅。「主人」擠公共汽車上班，「公僕」卻擁有許多高級轎車，還有警車為其鳴鑼開道。同胞們，他們打着維護安定團結的旗號，阻止我們，那麼不安定團結的因素在哪裏呢？我們對他們的偷盜國庫的行為能不聞不問嗎？他們的錢是哪裏來的，還不是我們的血汗。他們於國家利益不顧，坐着高級轎車去打每場要花幾百元的高爾夫球，試問他們的工資是多少？他們的花費又是多少？難怪人們說：「國民經濟總收入就是這些人的人工資」。試問這同封建君主有什麼兩樣！

我們不能期望於一兩個賢明的君主，我們要建立一個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新聞自由、司法要獨立，人民代表要人民選。

少數人控制着新聞工具，欺騙着人民，耍弄人民，他們的醜聞得到揭露，人民的意志得不到表達。

人民代表少數貴族老爺指定，試問這能代表人民嗎？能反映人民的心聲嗎？

親愛的同胞們，記得兩年前鬧學潮時，少數人利用新聞工具欺騙了全人民，挑撥了學生和工農關係。他們說：培養一名大學生，國家要花上萬元，要上百個工人農民才能供養，可學生不珍惜。這實際上是在挑撥關係，而真正的事實是幾萬萬同胞流血流汗創造財富，被他們揮霍，他們是中國最大的資本家，他們又把國家的災難轉嫁給全國人民，這就是通貨膨脹、商品漲價。學生的運動與工農的利益是一致的，我個支持你們！

北師大
4月28日

【選編自《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一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年6月】

致工人糾察隊

北師大學生自治會

廣大工人市民同志們：

辛苦了。一個多月來，你們對於這場偉大的愛國運動給予了很大的支持，無論是從物質上還是精神上。我們愛國學生呼出了你們的心聲，工人與廣大同胞的心是緊緊連在一起的。當我們在大街上遊行的時候，你們為我們鼓掌歡呼送飯送水，甚至把自己節省下來的錢無私地捐獻給我們。當我們為抗議政府的無賴行徑舉行絕食示威時，你們熱情地聲援我們。如果沒有你們的支持，我們不可能堅持到今天。多麼偉大的人民，平時你們看起來是那麼普通和平凡，當關鍵時刻就煥發出驚天動地的力量。在你們面前，一切貌似強大的力量都顯得那麼渺小和可憐。

可憐、可悲的李鵬偽政府不但不答應學生的正義要求，不惜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再次把學生運動誣蔑為動亂，並把軍隊開赴北京，借維持治安之名，行殘酷鎮壓之實。眼看着這場愛國民主運動就要夭折，你們堅定地站在學生一邊，勇敢、機智、有效地阻止了進京部隊。今天，已是戒嚴令施行的第四天，偽政府使出既卑鄙又陰險的一招，組織所謂的工人糾察隊，協助軍隊入京，妄想讓工人和學生發生摩擦，自相殘殺，

他們可從中取漁翁之利。據傳說，他們還指使一批便衣警察，混入工人糾察隊，從中搗亂，其目的和用心更加陰惡，廣大工人和市民同胞們，務必擦亮自己的眼睛。我們也相信，即使是便衣警察，只要他還是一個中國人，還是中華民族的七尺男兒，還有中國人的良心，他們就不會為虎作倀，幫助李鵬偽政府一小撮，為他們清除道路，以達到反民主、反人民的目的。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不要看李鵬一伙現在還做最後掙扎，但由於正義不在他們手中，他們的壽命就不會長。

工農兵學商，團結起來，為一個民主的中國而共同奮鬥。

4月28日

【選編自《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一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年6月】

和兩個工人的交談

師大外語系一革命者

筆者以前對此學運認識有限，沒有參加「四·二〇」、「四·二二」遊行和靜坐，但我一直沒有平靜下來。後來發生的一幕幕叫人驚詫的事實喚醒了沉睡的我，於是我毅然決然地加入了愛國學生的行列，成了一名革命的「投機者」。但請記住我投機的日期是4月23日。我參加了4月27日的大遊行……後來的事情大家都已知曉，不復重說。在這裏我想向同學們披露今天中午與兩位工人交談的內容，順便轉達一下市民或者說人民對我們的愛國運動所抱的殷切希望。

兩位工人來自兩單位，他們都是大學畢業，其中一人辭去了官家「恩賜」的職位，承包了兩個飯館。另一位是某個科研機構的研究人員。我們談天的中心議題可以說是：「學生的運動得到了市民的支持，得到了工人的支持」，一位工人如此說。他例舉了一些小事：他們單位組織工人學習討論《人民日報》社論，組織會議的小頭目讀完社論後，叫工人發表意見和看法，於是乎工人提出了一系列無法解釋的問題，自然是滿腹的牢騷：如分配不均、工作日長、社會福利低、工人再教育沒有保障或根本就不可能等等。那個小頭目一黨的低級領導者聽了工人的牢騷，也大發感慨，「別說你們，我們還不滿呢

」（看看絕妙的諷刺）。

一位工人告訴我他到肉食公司去買排骨，公司的服務人員說：排骨留給大學生吃呢；好多和他一樣去買排骨的市民聽了此話，紛紛說：「那就給他們吧，他們也應該補補身子啦。」這位工人還說，他希望學生到各單位去募捐，一定會成功的。工人們都在等着我們呢。他還補充道：他們單位的工人都這樣說，並在等待着我們的到來。

「同胞們，你們的行動已得到社會的承認，人們在期望着你們能把這次運動進行到底，不要半途而廢，不然人民會失望的，學生失去的將更多。政府早已失卻民意，如若學生們在這場鬥爭中失去一滴血，那麼全市工人就將聯合起來，向政府提出抗議，直至罷工。」

最後兩位工人再三叮囑我要把市民的呼聲和工人的願望轉達給所有熱血青年。工人們希望我們要深入到理論中去，要多動腦筋識破政府的陰謀和假象。

我們分手時，兩位工人再一次向我作「V」型手勢並握起了拳頭喊道：「人民會感謝你們的，歷史會記住你們的。鬥爭吧，發揚韌勁，勝利屬於你們屬於人民。」

4月29日

【選編自《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一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年6月】

勇敢地站起來，工人老大哥

工人同志們：

我們知道你們是被當官的逼來的，他們強迫你們遊行，強迫你們喊違心的口號，這是對你們工人人格上的侮辱，你們心裏憋氣。

你們心裏的本意是打倒李鵬，你們的心是和大學生連在一起的。

李鵬政府強迫你們上街遊行，喊昧良心的口號，這是一個大陰謀。解放前，國民黨政府破壞學生運動，鎮壓學生運動的老花招。今天李鵬竟然把國民黨的「把戲」拿出來「古為今用」了。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一伙就是挑動工人鬥學生，挑動羣衆。今天李鵬一伙又把林彪四人幫一伙的卑鄙手段拿出來「活學活用」了。

李鵬想把工人當玩意兒耍，當作欺騙世界輿論的工具，他們要把你們的假遊行登上報紙編上廣播電台電視，向全國全世界的人們宣傳，說北京工人擁護李鵬，說北京的工人反對大學生，說北京的工人願意軍隊用槍把子管制自己。李鵬一伙要讓武漢、上海等省市堅持罷工、支持學生的工人們看不起咱們北京工人，讓全國有良心的中國人罵北京工人，讓海外的僑

胞們笑話北京的工人。李鵬在侮辱你們的人格，在敗壞你們的名譽，有骨氣的男子漢，你們咽得下這口窩囊氣嗎？

現在，我們的國家黨風不正，官風不正，貪污腐敗，官倒橫行，物價飛漲，人民遭殃，高幹子弟、大官倒們在國外的存款多達四百五十億美元，比國家的外債總數還要多，這些錢哪來的？是工人農民們勞動的血汗啊！我們大學生要求政府公佈高級幹部和他們子女的收入存款和來源，這在民主國家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是，中國的大官們為什麼不答應，因為他們心裏有愧，心裏有鬼，他們不敢讓人民知道。

據有關報刊統計，這幾年，在全國還有一億人吃不飽肚子的情況下，大大小小的官僚們買外國的豪華轎車就花掉了五十七億人民幣，大吃大喝、白吃白喝就花掉四百多億人民幣。這些錢都是工人、農民們勞動的血汗啊！

國外存款、高級轎車、白吃白喝，這些民脂民膏，這些人民的勞動果實都被貪官污吏大官倒們私吞了，揮霍了，浪費了。這些錢全國的職工就是再買廿年的國庫券也填不滿這大窟窿。工人兄弟們，你們為什麼不知道，為什麼知道了管不了，因為國家沒有民主，人民沒地方說話，人民說話不算數兒，沒有民主制度，老百姓就是任人宰割的奴隸，有了民主制度，這些貪官污吏大官倒們就完蛋了！

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中國的老一輩工人階級勇敢地站起來。舉行大罷工，支持愛國的大學生。從此，中國工人階級走上歷史舞台，成了革命的領導力量。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是光榮的歷史。過去，在歷次愛國民主運動中，工人都是一光榮的角色。今天八十年代，有文化有覺悟的工人決定不能在你們的上百年光榮歷史上塗上污辱的一頁。我們相信，首都的工人階級決不給李鵬當任意玩弄的木偶和笑料。我們相信八十年代的工人階級應該比你們的前輩做得更出色！

1980年，歐洲的社會主義國家波蘭，當政府腐敗，物價

飛漲的時候，當國家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首先站出來舉行大遊行、大罷工的是波蘭的工人階級，波蘭的工人沒有等大學生去罷課、去絕食，他們就挺先站出來了。波蘭的工人反掉了官方的假工人會，成立了自己的團結工會。他們不怕坐牢，不怕軍隊開槍鎮壓，堅持了三年的鬥爭，終於取得了最後勝利。波蘭共產黨、中央承認了團結工會的合法化，依法制裁了十六名中央部級以上的大貪官，工資增加了，民主權力爭到了波蘭的工人是全世界工人中的英雄。我們中國北京的工人階級應該怎麼辦？我們相信，中國的工人、北京的工人應該比波蘭的工人活得更更有覺悟！更有骨氣！比波蘭工人做的更出色，波蘭的工人是英雄，我們北京的工人也不是狗熊！在武漢鋼廠八百名工人不怕軍警的鎮壓，跟大學生一起英勇地站在長江大橋上，我們北京的工人應該比武漢的工人更勇敢，做得更出色。北京城是英雄地！北京的大學生是英雄的大學生！北京的工人更應該是英雄的工人！

工人老大哥們，拿出工人階級的骨氣，拿出男子漢的勇氣，勇敢地站起來，打倒官倒，反對腐敗，李鵬下台，取消軍管，「官倒」不倒，安定不了，人民團結，不要官倒！賣掉奔馳，還清國債，要想安定，李鵬下台！

【選編自《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二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年11月】

致工人階級：成立組織共同戰鬥

北師大民主宣傳隊

親愛的工人階級們，你們都已看到，我們這次學生發起的全民愛國運動持續了一個多月，我們付出了巨大代價，從遊行、下跪、罷課、絕食到靜坐，幾乎所有的和平請願方式都已採用，但是未取得政府絲毫誠意。政府仍漠視我們的力量，拒不承認我們選舉成立的「學生自治聯合會」，更嚴重的是把這次運動誣為「動亂」，並調集軍隊進行鎮壓，實施白色恐怖政治統治，我們面臨著極為嚴重的被鎮壓的危險局面。

現在的局勢迫切需要成立一個工人階級自己的組織來領導，加強和推進這次民主運動。到目前，事實已經證明，單靠學生力量，孤軍奮戰，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專制與腐敗仍將保持現狀，我們仍然是一無所有，人民永遠作不了真正的主人。我們不願看到這次民主運動被強權和頑固的一小撮獨裁者鎮壓下去，不願看到夭折的結果，不僅需要人民和羣衆物質上的支持（事實上在這方面廣大市民已做夠多、夠久，再次表示衷心感謝），而且需要一個像波蘭工人階級「團結工會」那樣的組織，來領導工人自己的隊伍，才能和我們攜手並進，取得這次運動的勝利。

爲了挫敗李鵬等獨裁官僚政客強權統治、爲了中華民族還

有希望、爲了我們後輩、爲了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我們呼籲你們成立自己的組織來幫助學生共同戰鬥。我們希望像首鋼這樣的廠家起帶頭作用。

人民必勝！真理必勝！

北師大民主宣傳隊宣傳處

1989年5月27日

（原標題不清楚，本文題目爲本刊所加）

【選編自《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二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年11月】

工人階級決不會袖手旁觀

首都工會工作者及253名職工

我們血汗創造的財富來養活騎在人民頭上的太上皇，這也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和神聖的職責。中國的發展史告訴我們沒有工人階級領導和參加的運動將一事無成，現在學潮已轉向全民族的革命浪潮，中華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讓我們團結起來，聯合民衆去推翻封建專制，實現我們的真正的自由，吶喊是推翻不了專制的，絕食請願對於一個腐敗到極點的政府是無濟於事的，我們堅信人民的力量是堅不可摧的，勝利屬於人民的。

同志們、同胞們！

歷史的事實和經驗告訴我們，真正的民主自由和革命的勝利是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上層建築的一小撮，他們要保護他們的專制，就會垂死掙扎，也會利用人民的鮮血和身軀築起他們的宮殿。在這樣嚴峻的生死存亡關頭，我們的大學生、教授和各界人士已做出了表率，但請你們注意，我們工人身在崗位，心在天安門，血在大學生。工人階級決不會袖手旁觀，他在覺醒，在戰鬥，讓我們手拉手、肩並肩、血流在一起，去奪取這場偉大的革命運動的勝利。

借此機會也向工人階級的勇士、「首都工人自治會」致以崇

高的敬禮。

「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的勇士們！

你們遵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規定，建起了我們工人的民衆團體，你們洪亮的聲音在傾吐着人民的心聲，傳達工人、學生、各界的消息，更牽動着每一個正在激烈跳動怒火沸騰的心。望你們作為主體聯合各界協同作戰，工人階級支持、擁護、保護你們，人民是你們強大的後盾。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主人。

勞動生產者們聯合起來，勝利永遠屬於英勇戰鬥的人民。

—首都工會工作者及二百三十名職工

1989年5月20日上午11時

(本文傳單不全，似缺第一頁；本文題目編者所加。)

時事評論

據中央電台5月15日消息，李鵬總理到首都鋼與工人對話了，我們不禁要問，此舉的目的何在？政府與黨中央不是一直強調要安定團結嗎？

目前的學生運動要求與政府平等對話，要求民主、自由，要求懲法官倒，要求懲治貪官污吏，可我們的政府對此反應如何呢？公眾有目共睹。為此幾千名學生，幾千名我們為之驕傲而自豪的學生，冒着生命的危險，為抗議政府對政府學生的冷漠，抗議政府拖延對話，抗議政府對這次愛國運動扣「動亂」的帽子，在神聖的天安門廣場，在莊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進行絕食鬥爭，他們忍受飢餓，靜坐請願，為的是什麼？可我們的總理卻在此時置幾千名學生的生命於不顧，突然在首都想與工人攪所謂「對話」，對此，我們對政府強調安定團結的誠意，不能不表示懷疑！請問總理，你目的在何呢？是為安定團結嗎？可我們——工人兄弟卻從未「鬧事」影響國家的「安定團結」呀！是為與工人對話嗎？可是我們的先進份子工人階級並沒有要求與政府對話而遊行，絕食與罷工呀！總理您是什麼目的呢？是「別有用心」還是「用心良苦」？是怕我們工人老大哥也進來爭取民主、爭自由，還是擔心我們的先進份子也加入支持學生的行列呢？夠了！政府夠了！中央電台，

請不要再掩耳盜鈴，欲蓋所（彌）了，請不要再瞞天過海，轉移民衆視（錢）了！這樣做也不能顯示政府的智商有多高，這樣做也不能顯示政府的手段有多高明！而只能說明政府的冷漠與無情，只能說明政府的膽怯與心虛！夠了！政府，夠了！總理！共產黨人不是最講坦蕩的胸懷嗎？那麼請拿出共產黨人的勇氣，正視現實正視幾千名學生的生命，正視全中國人民的心聲吧！！！要求安定團結，請拿出勇氣和行動來，要對話請到學生中來，要祖國富強，請到學生中來，要中國的希望，請到學生中來！！！

全中國的公民聯合起來吧！

民主與自由的曙光就在眼前！

【選編自《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二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年11月】

民心不可辱

自5·22日下午開始，北京市政府下令：由北京各大廠礦企業強制派人組成工人糾察隊，他們的任務是：

1. 維護首都秩序。
2. 拆除路障。

顯而易見，他們最根本的目的所在，就是掃清道路，讓部隊開進北京城，實行戒嚴！而李鵬政府嚴格控制的宣傳工具，就堂而皇之地向全國、全世界宣佈：首都工人及市民讓出道路，熱烈歡迎解放軍進城，制止了「一小撮人」蓄謀操縱的動亂，為他們的黑暗，統治和無理鎮壓蓋上一塊遮羞布！

這又是一個陰謀，一個愚蠢的陰謀。李鵬政府何其狡猾，何其毒辣！

但是他們大錯特錯了。現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錯誤估計了人民的力量、正義的量。請看看工人們的心聲。京紡一工人說：「我們所謂的「工人糾察隊」是政府通過廠領導，用二十元錢□□□□飲料收買人心的伎倆，我們被迫參加，否則會受到嚴厲懲處。但我們是有良心的。我們來到堵軍車的地方與學生們一起維持秩序，學生們開始還有些疑慮，但後來我們把草帽送給學生，把錢也捐給學生，我們始終和學生站在一起，政府用錢是不能收買我們的。」

據了解，許多單位都以人力不足等原因盡力拒絕接受這一強加的任務。每一個有知的人都是不情願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政府又企圖組織「農民糾察隊」，但農民是不容欺騙的，他們也站在學生一邊，紛紛去向戰士們講明真相，乘車進京。

政府為什麼軟硬兼施，為什麼物質利誘？為什麼他們心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是不以少數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真理。李鵬政府在一場宏大的羣眾性民主愛國運動的浪潮面前早已黔驢技窮。

民心不可辱！

【選編自《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二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年11月】

李鵬騙人

工人評論員

有着光榮革命鬥爭歷史傳統的北京學生，又點了革命的火炬，他們反對腐敗、反官倒，反得好，受到了全國的學生們的積極響應。

李鵬把他們說成是動亂，是不得人心的。短短幾天，北京——這個賊盜蜂起，娼妓盛行，刑事案多，賭博成風，車禍頻繁，哀鴻遍橫的首都的人民已經不再沉默了，而主動遊行支持學生，募款捐助，互敬互讓，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晝夜連綿，門庭若市的狀況了。他們衝破了李鵬政府的網，朝着革命、改革的大道前進，這就是我們這一代的八十年代人——中國有希望。

人民的運動，使李鵬政府慌了手腳，他們採取了卑賤地欺騙的神話，就這樣驚恐萬分地從外地調了軍隊用來鎮壓。但是這個隊伍都被當地的居民說服了。這說明人民解軍是人民的軍隊，他與歷史上的反動軍隊不同，他決不是李鵬的鎮壓工具，他的頭腦中有着人民的血液在流動着。

李鵬政府的愚民政策，比當年的四人幫有過之而無不及，爲了遮人耳目，他們開動了所有的宣傳機器，大造謠言。

一、他們說，公路設有障礙，無法通車。這是造謠。汽車

公司在5月19日接到市委命令暫時不再出車。21日李鵬用軍隊鎮壓學生，他們手無寸鐵，當然要採取關防預措施，這是人們可以理解的。鎮壓和反鎮壓是一對矛盾，矛盾論認爲，鎮壓是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如果沒有鎮壓，那麼學生防預什麼呢？李鵬爲了給學生加以罪名，竟然連這麼一點普通的常識都不講了，這是多麼可憐。就居民、學生、工人、幹部及其它人員來講哪個不想無障礙，順利通過。但是他們深知李鵬的險惡用心，雖路難通，但無怨言。這正是北京的現實情況。

二、爲了恢復正常秩序：凡是去過天安門前的人。都知道，天安門前，及地下鐵路秩序是很不錯的，自行車讓機動車，機動車讓救護車，學生不亂截車，即是絕食結束了。他們買吃的喝的都給錢靠募捐而沒有一處搶劫的現象出現，這是正氣。車禍也沒有造成長久堵塞，這麼多的人即是在全世界也是奇聞，沒有車禍，你們亦得到嗎？今天學生已辦到了，刑事案件越抓越多，現在學生們的運動使他降下來了，這個秩序不正常嗎？看來李鵬政府指責不是蛋挑骨頭，就是想讓社會上再增加點刑事案件，增加點車禍，要不他就不舒服。

毛澤東思想認爲，看一切問題都要用階級鬥爭這個綱。一件事都有糟得很和好得很兩個結論，這就看你是哪個階級的人啦。大學生的運動在北京受到幾百萬市民的支持，在全國雖受到李鵬政府的封鎖，但也有名氣，在世界受到愛國同胞海外僑胞聲援，在國外有遞交給中國大使的國書，聲討李鵬政府支持學生的呼聲怒不可遏。他們滅亡的時代不遠了。

對於李鵬的謠言，我認爲是不值一駁的。

魯迅先生說，謠言家是極無恥而又巧妙的，一旦證明他的事情是撒謊時，他就躺下了，另外大來一批。

我看李鵬是不是也該躺一躺了。

工人評論員

【選編自《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二輯），香港，十月評論社，1989年11月】



如果一個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
能夠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
能夠使祖國繁榮昌盛，
我們就沒有權力去偷生。

——《絕食書》



工人兄弟們，
 如果這民族的恥辱注定要我們這一代人
 帶進二十世紀的話，
 那麼，
 我們寧願戰死在二十世紀！

——《告海外同胞書》

附錄（一）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日誌

- 4月17日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備小組成立。
- 4月20日 「工自聯」發表《告北京市民書》。
- 4月21日 韓東方在天安門發表演講。
- 4月21至27日 「工自聯」成員深入廠礦積極宣傳「工自聯」綱領（草案），鼓動工人參加「工自聯」。並且開始與「北京高校自治聯會」接觸。
- 4月26日 「工自聯」發表《全國同胞書》。
- 4月27日 《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工自聯」向政府申請立案被拒。大學生舉行環城大遊行。
- 5月初 截至5月2日已有各界人仕共二千多人報名參加「工自聯」。
- 5月13日 北京大學生進行大絕食。
- 5月19日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宣佈正式成立，並發表《首都工人宣言》，號召工人罷工。將指揮部搬進天安門廣場。
- 5月20日 北京市戒嚴，「工自聯」成員堵截軍隊進城。
- 5月22日 「工自聯」發表《工人宣言》。
- 5月23日 北京各界百萬人遊行示威。
- 5月25日 「工自聯」組織遊行示威。發表綱領和宣言。

- 5月26日 「工自聯」在歷史博物館外舉行中外記者會，宣佈其組織正式成立。
- 5月27日 學生、工人、知識界和市民發表十點聯合聲明。
- 5月28日 「工自聯」參加「全球華人民主大遊行」。
- 5月30日 「工自聯」三名成員被捕。同日發表《工自聯臨時章程》。
- 6月1日 韓東方帶領「工自聯」會員到公安局示威，要求釋放三名被捕成員。公安局被迫釋放被捕成員。
- 6月2日 《北京晚報》指「工自聯」為非法組織。
- 6月3日 「工自聯」號召全市工人在6月4日舉行大罷工。
- 6月4日 軍隊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大屠殺，「工自聯」指揮部被搗毀。
- 6月7日 北京虎坊路出現「工自聯」聲明：「從今天起正式改名為『首都工人各界人士自治聯合會』，會章不變。」
- 6月9日 北京崇文公安分局查獲「工自聯」一個地下印刷點所在地。
- 6月14日 北京公安局下令通緝三名「工自聯」成員：韓東方、賀利利、劉強等。
- 6月18日 劉強等人被拘捕。
- 6月19日 韓東方到北京公安局投案自首。
- 6月底 北京、上海、濟南等地公佈處決二十七名工人運份子。

附錄（二）

六四以來被捕 工人民運人士名單

姓名	現狀	被控罪名
張衛國	被捕	言論
白鵬英	被處決	搞破壞
白信禹	被捕	搞破壞
班會杰	被處決	搞破壞
包紅堅	被捕	西安工自聯
卞漢武	處決	搞破壞
蔡超軍	被捕	上海工自聯
曹志輝	被捕	組織、搞破壞
張西文	被捕	西安工自聯
車宏年	被捕	濟南工自聯
陳紅根	被捕	上海工自聯
陳堅	處決	搞破壞
陳盛福	被捕	上海工自聯
程紅	被捕	造謠
程其洋	被捕	搞破壞
歐中友	判十五年監	國民黨特務

戴中	被捕	上海敢死隊
鄧國偉	被捕	示威、搞組織
丁佩林	被捕	藏武器
董進	被捕	搞破壞
馮國偉	被捕	搞組織、示威
高靜棠	被捕	杭州工自聯
高曉詩	被捕	特務、搞破壞
曾衛東	判四年監	搞破壞
高運明	被捕	不詳
恭辰成	被捕	上海工自聯
恭輝	被捕	造謠
郭亞雄	被捕	北京工自聯
郭永剛	被捕	示威、造謠
韓燕軍	被捕	北京敢死隊
侯傳遠	被捕	煽動、造謠
郝勁光	被捕	濟南工自聯
何恒	被捕	搞破壞
何江	被捕	搞破壞
何強	死刑緩刑	搞破壞
何朝輝	被捕	長沙工自聯
胡家豪	被捕	搞破壞
胡可生	被捕	搞破壞
胡良兵	被捕	搞破壞
胡凜英	被捕	搞破壞
黃健虎	被捕	造謠、煽動
黃練希	被捕	搞破壞
黃勇湘	被捕	南京工自聯
濟福年	被捕	北京工自聯
賈章林	被捕	煽動

姜希秋	被捕	大連民主政黨
焦志新	被捕	大連民主政黨
金濤	被捕	搞破壞
金偉東	被捕	搞破壞
李兵	被捕	殺害士兵
李大同	被捕	不詳
李德軍	被捕	示威、支持學生絕食
李虎玲	被捕	南京工自聯
李堅	被捕	長沙工自聯
李江	被捕	北京工自聯
李明賢	被捕	示威
李倉兵	被捕	搞破壞
李榮林	被捕	搞破壞
李榮富	被捕	煽動
李世謙	被捕	搞破壞
李濤	被捕	西安敢死隊
李偉東	被捕	搞破壞
李偉國	被捕	北京敢死隊
李偉紅	被捕	搞破壞
李文寶	被捕	搞破壞
李小虎	被捕	杭州工自聯
李志波	被捕	上海工自聯
李治國	被捕	政治組織
梁紅辰	被捕	搞破壞
梁建社	被捕	合肥工人自願隊
梁強	被捕	國民黨特務、政治組織
林前國	被捕	示威
林昭榮	處決	搞破壞
劉中犀	被捕	西安工自聯

劉從書	被捕	西安工自聯
劉煥文	被捕	北京工自聯
劉建	被捕	搞破壞
劉建強	被捕	示威、政治組織
劉進良	被捕	政治組織
劉強	被捕	北京工自聯
劉曉龍	被捕	西安敢死隊
柳星期	被捕	長沙工自聯
劉一海	被捕	搞破壞
劉玉濱	被捕	濟南工自聯
劉子厚	被捕	搞破壞
盧德成	被捕	搞破壞
盧摘星	被捕	長沙工自聯
樂吉奎	被捕	搞破壞
奕浙堂	被捕	搞破壞
羅紅軍	處決	搞破壞
孟多	被判死刑	搞破壞
苗得孫	被捕	搞破壞
倪二福	被捕	搞破壞
牛腥昌	被捕	北京農民自聯
潘小濱	被捕	西安敢死隊
彭靜	被捕	北京市民敢死隊
齊明聯	被捕	搞破壞
錢榮勉	被捕	特務、造謠
喬曉詩	被捕	特務、造謠
邱麟	被捕	造謠、特務
全保桂	被捕	不詳
任希英	被捕	西安工人糾察隊
任應軍	被捕	搞破壞

芮通湖	被捕	南京工自聯
芮朝陽	判終身監	搞破壞
邵良臣	被捕	濟南工自聯
沈暨中	被捕	造謠
沈明貴	被捕	煽動
沈志高	被捕	煽動、造謠
史國全	被捕	搞破壞
史進剛	被捕	搞組織
孫朝輝	判三年監	煽動
宋天理	被捕	大連民主政黨
譚明路	判三年監	煽動
唐建章	判三年監	上海敢死隊
唐遠軍	被捕	搞組織
田伯民	被捕	北京工自聯
田素新	判三年勞改	造謠
萬國平	判三年監	搞破壞
萬永	判三年監	搞破壞
王長安	被捕	濟南工自聯
王長洪	被捕	造謠、國民黨特務
王貴原	處決	搞破壞
王國強	被捕	搞破壞
王漢武	處決	搞破壞
王虹	被捕	上海工自聯
王建軍	被捕	西安敢死隊
王進基	被捕	示威
王連禧	判死刑緩刑	搞破壞
王妙根	被捕	上海工自聯
王偉	被捕	北京敢死隊
王信林	被捕	造謠

王勇千	被捕	搞破壞
王政明	被捕	政治組織
王中守	被捕	搞破壞
王尊寧	被捕	搞破壞
魏勇彬	被捕	西安敢死隊
翁正明	被捕	中國青年民主黨
吳繼東	被捕	特務、煽動
吳強	被捕	藏械
吳志軍	判勞改	造謠
蕭斌	被捕	造謠
蕭漢	被捕	煽動
蕭三峰	判三年監	搞破壞
蕭中武	被捕	煽動
徐兵力	被捕	搞組織
徐貴保	被捕	煽動
徐國明	處決	搞破壞
徐英	被捕	西安工自聯
楊富乾	被捕	北京工自聯
楊學榮	被捕	搞破壞
楊東炬	被捕	不詳
楊洪	被捕	造謠
楊建華	被捕	搞破壞
楊晉法	被捕	造謠
楊郎	被捕	不詳
楊清中	被捕	搞破壞
楊雄	被捕	長沙工自聯
楊志潛	被捕	搞破壞
姚山白	判四年監	搞破壞
葉富展	被捕	示威

伊敬耀	被捕	造謠
尤鈿祺	被捕	北京工自聯
于雲剛	被捕	西安敢死隊
于震彬	被捕	西安民主黨
于諄生	判三年監	搞破壞
袁智明	判監	搞破壞
袁志強	被捕	上海敢死隊
翟以存	被捕	搞破壞
詹興虎	判八年監	上海敢死隊
張兵兵	判十六年監	搞破壞
張國榮	被捕	安徽工自聯
張健忠	被捕	北京敢死隊
張軍	被捕	北京敢死隊
張期望	被捕	上海工自聯
張仁孚	被捕	上海工自聯
張聲明	被捕	造謠
張少英	被捕	造謠
張書	被捕	造謠
張文奎	處決	搞破壞
張新潮	被捕	濟南工自聯
張旭東	被捕	長沙工自聯
張延生	被捕	搞破壞
張益	被捕	造謠、特務
張有	被捕	破壞
張雨	被捕	示威
趙國良	被捕	搞破壞
趙得敏	被捕	西安工人糾察隊
趙建	判三年監	搞破壞
趙建明	判監	搞破壞

趙德育	被捕	搞破壞
趙樂堂	被捕	謀殺
趙君安	判四年監	搞破壞
鄭良	被捕	上海工自聯
周恩東	被捕	造謠
周少武	被捕	造謠
周向盛	處決	搞破壞
周彥	被捕	特務、煽動
周勇	被捕	上海工自聯
周運鋒	被捕	造謠、示威
朱根浩	被捕	煽動
朱廣華	被捕	杭州工自聯
朱惠明	被捕	南京工自聯
祖建軍	處決	搞破壞
朱琳	被捕	西安敢死隊
朱文力	被捕	示威
方京東	被捕	組織請願信
黃勇山	被捕	協助民運人士外逃
梁振運	被捕	偷武器
劉嘉南	判十年監	偷聽外敵電台
孫鵬	被捕	示威
王長淮	判三年監	長沙工自聯
王貴深	被捕	造謠
王樹偉	被捕	反革命
許國才	被捕	煽動反革命
許勤賢	判刑	違反軍令
張京盛	判十三年監	長沙工自聯
方旭	判七年監	搞暴力破壞
王春福	判七年監	搞暴力破壞

陳民春	判五年監	煽動暴力
高好	被捕	燒軍車
溥勇	被捕	造謠、煽動
阮建雲	被捕	反革命宣傳
田清	被捕	造謠
王白昆	被捕	北京敢死隊
趙樹建	被捕	反革命造謠
阮京民	被捕	不詳
王家祥	判監	煽動反革命
王照明	判監	煽動反革命
周紀國	判死刑	殺害一名軍人
江西堤	判十二年監	反革命暴亂
呂嘉明	被捕	募捐支持學運
陳德清	被捕	搞破壞
陳津良	被捕	上海工自聯
戴振平	被捕	造謠
方津春	被捕	造謠
傅立勇	被捕	搞破壞
高貴鴻	被捕	煽動
江志安	被捕	宣傳反革命
戴岳	被捕	宣傳反革命
楊秀平	被捕	宣傳反革命
陳稻	被捕	宣傳反革命
李濟安	判三至五年監	煽動、搞破壞
李怡	被捕	上海工自聯
馬志強	被捕	上海工自聯
孫西深	被捕	上海工自聯
唐國良	判十年監	示威
王包枚	被捕	上海工自聯

王夏	被捕	煽動
吳期好	被捕	搞破壞
呂國東	被捕	搞破壞
嚴庭貴	被捕	上海愛國工人支持北京人民組織
楊建	被捕	上海工自聯
米瑞英	被捕	造謠
楊庭奮	被捕	示威、破壞
張洪福	被捕	上海工自聯
趙國正	被捕	搞破壞
李欣福	被捕	組織政黨
劉成武	被捕	造謠
許小園	被捕	言論
耿秀良	被捕	造謠
嚴雪榮	處決	搞破壞
黎覺明	判十八年監	搞破壞
李錦華	判十三年監	搞破壞
岸保靜	被捕	西安工自聯
艾啓龍	被捕	搞破壞
韓東方	被捕	北京工自聯
賀利利	被捕	北京工自聯
李進進	判十年監	北京工自聯

(編者按：本名單部份人名從英文翻譯過來的，可能會與原來姓名有所出入。由於中共對民運人仕進行秘密緝捕，所以未能網羅所有被捕人仕的名單。而被捕者的資料，中共又沒有發表較詳細的資料，所以我們未能詳細了解被捕者的身份，是否屬於工人階級，如果讀者發現名單中人仕的身份有誤時，希望能夠給予指正。)

謹借中國著名詩人北島的《宣言——獻給遇羅克》一詩，獻給在八九民運中犧牲的工人階級戰士們。

也許最後的時刻到了
 我沒有留下遺囑
 只剩下筆，給我的母親
 我並不是英雄
 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裏
 我只想做一個人
 寧靜的地平線
 分開了死者和生者的行列
 我只能選擇天空
 絕不跪在地下
 以顯出劊子手們的高大
 好阻擋那自由的風

從星星的彈孔中
 將流出血紅的黎明

鳴謝

本書得以完成，全賴各方面支持中國工人民主運動的人士協助。各來稿作者全部沒有稿費，為推動民主而義務撰寫，連參與編務工作的朋友也是義務的。

在此僅向支持及資助本書出版的多個團體致萬二分謝意。

現時，中國正嚴厲打擊民主運動，我們只能簡略此等熱心人仕及團體的姓名。

最後，在此申明本書所有文字言論皆由筆者個人負責，與任何團體組織無關。

經過一番辛勤的工作後，本書終於順利付印。在印刷期間，本書某作者發現自己在回憶中出錯，可惜已不能在已完成的文字稿中修改，故只能在此提出更正聲明。在本書第二、三、及二十六頁中，有關韓東方演講一事，可能是另外一人。請各位讀者留意。由於我們水平有限，各位讀者若發現書中有任何錯誤，希望能夠提出更正。我們定當利用任何方法給予更正。

書名：工人起來了——工人自治聯合運動1989

出版：香港工會教育中心

香港九龍北京道五十七號四樓

電話：366 5860 圖文傳真：724 5098

版次：一九九〇年第一版

定價：每本港幣五十元正

本書版權屬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所有
